

柏林苍穹下

(德) 霍尔格·泰格迈尔 著

刘兴华 译



Breitseite Berlin

Holger Tegtmeier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柏林苍穹下

(德) 霍尔格·泰格迈尔 著

刘兴华 译

Breitseite Berlin

Holger Tegtmeier

汉译精品·文化生活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柏林苍穹下/(德)泰格迈尔(Tegtmeyer, H.)著;
刘兴华译.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3. 5
ISBN 978 - 7 - 214 - 05533 - 0

I. ①柏… II. ①泰… ②刘… III. ①散文—作品集
—德国—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1931 号

Author: Holger Tegtmeyer

Title: Breitseite Berlin. Literarische Streifzüge

Copyright © 2004 Patmos Verlag GmbH & Co. KG

Artemis & Winkler Verlag, Duesseldorf

Alle Rechte vorbehalten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arranged through HERCULES Business & Culture
Develotment GmbH, German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2 by Jiangsu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0 - 2006 - 223

本书译文由立绪文化出版公司授权简体字版出版发行

书 名	柏林苍穹下
著 者	[德]霍尔格·泰格迈尔
译 者	刘兴华
责任编辑	蒋卫国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毫米×1 230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30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5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4 - 05533 - 0
定 价	24.00 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本社调换)

前 言

在围墙倒塌这欢欣鼓舞的事件后第十五年的柏林仍注定不只是反映出整个国家的状况，甚至像观察家可能所乐见的那样，要以放大镜来更加清楚地检视。我们不得不指出，柏林长久以来处于尖锐对立的背景下，否则便无法理解接下来会扼要提到的文学。柏林的文学，一直是一座不安的城市的生活标记，直到最近的过去为止。不论时代精神在转变、突破还是瓦解，却在咬啮人精神的大城市的迷人气氛下，产生了一种其他地方所没有或只是例外的音域。至少那些吹毛求疵的矫作人士，那些慢条斯理的当地人士，从冯塔纳(Theodor Fontane)起，在这座节奏快速无情的城市中便无容身之地，那些娇嫩的贪玩者或冷淡的好人也一样。柏林所期待的强者不会安于舒适。特别是在已成过去的20世纪历史中，并未让他们有安逸与自我享受的时刻，就算脑满肠肥的西柏林曾经让人有完全任其小睡一番的印象，那东柏林人的傲慢要求与首都人的自大，就更别提了。

在 1989 年柏林上演的短暂狂热后，柏林成了持续低迷的扩散地，然而城市文学至今不知如何歌咏。时间的问题吧……“忘了柏林！”《法兰克福广讯报周日版》2002 年 12 月 1 日的副刊标题这样表示，但很快又会再被遗忘，因为对艺术家而言，只要能够清楚认识其他地方所隐藏、排挤或被压制到可以忍受程度的地方，都是好的：在所谓问题区域的贫困与无法忽视的社会惨况；由德国与欧洲历史在其疯狂与失败的混合所导致的人类的希望与绝望；新开端的动力与迎向未知目标时的停顿与迟疑的尖锐对比；随着新的参与者与新规则加入后，政治施展场地的扩大；还有个别在下一回合会彻底失败淘汰的人的恐惧。而这一切都在 350 万人的城市这个压力锅中，高密度，几乎伸手可及。这里演奏着音乐，听到不同的传言（或趋势）：一种杂音，要受过训练的听觉才能慢慢理解。正因如此，柏林是座艺术之城——无论如何，是小小的德国文学的首都。

在柏林的文学中，一直可以注意到与环境的搏斗及那种好战精神。这时的风平浪静或许让人讶异。那种味道，那种奇特，总是让人错乱的柏林氛围，依附在所有可以见到的事物上，但前提在于要能嗅到。然而，在某些地方，这个城市没有味道，在其他地方，却带着死亡与腐烂的味道。对此默不做声的人，无法谈论柏林。

目 录

前言 001

1 弗里德里希大街之一 001

围墙 004

从中间穿过 009

2 弗里德里希大街之二 013

混杂的感觉 013

漫游 017

沙龙 020

咖啡与墨水 025

3 从菩提树下大街到波茨坦广场 028

咖啡、瓦斯与电灯 028

世界之门	031	
控制学习目标	034	
全世界通用?	035	
4 从菩提树下大街到亚历山大广场		039
德意志存在	039	
向后做梦	042	
城市之眼,大陆中心	045	
“东方”	049	
5 普伦茨劳山上		086
登山	086	
广场上	089	
永葆如新	090	
被逐	092	
6 普伦茨劳山——地下活动与深渊		096
结束的开端	096	
结束前的补遗	103	
一群失败的人	105	
参与过	107	
7 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离开过去		111
施普雷河上的桥	111	

一切都在掌控中	117
宫殿	122
8 在奥兰宁堡大门和哈克市场间	129
生活艺术家	129
激情与无聊	134
大思想家	138
9 布莱特沙伊德广场周围	144
商品与价值	144
丛林小径,铺上柏油	149
10 从康德大街到萨维尼广场	153
舞台世界与真实	153
动力	159
品味人士	161
理想主义者之死	162
思想与力量	166
11 选帝侯大道	170
过渡	170
一位波西米亚人的生活	171
空幻	175

怪人	178
事物——的起义?	180
12 布莱特沙伊德广场	187
知识分子的游乐场	187
当地面过热时	192
俄国流亡分子	196
陶恩钦:可卡因	199
13 弗里德里希树林区	201
一座信仰与希望的碉堡	201
见证贫困	204
享乐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207
寒冷 震撼	209
14 十字山	213
这里不是美国	213
勒曼的这一边	216
金钱与贫困	219
换边	221
展望	226

1 弗里德里希大街之一

我们把旅游业所谓的老柏林留给旅游业自己，那已被战争所毁，任何重建都于事无补。东德庆祝首都建城 750 周年的生日礼物——尼古拉区(Nikolaiviertel)的博物馆城，最多只能算是个小小的安慰。我们最好在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上的阿德勒咖啡馆(Café Adler)找个靠窗的位置，喝杯浓咖啡清醒一下。

尽管查理检查哨(Checkpoint Charlie)对面的博物馆吸引了许多访客，这里还是一派悠闲，仿佛外面的骚动不过是个无关紧要的现实，是一桩在大片玻璃屏幕上无声放映着的、发生在数千公里外另一座城市里的事件。在这个“西城最后一间咖啡馆”(赛斯·诺特博姆[Cees Nooteboom]，1989)里，人们有如坐在一个时间泡泡里，随波逐流，任由自己的梦牵引着。但是，当我看着外面的人找着特定的东西，努力看着手中以红色曲线标示出穿过安详的街道与广场的柏林围墙的专用地图时，就仿佛城市上方爆发出巨大的电压，或地震刚好在这儿造成了一条大裂缝，我就会回忆起我们不久前才摆脱掉的

噩梦。我们现在醒了(咖啡起了作用),只能徒然回忆着这种疯狂的感觉,那就像一出世界政治的戏码,牢牢支配着我们,在幕前或幕后扮演着某个角色。“疯子的夜间表演,错乱的晚场”(“萌芽时代”的《无轮飞机》一曲)已经结束。舞台仍可参观,但幕布已经没了。

在我看来,柏林这座统一的大城市中,没有什么地方比咖啡馆窗前的查理检查哨更能清楚地呈现出这出戏的荒谬,街上那种无关紧要的现实只不过是无害的尾声。

真正的边境位于齐默大街(Zimmerstraße)对面,1990年7月被推土机铲平。为了纪念这个传奇的检查哨,好心人士在围墙博物馆前搭了一个崭新的哨兵站,上有美军检查哨(US ARMY CHECKPOINT)字样(原件保存在博物馆内)。他们也没忘记堆到齐肩高度的沙袋,此外,还立起一个大型的照片看板,就位于安全岛尖端,展示两位占领区士兵的胸像。他们背靠背立在那里,各自代表着他们的阵营:年轻、纯真,派驻柏林,支援自己强权的帝国任务。

然而,历史早已做出判决: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这个事件还不时受到纪念。2001年8月13日,人们在星条旗下纪念柏林围墙建成四十周年。弗里德里希大街进行交通管制,演讲台前摆满椅子,几家新闻电台的摄影团队全都来了,录制几秒钟的晚间新闻。在演讲者上台前,一名年长的女人分发着小星条纸旗,目光狂热:为了对胜利者表示敬意,我们应该热情挥舞,因为他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照片看板上的年轻俄国士兵,目光对着东柏林,沿着弗里德里希大街徒然找着他的同伴。他错过了队伍,只能僵在这里,成了这类被拍过成千上万次的照片的最后一张。

卢修斯·克莱(Lucius D. Clay)的孙子在做完自由与民主的胜利的讲演后,得到一份别致的礼物,一段在我们眼前揭开的围墙,仿佛东方之熊可怕的牙齿中一颗完美无缺的钢筋混凝土门牙,高 3.6 米,重达 2.5 吨。克莱这位老将军,柏林的荣誉市民,理当得到这份奖品,因为他曾搭起了空中桥梁,并未放弃红色海洋中的西柏林孤岛。大家在这个 8 月天为他的后人欢呼,仿佛他是其祖父的化身。

这类活动有如进入首都分裂意识的旅行,正确的意识在这儿庆祝他们战胜错误的意识。在东柏林,人们并未感受到美国人的友谊与慷慨。那里的人对这类活动的安排又该如何反应:一笔勾销俄国掌控下的过去,并在无止境的耐力考验后,庆幸自己现在找到了一位真正的朋友?如果我们西德人还会想到东德人的命运,是不是想到的也只有“倒霉而已!”?对我而言,这不只是不清楚,我也惦念那种分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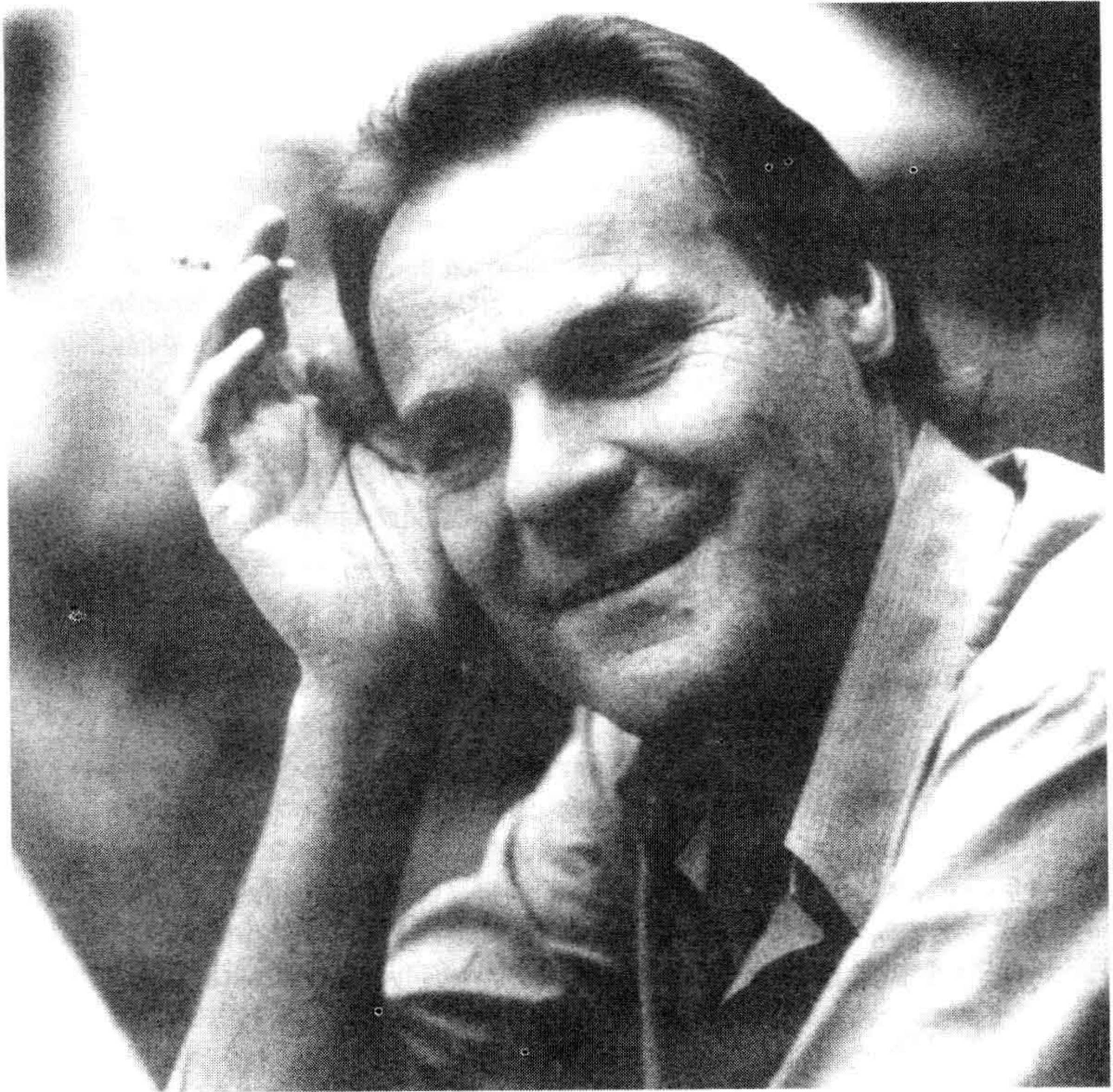
胜利者和捞到好处的人不懂分寸,斜对面一张贴在防火墙上的巨幅海报这样告诉我。上面可以读到“为自己租下历史”,一位房屋中介正在寻找查理检查哨旁的办公室租户。1962 年 8 月 17 日,彼得·费希特(Peter Fechter)在 200 米远处试图在边境地带越过围墙时,被射杀身亡。边防哨兵就让他躺在围墙脚下躺了 55 分钟。租下边防站的 33 发子弹,租下中枪者的叫喊(“救救我……请救救我!”),租下旁观者愤怒的抗议及美国军官的怠忽职守(“那不是我们的问题!”),租下卡尔-爱德华·冯·施尼茨勒(Karl-Eduard von Schnitzler)的广播评论(“谁冒险,谁就死!”)。

围墙

1940年生于吕贝克(Lübeck)的彼得·施奈德(Peter Schneider)在同一年搬到柏林。“二十年前,我就住在暹罗城,”他的短篇小说《越墙者》(*Der Mauerspringer*, 1982)里这样写道。“和大多数离开西德省区的人一样,我来到这里:因为我想到大城市,因为女友住在那里,因为在这个前哨服役,算是一种替代役,可以省去在西德军营服役的年限。也像大多数人一样,我起先只是一年年地过着,但说真的,在柏林停留没有多久,我就觉得其他西德城市都假假的。……”

“我搬到柏林时,新的围墙刚刚建起。在刚开始的惊恐过去后,这个巨大的玩意逐步稀释成为西德人意识中的隐喻。在那一头意味着行动自由告一段落,而这一头则成了令人嫌恶的社会体制的象征。望向另一头的目光被阻隔成了边界设施,最后成了集体治疗的自我经历:围墙成了西德人的魔镜,每天告诉他们国内最美的是谁。危险地带另一头是否还有生命,很快只有鸽子和猫才感兴趣了。”

这本书出版时,还引起了小小的骚动。这个主题在知识分子圈中算是已经下肚,尽管大家可以想到这种难题并不好消化。几名像新闻工作者格哈德·罗文塔(Gerhard Löwenthal)这样的右翼保守分子,便专门描述边界管理的骇人之处,他在自己的《德国电视二台杂志》(*ZDF-Magazin*)“对面的求救声”专栏中,孜孜不倦地告知那些已



彼得·施奈德(1940—),摄于1999年

经知道东德就是魔鬼的人。但左派默不做声；他们不愿帮助这类的民族教育，在意识形态上，他们似乎也不完全肯定，那一边的社会主义者是否比在自己分裂国家中自诩为外国人(?)的自由权利斗士者与他们更加接近。施奈德曾为国会外反对运动组织^①的代言人，虽然有些畏缩不前，但他们大胆打破禁忌。他描述着固执却成功的越

^① APO-Bewegung, 德国 1960 年代末以青年和学生为主体的左翼组织。——译注

界行径,也避免了那种类似控诉的激情。他通过在困境之际易被使用的应急讽刺手法,走出了意识形态的两难。他的故事迎合着时尚,在核武器的末世灾难中结束:

旅行用的打字机比我用来书写的传单还要老旧,墙上的吉他或许比我活得还久,那把琴我早就不再弹奏了。总而言之:我周围的东西,算来我是最经久不变的。只有外面城市的防火墙、后院的墙、边界围墙——直到再也没有人可以穿越时,这些墙还会矗立在那里。

书中的一段情节后来被拍成电影《墙上的男人》(*Der Mann auf der Mauer*),马里尤斯·穆勒-威斯特哈根(Marius Müller-Westernhagen)扮演主角。许多人在那儿斗殴,弄到头破血流,其中显然有几位作家。看来就算不断在尝试,思想也无法应付这座世界上最冷酷的建筑,理智无法支配这座建筑,讨论亦无法去除它的骇人之处。它嘲弄任何以论证来处置它的人,不管立论是正是反。它那几乎形而上的特质,令像约格·法瑟(Jörg Fauser)这样的作家着迷不已,他和其美国同侪一样,喜欢写得快且生硬。有次,他在一个早被停播的大众文学节目——《作家电单车》(*Autor-Scooter*)里提到,在一个愈来愈相对的世界中,柏林围墙是唯一真正绝对之物。我们可以把它解释成确保和平之物,诅咒它,开车朝它撞出个洞:但它依然不可动摇。对理智而言,这让它成了一种巨大的挑衅。它似乎真的会成为一座永恒的建筑。由于任何一个时代的保守人物最后会习惯一切,许

多人便开始提到它的正常状态,差不多就只是一个无趣的耸肩而已。但最近,人们试图越过它,冒着生命危险来到无趣的西方。最后一位死在柏林围墙的是克里斯·圭弗洛伊(Chris Gueffroy),他在1989年2月5日午夜前不久,试图逃至特雷普托区(Treptow)。边界士兵英戈·亨利希(Ingo Heinrich)开了枪,击中了这位20岁侍者的心脏。他的朋友被逮捕,入狱八个月,后被西德政府赎回。这两人想在西柏林开间自己的餐厅,梦想到美国旅行。

施奈德关于围墙长存的句子还可用在法瑟身上。他的《柏林、巴黎、纽约》一诗正好在柏林围墙倒塌前十一年那一天出版。他自己再也经历不到这个最后的绝对之物在我们相当有限的想象力中崩塌。法瑟的11月诗篇,忧郁中带着一丝社会批评,为了这个古老的主题,略过了柏林不同于其他许多大都会的差异,那种差异连在“秀山区(Schöneberg)的街角”都可发现。每个大城市都因自己特定的方式而显得独特,但柏林有些特别之处,既是温室,亦是冷藏库,既是人工灌溉的天堂花园,亦是干涸的草原,是霓虹灯的实验室,也是昏黄黯淡的地牢,是被默许的娱乐活动的中心,亦是义务服从的中心,不平均地分配在城市两边。法瑟把西柏林和柏林混为一谈,不过是种无关紧要的个人观点,在那时代并不典型,却无意间符合东边所杜撰出来的说法,按照这个说法,只有一个柏林,且是“东德的首都”;而在旁边刚好有个叫做西柏林的遥远梦境,在国营观光出版社的地图中,被标绘成没有地形地貌的黄色平面。诗的第五段提到了并非造就,而是扼杀人性的法律。这已接近在这座城市奋战到底的东西,一种在德国人的民族野心彻底溃决后,转化成为自己野心的东西:姑且不论

那是真正的信念，还是缺乏想象力。

战后的德国人又要求什么呢？他们要求方向，要求安全与保障，要求重建自己国土的援助，要求在些许的快乐之中一点和平的未来。他们知道或察觉到，不可能有更多要求。他们肯定不想被分开，肯定不渴望体制的致命竞赛，因其属性而交付给这一边或那一边。至于柏林，这座之前的帝国首都对胜利的强权来说，不啻是块令人垂涎的战利品。占领了柏林，就等于占领了德国。这种高度的威望价值导致城市分裂。美国人认为值得搭建空中桥梁来保有自己那一部分，俄国人自然可以建起围墙。

法瑟的诗来自一个还未真正思考柏林的时代，那并不是随着围墙开始，也不是在围墙那儿结束，对个别在这往往已被当成答案的问题中持有立场的人来说，并不那么危险。我们只能接纳这个传统的一部分。我们早已超越了这个传统，因为光阴如梭，快到连围墙都已变成了传奇的东西。搭建围墙的人是谁，为什么搭建，什么时候搭建，有什么作用，要攀登到什么高度才能不被围墙遮住——这已不再是一般关心的话题，而是留给一些专家再次去消化这个已完全腐臭的饭菜。不过围墙曾经存在，还会让我们的后代继续吃惊下去。柏林围墙在很长一段时间决定着我们的20世纪的图像，尽管它见证着一些难以想像的怪事消失在虚幻的迷雾中。

未被怀疑支持围墙政权的莱纳·孔策(Reiner Kunze)在他的诗作《围墙》(Die mauer, 1990. 10. 3)中，把围墙评得十分崇高。“在它的影子中/没有其他的影子/这时，我们暴露在/各种借口下。”在他看来，一整个世代都害怕恐惧这座围墙，因为他们盲目、仓促，或只

是缺乏幻想力,让自己无法动弹(《风平浪静》),不只是以典型德国人的逆来顺受来忍受其结果,甚至也懂得如何为此辩解:视为历史的公平制裁,视为确保和平的措施,来遏止住有躁狂倾向的民族,也就是他们自己。自然也不难找到世界政治脉络的背景,因而这个时代只能参与,堆起一块块石头,让围墙耸立,尽可能纠正大家天真地称为真理的东西,直到所有的责任都遭到怒斥。波托·施特劳斯(Botho Strauß)刻意并语带双关地称这种集体罪责与个体失败所构成的脉络为“现成之物”。我则比较倾向一个更锐利的表达方式。

从中间穿过

赛斯·诺特博姆是时代的见证,一位在适当的地点的适当人物。在围墙倒塌的那一天,他从阿德勒咖啡馆开始跟随南行的人群行列,来到对东柏林人来说是西方的地方。一个艺术家的交换计划让他来到这个分裂的城市,他从一个未被分裂的城市为荷兰报纸撰写报道,后来集结成《柏林笔记》(*Berliner Notizen*, 1991),德国读者亦可参阅。我认为这是迄今关于那骚动的一周的最值得阅读的作品。

诺特博姆并未加入这个行列,而是在付了入场费后,朝相反的方向漫步而去。他拜访了他的作品在东柏林的版权所有人——位于格林卡大街(Glinkastraße)13至15号的民族与世界出版社,发现这栋建筑和整个东德处于同等状态中:他的交谈对象显得激动异常、恐惧不安。我们也想往北去,因为西方的南边穷困,在十字山

(Kreuzberg)便告一段落。弗里德里希大街通往那些只有水泥柱建筑(彼得·瓦维奇涅克〔Peter Wawerzinek〕)可以参观的梅林广场(Mehringplatz)的最后几米,丧失了自己所有的新的与承继而来的辉煌之物,没落成为不起眼的住宅街道。

1982年,民族与世界出版社出版了一本西德文学选集:《今日西德,今日西柏林》(*BRD heute Westberlin heute*),向读者介绍了67位男女作家之前未在东德出版过的作品。“这本文选想清楚地呈现西德的社会矛盾。”封面文字如此说明,而被呈现的则是“文学中的社会图像”。这个既近又远的社会的图像显得阴沉,受制于社会的贫困、骇人听闻的不公不义、受到抑制的过去、持续不断的法西斯倾向、仇外及排斥政治异己分子。西德70年代一些著名的批判知识分子,阿尔弗雷德·安德施(Alfred Andersch)、罗夫·迪特·布林克曼(Rolf Dieter Brinkmann)、英格柏格·德列维兹(Ingeborg Drewitz)、汉斯·马格奴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罗尔夫·霍赫胡特(Rolf Hochhuth)、沃尔特·延斯(Walter Jens)、海纳·奇普哈特(Heinar Kipphardt)、莱茵哈德·烈陶(Reinhard Lettau)、露伊丝·林泽(Luise Rinser)、盖布里艾勒·沃曼(Gabriele Wohmann)、彼得-保罗·查勒(Peter-Paul Zahl)等都有表示意见……其中也有彼得·施奈德的《告德国读者与作家书》(*Rede an die deutschen Leser und ihre Schriftsteller*),呼吁反抗后资本主义中对愿望与欲求的压制。施奈德以描述60年代末柏林人后院的实际情况揭开他的讲演内容:

每当我早上第一眼望出窗外时,没见到绳子上有晾晒的衣

物，没见到阳台上孩子，没见到屋墙上用红色颜料不断写着卡斯特、毛泽东、胡志明。我见到管理员的小花园，我不认识他，只从他的告示上知道他，要保持楼梯整洁，门窗关好，晾好衣物，刚刚打蜡。……

我见到两米的高墙围着这个 12 平方米大的花园，我见到围墙上用水泥固定住的玻璃碎片，阻隔邻家小孩。当我从围墙越过院子望去，我见到第二座大围墙，同样嵌着玻璃碎片，阻隔邻家小孩。当我现在俯瞰整座院子，我没见到围墙搭来想阻隔的东西。我没见到孩子涌向围墙，没有儿子燃烧汽车，没有父亲拿起机枪，被儿子的箭矢射中倒在柏油路上死去。

这些玻璃碎片还零星存在着，但只需要花点时间去找。不过，这里指的不是被割伤的孩童之手，而是这座城市的社会气氛，受到虐待的人互相对立，他们互相处罚对方，因为他们自己每天都受到处罚：

这里的人过得相当凄惨，会向别人挥拳头来表达他们对友情的需要；当他们对别人大声嘶吼时，便意味着别人应该来照顾他们；他们的利益与愿望常常受到伤害，所以有人在红灯跨越马路时，他们会认为是在威胁他们的生命。

这种情况是否有所改善，或根本不像当时这位年轻好斗的作家所传达的那样不堪？柏林向来弥漫着一股严苛的气氛。我怀疑社会主义下的柏林人会温柔相待。不时粗暴地攻击近邻，在这儿算是全

民运动,往往成了一种有点独特的人际交往方式。是的,大家“真的该来关注他们了”。

大都会的匿名性格(孤独)与致力在愚蠢的活动(疏离),成了 70 年代的重要话题。今天大家耸耸肩,无所谓地接纳了这两者;在二十年前仍为批判知识分子圈中的人,关注焦点依然在职业自我认同的现代形式上。他们宣传鼓吹生活与生涯、人格与成就的均衡想法。在创造性工资劳动外的生活,便成了作为个人生活方式开端的业余活动。在资讯、知识及/或风险社会中,工厂工人再也不是讨论的主体;没人会再提及没有尊严的流水线生产。人们宁可担心产蛋线上不那么有机健康的母鸡的情况。这些同种的生物只要想过得舒服,就能过得舒服。这种讽刺“后工业”时代的人类想法,相当冷酷愚昧,必定让像施奈德这样的六八世代^①老前辈感到害怕。他当时的控诉,汇成了一种呼吁,要作家支持权利被剥夺的人:“如果涉及到人类的话,那些幻想力还未被资本破坏的艺术家,负有……任务,帮助工人及大小学生表达出他们的愿望,为他们指出通往自己政治组织的道路。”

彼得·施奈德仍然孜孜不倦。最近他以一个作家团体发言人的身份发表意见,他们敢于对抗德国的反美主义,在反国际恐怖主义上,支持总理的大西洋团结政策。他的立场和其他前左派分子一致,他们今天视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民主为自由与基本人权的保障。

^① 1968年5月在法国巴黎爆发社会运动,被后人视为危机、暴动、造反、罢工、示威,甚至革命。原由学生运动开始,继而演变成社会危机,甚至政治危机,影响遍及全球。——译注

2 弗里德里希大街之二

混杂的感觉

我们位于德国浪漫派以前的住宅区中。直到菩提树下大街(Unter den Linden),有八条街切过弗里德里希大街,莫尔大街(Mauerstrasse)位于该街顶端。1809至1911年间,亚钦·冯·阿宁(Achim von Arnim)与克列蒙斯·布列塔诺(Clemens Brentano)一起生活在这儿。同一时间,亨利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和爱好歌曲的朋友,住在莫尔大街53号。那应该就是他最后的住处:万湖(Wannsee)旁一块纪念碑纪念着这位德国文豪中最现代且最具争议性的一位。今天这栋列为古迹、所谓的克莱斯特之屋,是德国经济与工作部的一部分,一百年之后才盖起来。只有名字而不是建筑本身让人想到这位诗人。

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搬进该屋隔壁两栋(莫尔大街



亨利希·海涅(1797—1856)

51号)时,才二十五岁左右,是位法律系学生。三年后,他拿到博士学位,改变了信仰,好踏入上流社会。然而,因为政治因素,还是无法取得想要的大学教职:海涅成了记者与诗人,刻意危及自己的存在:“母亲当时深恐我成为一位诗人;她老说,那是我所遇见最不堪的事。当时人们所联想到的诗人头衔,并不怎么高尚,有一位诗人是个褴褛穷困的家伙,为了几块钱便即兴作诗,最后死在医院。”海涅的下场众所皆知。在他死前几个钟头,一个熟人冲进病房,逼问他有关上帝的问题。海涅答道:“您别紧张,上帝会原谅我的,那可是他的本行!”

拉尔·方哈根·冯·恩瑟(Rahel Varnhagen von Ense)一直住在莫尔大街36号,直到去世。海涅经常出入她在法国大街(Französische Straße)的第二个文艺沙龙。我们再回来,在这个地方稍微转个弯,谈谈一位哲学博士,要是他能好好实现他的文学大志的话,就会渐渐被人遗忘,欧洲的历史也会好过一点。但虚拟的历史不过是个可笑的玩意,根本无从更改任何东西,更不可能事后再把那位约

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从疯狂的旋转木马中拉出来。柏林出版社莫斯与乌尔斯坦拒绝出版他的小说《米歇尔》(*Michael*)，《柏林日报》(*Berliner Tageblatt*)则回绝他投来的稿件。他被一位名叫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的演说家所迷，1926年被他派往红色柏林。身为刚被任命的纳粹省份部主任，他应该为纳粹征服德国这个罪恶的渊藪。这名矮小的莱茵地区人士，靠着巧妙的宣传，很快引起众人注意。他知道柏林需要他来大干特干一番。他的党如果想成功的话，必须受人瞩目。他让手下张贴海报，第一张上面写着“攻击？”，几天后，第二张上面写着“七月四日开始攻击”，直到第三张才解释柏林会有哪种攻击：一份全新的纳粹周刊。后来纳粹人民教育宣传部部长的办公地点，就在莫尔大街克莱斯特之屋旁。这个所谓的联邦机构也占去了那里一整排建筑。

我们可以离开弗里德里希区(Friedrichstadt)和比邻的多罗廷区(Dorotheenstadt)的街道，寻找浪漫派的人物，他们是在大学成立之际被召来柏林的，不过我对这些人物并不特别有把握。在誉为欧洲最美广场之一的宪兵广场(Gendarmenmarkt)大街上，我经常觉得回到了那个有着市集且勃兰登堡地区的农夫在那儿叫卖农地水果的时代，回到了那个弗里德里希区，三分之二居民来自法国，上他们自己的法国教堂，感谢上帝让他们摆脱追捕，在普鲁士安居乐业的时代。他们教堂塔楼中的胡格诺派博物馆(Hugenotten-Museum)是个显著的标志。此外，还有普鲁士史的专家与爱好者，他们对上几个世纪了如指掌，仿佛自己亲身经历过一般，轻而易举地克服了时间这个重大障碍，带领惊讶的听众或读者来到一个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时代，和

那些大人物们亲密作伴。我们这些后现代的孩子，一直以来相信可以重新体会历史，但却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我们毕恭毕敬，不介入他们的领域：例如君特·德·布鲁因(Günter de Bruyn)，他花了许多功夫为后人照顾着勃兰登堡地区的诗人花园。他可以为我们讲述霍夫曼(E. T. A. Hoffmann)的那个社交圈子，把朋友及同事叫到自己在卫士市场大街上的住处，或和他们在对面的路特和维格纳(Lutter & Wegner)酒馆痛饮。

东德努力重建的尼古拉区广场附近，近几年来餐馆林立。90年代初，许多简单无趣的观光客餐馆令人失望，花了好多年的时间，才懂得亲切的服务，而不只是供应食物而已。一些私人电台出于排场的考虑，在这著名的广场附近租下他们在首都的工作场所，不久后这些职业的包打听人士很快就有自己常去的餐馆。法国大街上极富传统的波夏特(Borchardt)，几年来在柏林中心区成了传奇，和城西康德大街(Kantstraße)的巴黎酒吧一样。

在我看来，这个广场本身少了活力。在辛克尔(Schinkel)设计的剧院阶梯上，甚少坐着情侣，更别提自助旅行的人——他们都到哪儿去了：这些欧洲街上的流浪汉靠着讶异与好奇来弥补自己的缺钱？——没有什么缪斯小姐会爬上皮肤光滑的席勒(Schiller)，在他脸颊上献上一吻。相反地，见到的多是旅行团、文化市民、老年人及少数的年轻人。总而言之，一座美丽干净却无趣的广场，我绝不会见到亚历山大广场(Alexanderplatz)上的庞克族来到这个高贵的广场，最多只有能够融入这个广场生活的游客，他们不是冷漠地赞美这个广场，而是赋予这个美丽与深信未来会更加美好的广场一段相应的

旋律。毕竟这些仿佛在对话、比邻在一起的教堂，并不坚持要像墓园一般安静。

漫游

弗里德里希大街大概太窄，不适合漫游。谁想停下来看看，就会挡到急行的人。漫游者似乎漫无目的地在街道和广场上闲逛，没有一定的目标，对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会突然感到兴趣。弗朗茨·黑塞尔(Franz Hessel)这位柏林最著名的漫游者，老被文学百科全书遗忘，他认为选帝侯大道负有“教导柏林人漫游的高级文化使命”，不过我们应该给弗里德里希大街一个机会，毕竟这条街在致力赶上那些强大的竞争对手。黑塞尔写道：“漫游是一种街道读物，在那儿，人们的脸孔、陈列品、橱窗、露台咖啡、道路、汽车、树木，都成了位阶相同的字母，不断构成新书中的文字、句子和书页。要正确地漫游，就不该有过于特定的企图。”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推崇黑塞尔式的漫步，把街道与房舍这种读物当成帮助记忆的方法。对他来说，漫游者走在双重土地上，不只留意着此地此时的现象，也看出他们身后昨日及前天的现象。他们的对立、互补、互相流逝，使得这个读物非比寻常，亦能增长见识。没错，情况便是如此！但这两位从孩童时即已认识的好友，即将面临彻底的文化破产（那也逼死了他们）。当时在 20 年代，把他们和过去分开的只有时间——而我们却是被灾难和过去分开，这场灾难抹去了许多我们今天靠着记忆技巧保留下



弗朗茨·黑塞尔(1880—1941),1930年左右

来的痕迹。现在有关时间的记忆文化甚受重视,但这说来只直接涉及灾难,说得更明确:涉及大屠杀,仿佛那正要被人遗忘一般。

黑塞尔所知道的老弗里德里希大街,是靠他自己的记忆,而不是读来的。他在20年代末傲视着这条街,这没什么好否认的,但带着同情与虔诚:“弗里德里希大街曾是柏林罪恶的中心。狭窄的人行道铺着一层光的地毯,那些危险的女孩仿佛走在丝绸上。她们随着流行,笔直地走着,显得有些危险,当她们张口说着城里的方言时,残酷地受到揶揄。……今天的弗里德里希大街没有太多过去的鬼魅。它的夜生活早被西边的大道赶过。现在剩下的只能吸引外地人,而不是柏林的漫游者。在一些夜店,今天的年轻人或许还能研究过去几

代取乐的玩意，蛮讽刺的。”

在那个“根据巴黎长廊模式搭起的皇帝画廊”所在之处，黑塞尔已“忐忑不安，深恐找不到出口”，走了进去，而今天那里坐落着威斯汀大饭店，1987年以国际饭店的架势为西方访客打开了它的大门，一家所谓的顶级饭店，新古典风格，有着一间罩着玻璃屋顶的饭店大厅，六座沙龙，一座有蒸汽浴及按摩池的游泳池，一间健身俱乐部。套房都以比德迈风格(Biedermeier)^①布置……

国家动员起来庆祝建城周年，仿佛在筹办奥林匹克运动会或世界博览会一样，那栋华丽的建筑使得东德深陷债务的沼泽中。在80年代中，东德已经无力支付，只靠着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Franz-Josef Strauß)找来的十亿贷款苦撑。难怪在新的德国联邦中，人们至今对柏林没什么好话。只要哪里有重大建设，其他十四个区的挖土机和起重机全都停摆，因为工头都被征召走了。这个首都真是个巨大的无底洞。老普鲁士形质相符的美德，在红色的普鲁士地区被刻意忽视了。

在德意志帝国成立两年之后，皇帝威廉一世(Wilhelm I)亲自启用了皇帝长廊。这个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贝伦大街(Behrenstraße)及菩提树下大街的长廊，长128米，三层建筑的内部通道全都通往一座八角的圆顶大厅。“周遭有许多橱窗，但人却不多，”黑塞尔记载到。“商品几乎还和二十年前的一模一样，陶瓷人偶、旅行纪念品、珍珠、小袋子、温度计、橡胶制品、邮票、印章。”这个长廊成了品味低俗

^① 1854—1848年德国的一种文化艺术风格，具有市民庸俗倾向。——译注

的珍宝馆、杂物间。接着出现令人惊讶的事：“整个长廊中央是空的。我赶紧奔向出口，察觉到过去那些拥挤的人群如鬼魅般出没，好奇的目光沿着墙面打量着人造宝石做的珠宝、衣物、照片及早期商场中诱人的读物。我在出口那间大旅行社的橱窗前喘了口气：街道、自由、当下！”

在老佛爷百货附近，我们可以看出新长廊的气派。袋子、鞋子、夹克、皮毛、烈酒，全是高级商品。弗里德里希大街出头了，这情形已有好几年，虽然还谈不上有夜生活。银行与公司关了门，逛街购物的人躺在饭店床上筋疲力竭，计程车载着昂贵中心地段的最后一批客人回家。

沙龙

她的作品全是信简，而不是信简小说；她在德国文学史上，并非大作家，而是大作家的女友、赞助人、谈话对象：拉尔·范哈根(Rahel Varnhagen von Ense)，原名列文(Levin)，一名犹太商人与银行家的女儿，丈夫是小她十四岁的外交官，她可说是他的情人、老师与母亲，丈夫比她多活了二十五年，对她而言，“是位宠爱她的先知、编年史家与编辑”(乌伟·施魏凯特[Uwe Schweikert])。由于贝蒂娜·冯·阿尼姆(Bettina von Arnim)常常忽喜忽悲，大家对她意见不一，但在评价拉尔·列文(Rahel Levin)上，看法却是一致的：“全世界最有才智的女人”(亨利希·海涅)，一位“道德的助产士”(路易·费迪南·



拉尔·范哈根·冯·恩瑟
(1771—1833), 威廉·韩瑟勒
的铅笔素描。

冯·普鲁士王子〔Louis Ferdinand von Preußen〕,“我这辈子从未听过这么有趣绝妙的话”(弗朗茨·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
“拉尔不和少数人谈少数事,而是和所有人谈所有事”(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

下面几句话写于 1805 年 2 月,有一定的分量,呈现出一位完全明白自己重要性的沙龙女子的自信:“身为世界的最重要人物,我相当独特。重要的艺术家、哲学家或诗人并不比我高明。我们都是相同的人,地位相同,属于一体。想排挤其他人的人,只孤立了自己。但我已有了生活。”在天才面前并不阿谀奉承,而是平起平坐交换观念。写作艺术与生活艺术,互相补充,互相依赖,透过谈话和友谊而更深入。我在赫尔曼·克斯腾(Hermann Kesten)回顾生命的作品《咖啡馆中的诗人》(*Dichter im Café*)中体会到列文式的平等对待,那部作品中的柏林与柏林人还算过得去(“一直是德国大城市人口中

唯一的世界公民”):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嘲讽过拉尔的一位女演员朋友,她“说了歌德的《伊菲革涅亚》(*Iphigenie*)极为不堪的事”,且“不懂得自己的角色。拉尔反驳:‘够了,她扮演她,让批评家去发牢骚。要求这位美丽的女子发牢骚,就像要您,我亲爱的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去演戏。’”克斯腾感到着迷,因为他不停引述她的话:“总是爱着同样的或其他的東西,就意味着能持久爱着。什么都不能爱的话,就是反复无常!”对她让她的沙龙客人“感到实至名归与宾至如归”的能力,她表示:“我只会指责我的朋友。我的自由意志、我的骄傲、我对任何偏见的歧视,留给最聪明与最亲密的人。但在我这聚会的各色人等,我必须无偿展现出善心与优雅,就像茶或冷饮一样。如果我们想要让人满意,那就必须沉默与说话一起来,而不是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是要听别人说话。”我还读到,她一点也不漂亮。这个说法留存了近两百年之久!这种愚蠢、狭隘的美的概念,实在奇怪——男人臣服在她脚下,但在其他事上,他们仍然用下半身思考。

但听到这位自信的女子放弃了她的名字,以弗里德丽克(Friederike)之名受洗,还是让人感到可怜伤心;她在结婚时,改宗她丈夫的信仰,以符合传统,迁就基督教徒的傲慢,不让她从政的丈夫过于难堪(然而,这仍是自由意志的过错)——回头看,犹太人迎合东道主文化(似乎他们永远注定是客人)的企图,几乎徒劳无功。

1793年起,拉尔·列文在她耶格大街(Jägerstraße)54号父母住处的阁楼房间中,举办了她的第一个沙龙活动,1819年起,她以弗里德丽克·范哈根·冯·恩瑟之名在法国大街20号(弗里德里希大街

角)举办第二个更具代表性的沙龙。她被葬于十字山三位一体社区的墓园,巴鲁特大街(Baruther Straße),墓地 VII-2-39。

拉尔不是柏林浪漫派唯一的沙龙仕女。赫尔曼·克斯腾表示:“亨丽埃特·赫茨(Henriette Herz)、拉尔·范哈根、多罗特娅·施莱格尔(Dorothea Schlegel)、贝蒂娜·冯·阿妮姆在各自的沙龙中互较高下。这些仕女会接待部分同样的大人物。美丽的亨丽埃特·赫茨的沙龙中有过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后来多罗特娅的丈夫)、范哈根·冯·恩瑟(后来拉尔的丈夫)、弗里德里希·根茨(Friedrich Gentz)、威廉和亚历山大·冯·洪堡(Wilhelm & Alexander von Humboldt)兄弟、米拉伯(Mirabeau)、路德维希·伯恩(Ludwig Börne)、策尔特(Zelter)、沙米索(Chamisso)以及她的情人——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玛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这些沙龙不只是17及18世纪法国后来才进口德国的社交聚会时尚,其重要性并不限于那群具有艺术判断力的次要的受教育公众。那里是当代激进人物的聚会场合,是一个动荡年代自由交谈的地点,这是在巴士底监狱陷落后,最麻木不仁的人都无法幸免的年代。活跃在沙龙中的,绝不只是贫困无依与需要保护的艺术家。亨利希·海涅在拉尔·范哈根·冯·恩瑟家中展开其文学生涯,不过是个例外。亨丽埃特·赫茨的情人——弗里德里希·施莱尔玛赫,和威廉·冯·洪堡一起推动成立大学,洪堡自己也以部长的身份和哈登伯格·普鲁士(Hardenberg Preußen)一起代表出席维也纳会议,后来也出使伦敦。拉尔的第二个沙龙出现在洪堡的德国教学制度改革失败的卡尔斯巴德(Karlsbader)决议时期。那时决议的反“煽动性活动”的措施,严格

监控着大学,并加强言论检查。洪堡拒绝这些决议,因而被开除。相反,梅特尼希(Metternich)的亲信弗里德里希·根茨则从一位革命观念的热情拥护者,转变成君主体制的政治思想家。

就在大学受到政府代表监控,威胁开除不受欢迎的教授,并且学生必须取得“品行合格的证明”之际,沙龙成了保护自由交流思想的空间。对参加者而言,在每日被人嘲笑蔑视(蠢行还火上加油),还碰上那些死记强背、遵守规定的人后,那里让人精神为之一振。这种晚上的聚会,不是伪装的开始,而是结束!

但对亨利希·海涅来说,拉尔的沙龙还有另一层意义:在她那里,他可以犹太人的身份出席,不用伪装。解放犹太人也属于普鲁士的改革之一。当他来到柏林时,一点也未感觉到犹太人受到平等对待。他觉得受到排挤与歧视,摆荡在自傲与心灰意冷间。“我整天感觉到一股永恒的猜疑,到处都听到我的名字,之后便是一阵嘲弄的笑声。”信里的另外一处也指出这点:“生病、孤立、受到敌视、无法享受生活,是我在这儿的境况。”后来他写道:“我很后悔改变信仰,我根本看不出自那时候起我的境况有变好,相反地,反而只有不幸。”坐在这些人之间,靠着背叛来换取这样难受的位置……他的连篇组诗《归乡》(*Die Heimkehr*),先是在《旅行心影录》(*Reisebildern*)中出版,跟着编入《歌之集》(*Buch der Lieder*)中,海涅把这两部作品都献给“弗里德里克·范哈根·冯·恩瑟”。

咖啡与墨水

咖啡屋文人赫尔曼·克斯腾不只是古斯塔夫·奇朋霍尔(Gustav Kiepenheuer)出版社的编辑与文学线负责人,也是具有集权主义思想的作者的死敌。身为流亡者,他认识了被法西斯与集权政权驱赶到可以暂时让人感到安稳的乡间或城市中的流民。我在他的书中查阅戈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时读到:“我说,那是爱伦·坡(Poe)的学生,象征派的学生。在德国也有这类人,没有道德的唯美主义者,如戈特弗里德·本恩。”我查阅贝尔托·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时读到:“但那四位‘新现实派’的创始人,四位背离浪漫派的作家,约瑟夫·罗特(Joseph Roth)、贝尔托·布莱希特、艾利希·凯斯特纳(Erich Kästner)与赫尔曼·克斯腾,只有布莱希特把‘新现实派’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如他的《措施》(Maßnahme)一剧,在文学中鼓励谋杀。”

他在之前几页写道:“当我在‘千年’后第一次来到柏林时,在1950年7月,那里又有许多俄国人,他们这回住在菩提树下大街、亚历山大广场与潘科(Pankow)。其中再也没有公爵,他们典当的不再是宝石,而是自己的誓言,没有跳舞的白俄罗斯人,没有社会主义分子、自由派、反动派及‘提前出现的法西斯分子’。他们是穿着制服、开拔而来的红俄罗斯人,有着一致的想法和说法。在其他人心所在之处,他们全都佩戴着斯大林像,有的还有一颗星,一颗苏维埃的红

星。他们不再在飘着丁香的小餐厅卖着罗宋汤和水果薄饼,而是在他们的报纸和相配合的杂志上,贩卖贝尔托·布莱希特这位‘原创天才’的《小米歌》以及奥地利的备用护照与瑞士储备银行的账户,他在那首《小米歌》中颂扬斯大林这位农学家,出于类似的理由,西里西亚地区(Schlesien)鞠躬尽瘁的和平主义者阿诺德·茨威格(Arnold Zweig)的《燕麦歌》也歌咏着同一人,贝尔托·布莱希特的小米就是阿诺德·茨威格的燕麦,而美因茨(Mainz)的斯大林奖得主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在约纳斯·贝歇(Johannes R. Becher)的《星期日》中分析布拉格城中装饰着的马克思主义的橱窗,也写下欢愉的副刊小品,还有那位得奖却空洞的贝歇为斯大林殿下毕恭毕敬所写的国歌。”

但克斯腾对像赫尔曼·康德(Hermann Kant)这样的人会写些什么?他在1978年担任那个位于弗里德里希大街169及170号的并不讨好的东德作家协会主席一职,照管着取消比尔曼(Biermann)国籍后留在国内的作家,对他们采取考察行为端正与在危困之际团结一致的混合策略,那一般是用来供养国家诗人,而有需要时,便提供国安局情报,而且良心无愧,直到今天还敢上脱口秀,如果有些人(大家都已见怪不怪……)认为他不正直,他还觉得十分奇怪。但众所周知,时代改变了,这位前任官员在麦克风前说的话也跟着改变。然而,遗憾的是,并非如此:他一点也不觉得遗憾。当时便是如此,今天则不同,不过并没好到哪里去……

少数忠于东德、无法分辨的人士同意这点。电视娱乐的恐怖时刻:最近是因为他在过去东德文学旗舰的建设(Aufbau)出版社的新

小说出版,讲述一名六八世代的老人伦克维兹(Lunkewitz)的新转变,他热爱古巴雪茄和东德以受到恶意毁谤的人权价值为名展现出来的倔强反抗。

3 从菩提树下大街到波茨坦广场

咖啡、瓦斯与电灯

“目光自在地看着社交人群。记者们一视同仁地和人群打着交道。喜欢开玩笑的银行家说着格兰德(Gründer)的橡皮车,他们‘穿着袜子的魔鬼’,柏林人这样称呼这辆新款的汽车。到处都是重要人物:作家、诗人、教授、一堆美女、风度翩翩的骗子、留着鬃须的英国人、比手画脚的法国人、穿着黑丝绸的中国人。报纸窸窣作响,侍者的燕尾飘动。服务看来周到。”那是弗里德里希大街角传奇的波尔咖啡屋(Café Bauer)大厅给人的印象,被克劳斯·奇本波恩(Claus Siebenborn)温柔地加以修复,他的《菩提树下大街:柏林名街风情画,1647—1947》(*Unter den Linden. Galanter Bilderbogen um Berlins berühmte Straße. 1647—1947*)一书可说是这条成了残垣断壁的大道的终曲。

这间咖啡屋为客人提供了六百种报纸,主动给客人送上他们家乡的报纸,是这家店的一项特殊服务。衣帽间的服务生悄悄地察看客人大衣中的公司名片。不过,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入。门房会礼貌性地拒绝衣着不合适的客人。各地的民众来到这里,有些人只朝里头瞧上小半个钟头,接着就得回到弗里德里希大街车站。在贴着金箔的铸铁阳台后的二楼,不赶时间的人可以待在仕女间、撞球室或阅读间。一起来的客人可以有自己大厅,而谁想试试运气的话,可以坐到赌场大厅的桌前。1884年,这个上流社会的波尔咖啡屋成了柏林第一个使用电灯的店铺。

奇本波恩提到1888年8月30日这个大日子,菩提树下大街“第一次亮起了一百零八盏电灯”。波尔咖啡屋前的客人和对面的克朗



波尔咖啡屋一角,R. 克罗斯曼绘图(约1896年)

兹勒(Kranzler)糕点店都感到兴奋。“十点左右,那里响起一阵神奇的叫声:‘电灯。’新旧照明同时亮了起来。但真是天差地别!老旧昏黄的煤气灯几乎显得无地自容,过了一会儿就被灭掉。首批现代灯泡发出仿佛太阳的灯光,路过的行人说着:‘我们辉煌的大街卧在蓝白色的宁静灯光下,上头是没有星光的幽暗天空,在树梢上方,发光的灯泡宛如星辰,如此光明,在它下方每一处都可舒舒服服读着最小的字体。’”

这种进步让人讶异无比,完全不像今天,还有人几乎渴望见到几盏煤气灯,要亲自前往柏林,在未被战争所毁的老住宅区欣赏一番。1826年9月19日引进煤气灯,或柏林第一间维也纳式咖啡屋,也被当成进步来看:“我们告知贵族人士和可敬的市民,让他们知道菩提树下大街和弗里德里希大街交会之处(第一大厅左侧),克朗兹勒皇家糕点店开了一间咖啡屋,出售各类饮料和不同的甜点,服务周到。来自美丽的意大利的乐团为贵客们伴奏,增添相应的气氛。管理部敬启。”还有比这更迷人的邀约吗? 社交人群在当时也是新鲜玩意的街边露台上,亲历瓦斯灯的首演。奇本波恩让一名宫女示警:“美德岌岌可危。要是瓦斯灯继续发展下去,我们会陷入罪恶之地。”因为人工照明引诱男女两性夜里还在街上活动……克朗兹勒糕点店有全城第一间吸烟室。户外抽烟遭到禁止。而今天挪出非吸烟区,却被视为进步。

世界之门

经过曾是霍夫曼(E. T. A. Hoffmann)《夜曲》(*Nachtstücken*)中“荒屋”所在的俄国大使馆,也经过在固定的广场上英国大使馆那栋安置工作同仁、颇受争议的新建筑所在的威廉大街(Wilhelmstraße),经过新的阿德龙(Adlon)饭店,我们一路走向勃兰登堡门(Brandenburger Tor),那刚翻修完成的最后一座城门。

2003年10月3日,时尚大师威利·伯格纳(Willy Bogner)揭开罩住大门与鹰架几乎两年的德国电信布幕的拉链时,我坐在屏幕前。拉链的拉把是个大B。这个建筑的翻新工程并未花纳税人一分钱。古迹保护基金会鼓动赞助人将这遮篷当成他们大T商标的巨幅广告看板。每隔一段期间,广告商都会在勃兰登堡门换上更新、更好玩的广告。在日本与韩国举行世界足球赛时,门柱穿上了足球袜与球鞋!第一次见到这座城门穿上衣服时,我哑口无言。

这有时真的很幼稚:我一直把这个标志当成一种历史圣地,不一定是我的,而是这座城市的,甚至是整个国家的。当围墙(东德应该把它当成广告看板出租)还在的时候,人们爬上安置在那儿的眺望平台,想看得更清楚:那是德国分裂的象征。拿破仑知道这点,纳粹知道这点:历史的胜者穿过这些门柱。俄国人也知道这点,在勃兰登堡门上升起锤子与镰刀的红旗,展示他们的胜利。

我们这时说的,是一个回忆的地点与回忆的文化,把这个具有纪

念价值的城门当成超大型的海报墙，贱卖给一名赞助商，他们则支付原本联邦德国应该可以为这重要建筑筹措到的费用。要是德国电信这个过去的国营企业能够提供修缮经费，而不打上广告的话，或许更能展现风度。德国电信如果能尊重这座建筑，那会在德国引起“轰动”，用前德国总统赫尔佐格(Herzog)的话来说，令人无比吃惊。为什么大家不干脆出租德国国旗，在最上面缝上一个粉红色的 T？反正也不一定永远这样。

不过一切都很顺利。单单看一眼勃兰登堡门，来一趟柏林就值得了。修复师殚精竭虑，保证未来两三个世代都可放心，这座城门不会再被遮盖住。

柏林的客厅——巴黎广场(Pariser Platz)也初具形貌。法国大使馆完工，艺术学院的工程紧接而来，就算现在正好停工，这个重要的新工程地下室到处在发霉。艺术学院属于这座广场。1932年12月，在德国权力更迭之际，大部分成员被驱逐出境前，诗艺部门最后一次大型会议在广场南侧的阿宁宫(Arnimschen Palais)举行。弗朗茨·魏菲尔(Franz Werfel)朗读了部分他的大部头小说《慕莎·达格的四十天》(*Die vierzig Tage des Musa Dagh*)。亨利希·曼(Heinrich Mann)是诗人学院的主席，奥斯卡·罗尔克(Oskar Loerke)任秘书。不久后，新作家进来，其中包括威尔·威斯伯(Will Vesper)，是1971年自杀的伯恩瓦德·威斯伯(Bernward Vesper)之父，他的小说小品《迷幻药之旅》(*Die Reise*)亦是一趟家庭历史之旅。每个新的政权都需要一些重要人物，好向外国夸耀。但斯蒂芬·格奥尔格(Stefan George)拒绝受聘，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则像

个人文骑士十字勋章得主那样拒绝：“我的作品独特之处在于其中重要的军人性格，我不想受到学院的影响。”读过《工人》(*Der Arbeiter*)一书的读者，可以对这种性格有大致的印象。

1920至1932年，马克斯·李伯曼(Max Liebermann)为艺术学院院长，住处与工作室位于城门北侧7号的房子。战后，房子的废墟被拆除。今天的李伯曼之屋则按照原建筑的比例重建，一间模仿早期壁炉间的房间，让人想起这位著名的柏林分离派(Sezession)^①人士，他死前两年，由于抗议纳粹的艺术政策而离开了学院。

巴黎广场周围的新建筑引起一些争议。根据柏林州政府的决议，在重建之际，应该要维持广场的比例与大小，也颁布了相关的建筑规定。这个新的方向甚至还有个名称：“批判式重建。”结果既不糟糕，亦不成功，而是介于其中，一种混合的建筑群，令观者有强烈的平静效果。尼古拉区风格的那种拙劣建筑及强烈现代主义甚至未来主义式的城市建设规划，倒是受到阻止。在历史造成这座城市外貌的所有创伤后，许多居民都需要一种精神上的解脱，希望在工匠撤离后，能再认出他们的客厅。我认为这些建筑迎合了这种渴望，未完全按照计划去执行。毫无疑问，是一种妥协的解决方式。

比较新旧的阿德龙饭店，也可看出这点。饭店正面被弄平整，地面面积加大，面向威廉大街的街角建筑被纳入进来，并透过减低楼层高度多出一层楼来，内部装潢则按照当代的要求。这些要求很高：世界各地的国宾现在又在阿德龙饭店过夜，在总统套房住得安全舒适：

^① 德国19世纪末的艺术流派。——译注

玻璃窗本身可以抵抗反坦克飞弹发射器。贵宾的报纸自然会被熨烫过,因为手指是不能沾上印刷油墨的。我们自己也该享受一下:随着丰富的早餐和熨烫过的日报来展开一天。

保罗·策希(Paul Zech)在他的《阿德龙饭店的下午茶》(Fünfuhr-Tee in Adlon, 1924)一诗中,已经嘲笑过“那些大家乐于忘记的所谓大人物之间的互比”。但正是这种接近大人物、美女与重要人士的机会,在今天又再赋予这间饭店魅力,甚至大到在几年前吸引克里斯蒂安·克拉赫特(Christian Kracht)周遭的文艺公子哥儿们前来阿德龙饭店参加一场流行文化研讨会,不过却是一无所获。他们毫不拘束地聊着时代精神、名牌与时尚,带点自嘲,把他们在书中出版的观点说成极度的忧愁。我们还会再见到那位已被遗忘的地方记者保罗·策希。他在波茨坦广场收集着各类印象。

控制学习目标

我们经过了未来美国大使馆所在地,他们和建筑委员一起争取到几平方公尺的建地,仿佛那是一场关键性的战役。美国人要求有足够的安全距离,为了他们,贝伦大街现在特意往南移了几米,牺牲掉了欧洲犹太人亡灵纪念碑。那里的工程现在终于展开,至于是不是要用德固赛(Degussa)保护漆来阻止可能会有的涂鸦,最近还在热烈讨论着。众所周知,德固赛的一家子公司在40年代生产了那种致命瓦斯 Zyklon B。身为社会民主党的基督教徒及东德民权分子,在

那注重人际关系的西德政治事业中快速蹿升的联邦议院主席沃夫冈·蒂尔泽(Wolfgang Thierse),只能一直在那儿调停仲裁。大家围着纪念碑无休无止地激烈争论着。特别是犹太人方面,大声提出合理的质疑,例如,到底是谁为谁在这里设置一座纪念碑:是德国人为犹太人(他们从未要求过),还是德国人为自己及他们高尚的内疚。当委员会发现一座纪念碑绝对不够,而是迫切需要一个具有教诲意义的附加建筑时,事情就变得很德国了。未来参观纪念碑的人,会来到一间地下展览及文献资料室,会知道自己为何踏入这个被扩大的石碑所在。专家透过这个具有教育意义的附属物件,认为半个德国都不能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历史认知有所谓的历史查验方式或标准规格的话,那德国老师们便可将其导入德国人的良知中了。新的安全别针让这个纪念碑变得有教育意味,让大家的注意力由艺术品,转移到当然也记录了整个计划形成过程的评论上。所以,我们下一步来看看一部历史批评的作品集。

全世界通用?

我记得的波茨坦广场,就像《柏林苍穹下》(*Der Himmel über Berlin*)那部电影中的样子。在片子中,年迈的库特·波依斯(Curt Bois)迷失在城内的草原,找不到广场。他应该可以认出在老波茨坦大街(Alten Potsdamer Straße)的胡特(Huth)之屋。在战后及紧接而来的清理工作后,在一间饭店的废墟旁,这栋房子成了唯一保留下

来的建筑。“波茨坦广场上的最后一栋屋子”(沃夫·提默〔Wolf Thieme〕)离围墙不远,显得如此孤单落寞,仿佛被冻住了似的。这栋屋子依然孤孤单单,因为这期间戴姆勒-克莱斯勒(Daimler-Chrysler)计划下的不同建筑压得这栋屋子喘不过气来。一名酒商和餐厅试图承继这个传奇酒屋的传统。今天的胡特之屋建于1911至1912年。在这间曾住着原屋主弗里德里希·胡特(Friedrich Huth)的屋子和其酒馆的别墅中,一些像阿道夫·冯·门泽尔(Adolph von Menzel)及冯塔纳(Theodor Fontane)等柏林艺文界的重要人士都曾出没过,亨利希·希德尔(Heinrich Seidel)和德国全民诗社(Allgemeine Deutsche Reimverein)也在这儿集会。战后,威利·胡特(Willy Huth)又再试着经营酒馆和相关的葡萄酒生意,但最后不得不放弃。1968年,他的未亡人把屋子卖给了动物园区(Tiergarten)公所,准备在那个危险地带盖社会住宅。我们可以把这当成柏林人的幽默。在那对面(施特雷泽曼大街〔Stresemann Strasse〕和柯特纳大街角〔Köthener Straße〕),坐落着波茨坦屋,在开幕不久后,便改名为祖国咖啡屋(Café Vaterland),相当符合1914年的狂热战争气氛。在20年代,这里改建成大型餐馆祖国之屋(Haus Vaterland)。我们看看让餐馆里有理由骚动的名字,就可以想象这些餐饮业在搞些什么:匈牙利舞曲(Csardas)、狂野西部酒吧(Wild-West-Bar)、上巴伐利亚(Oberbayern)、格林津(Grinzing)、罗文布劳(Löwenbräu)、莱茵露台(Rhein-Terrasse)、土耳其咖啡屋(Türkisches Café)……西格弗利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说得很好:“在这里,顾客反而在自己的家里作客。”1976年,市政府拆掉了剩下的娱乐殿堂。

该地最著名的咖啡馆是位于美景大街(Bellevuestraße)上的尤斯第咖啡(Josty Café),有名到连索尼总部(Sony-Centers)企划部门的建筑师都想到把模仿过来的壁饰贴成怪异的内装,藏在玻璃柜后:类似一场古意大利地区的花瓶展览,只不过大家可以走在这些玻璃柜上,在不透明的白色隔板间喝着咖啡。尤斯第咖啡称这种展示座位为刻意造假的废墟景观。

老尤斯第有许多著名客人,除了不用我再费心提到的冯塔纳外,还有年轻的盖奥尔格·格罗兹(George Grosz),坐在露台上,描绘着街道和广场上的市民。这座欧洲交通最为繁忙的广场,在一次大战前已成了大城市忙碌嘈杂的象征。老柏林的交通经过莱比锡大街(Leipziger Straße)和同名的广场,来到新兴的新西区(Neuen Westen),接到威廉皇帝纪念教堂(Kaiser-Wilhelm Gedächtniskirche)旁华丽的商业大街。1924年起,一组交通卫队搭配着交通标志指挥着来自六个方向汇聚到广场的车潮,而今天那里只不过是个大型的十字路口。

给表现主义极大鼓舞的保罗·策希,也为我们大胆深入到地下,因为在十字路口的致命交通中,地下也有活动。他在那里收集来的印象,显然连这位甚具雄心的记者也无法忍受,因为他的诗句像遭到断电的地铁一样,啪哒晃动。他的《波茨坦广场》一诗中的两段,便足以说明:

……这个交通机器的操纵杆
往往被动力回路过度使用。

只有月亮像地雷一样
在轨道间危险地徘徊。

对那些染上红色的一堆可怜虫而言
螺旋桨那惊人的速度又算什么?!
一切都得绕过它
或大老远就钻进窄窄的地下通道。

广场西侧那些令人讶异的新建筑会让人怎么想,那是观者的事。我没碰到过对那儿有好感的人,但看得出那里聚着好奇的人,想亲眼瞧瞧,体验一下这个新的柏林。一名匈牙利的艺术史家好友认为这类建筑要在几年后,甚至几十年后,才会让人从美学上去论断。但他察觉到高傲与冷酷的权力意志的姿态,试着在不同的建筑群落中表现自己。仍深陷在总理府残垣断壁的图像世界中的布利沙·巴盖尔德(Blixia Bargeld)和他的“坍塌的新建筑”(Einstürzenden Neubauten)乐团,已唱出他们未来的样貌:“一切都只是未来的废墟/是下一层的材料……新的殿堂已有裂隙/未来的废墟/过去这座城市也是杂草蔓生/就在他们的下一层上。”因为他们早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心理状态”:

“忧、忧、忧、忧、忧郁/漂浮在新城市/和这个国家上。”

4 从菩提树下大街到亚历山大广场

德意志存在

自从我在午夜时分,从市立宫殿(Stadtschloß)到勃兰登堡门随着摄影机低空飞过后,我就无法把在菩提树下大街的漫步当成理所当然的事。明镜电视台(Spiegel-TV)播出的影片来自战争行为终止之后不久的那个时代。“柏林是一张丘吉尔按照希特勒的概念所做的版画。柏林是波茨坦旁的瓦砾堆。”布莱希特 1948 年 10 月 27 日《工作日记》(*Arbeitsjournal*)中的记载,冷酷地描述出这情况。对英国记者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scher)而言,这座城市“仿佛一座保存十分良好的古代废墟”,他的同事史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看法一样:“柏林最后的日子如同远古王朝的末日一般,让人有机会沉思冥想:我们怀着同样吃惊的感觉、同样的想象力,仿佛朝着罗马的圆形竞技场走去。”

“我们又该如何忠实确切地描述这座被摧毁到无法辨认的大都会图像？”CBS 记者威廉·希勒(William L. Shirer)问道。“一个曾经强大却不再存在的民族的图像？一个征服的民族的图像，在我五年前(1940)离开这里时，还自恃甚高，残酷无比，盲目相信自己统治全人类的使命——而现在见到这个图像在废墟中沮丧、麻木、颤抖着；饥饿的人们没有意志，没有生活目的或目标，像找着食物或栖身之所的人，只剩下动物的本能，希望能活着度过明天？”

德国这个末日景象的节目，对阿尔弗雷德·德布林(Alfred Döblin)的打击一定更大。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Berlin Alexanderplatz*)一书中，他让这座城市在灭亡前再次发声。没人比德布林更了解柏林。他参观废墟，有如一场《命运之旅》(*Schick-*



阿尔弗雷德·德布林
(1878—1957), 1928年

salsreise):“这是鬼魅出没的主要场景,犯罪在这儿蔓延,民众装聋作哑,还有唱着歌的青少年,狂热的观众。街道内的喧嚣,回荡在墙面间,现在直扑过来。这里的人都试着躲避惩罚。以前住在这里的,一定没有参与那百万人的行列,他们只是旁观这场魔法盛会。但接着他们的屋子被推倒,人被杀。历史上的判决如此骇人。这一切离过去十分遥远,已非我所认识的那一切。但又以新的方式向我靠来:被上帝的光芒笼罩。……大家必须久久地坐在废墟之间,体验着废墟,彻底感受着痛苦与判决。是的,这和我息息相关。”

1945年,柏林是德国与欧洲最大的废墟地带;按美国总统顾问哈利·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的话,柏林是“第二个迦太基(Karthago)”。受创最重的是中心地带,最内围地区完全在无望地“捍卫着帝国首都”。军队的任务为:“捍卫首都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5月2日,就在阿道夫·希特勒于总理府中自杀后两天整,“柏林战役”终于结束。在3月时,希特勒还对他的国防部长解释:“如果战败,整个民族也会失败。不需要考虑到德国民族存活的最原始需求,相反地,最好是自己来毁掉这个玩意,因为人民就是那样不堪一击……”斯佩尔(Speer)毕竟在尽力阻挠他偶像所谓的尼禄指令,不然情况将更加凄惨。按希特勒的想法,德国人错失了自己的生命权。“这场战争剩下的,只是些没什么价值的人,因为好的都死了。”

我们这些没什么价值的人和没什么价值的人的后裔,继续以德国人的身份活着。“再也没有德国!”这也是把人民和敢死队混在一起的希特勒的想法。我们想吹口哨或大笑,我们躲过了这场集体的

疯狂,但接着晴朗的天空又暂时乌云密布,千百万的受害者让人心情阴沉下来。如果我们诚实的话,就得承认,没人知道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在这个停尸间(例如柏林)到处漫步而不会立刻发疯。这些受害者和我们牢牢绑在一起,拉着我们来到回忆(被回忆)和羞耻的深渊。我们发展出摆脱他们的策略,盖起纪念碑,定下纪念日,照顾着暴行地点,像照顾着邪恶的花园,把他们绑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中——而不是和我们绑在一起。我们“克服”过去的企图显得如此无助,令人感动。每次,我都会对我的同胞在这样一个纪念活动中的脸孔感到吃惊:他们表态性的、按期流露出来的纪念日悲痛,讲演者的激昂情绪,以谙熟于心的词汇结结巴巴说着“我们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仿佛在念一段外文文章,他们对自己道德补课的成功,像补习生一样骄傲……我们只等着那种历史时刻:一名联邦总统或其他我们国家的代表失去自制力,再也忍受不了这种认真的情形,发疯大笑,永远摆脱掉为我们根本没有的共同罪责找话说的义务。但他们(为我们)撑了下来,不断演出这个改宗者的社会教育戏码。自希特勒后,我们被迫要做好人。这让我们的德意志存在变得很辛苦。

向后做梦

在辛克尔(Schinkel)的新岗哨(Neuer Wache)和贝伯广场(Bebelplatz)间,有米夏·乌尔曼(Micha Ullmann)为纪念1933年5月10日焚书事件而设计的“失落的图书馆”纪念碑,弗里德里希二世

朝着市立宫殿的方向骑着,仿佛不在乎他的后裔似的。他对联邦德国中央纪念馆(“一个回忆纪念战争与暴政受害者的地点”)周遭的繁忙、喧嚣的车阵和安全岛上那些缤纷的熊雕像无动于衷。他来自另一个时代。在他登基的第三周年,这尊骑士雕像揭了幕。十一月革命伤了他,二次大战时,雕像被砌在墙内避开流弹。当战后的官方人士认为弗里德里希和他的国家是德国走向灭亡的特殊道路的前驱之一时,就在他们炸毁市立宫殿的同一年,他们断然移开了他。盟国管制委员会解散普鲁士,纯粹是形式。这个德国的斯巴达政权最后被埋入战争的废墟之中,史家把其结束时间订在1918年(皇帝逊位)或1933年(赫尔曼·戈林〔Hermann Göring〕成为总理)。政治上死亡,历史上苟延,政治哲学不正确,艺术上不迷人——普鲁士可以被割舍掉。那在两个德国中所惯于虚构的归零时刻,也就是一个真正的新生,容不下多愁善感,也只在能编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或资产阶级资本主义之路的地方,才会追溯传统。在西德,“普鲁士”这个概念成了爱好者与价值保守人士的东西;在东德,除了军队以外,则长期以来是种禁忌。奇怪的是,联邦德国对普鲁士再度感到兴趣和东德官方对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朝成就的重视,在时间上恰巧吻合。1981年,在马丁-格罗皮乌斯博物馆(Martin-Gropius-Bau)的大型普鲁士展,和一年前菩提树下大街那座国王骑士雕像再度隆重安设一事,倒是一致。从80年代的普鲁士再现,到90年代关于市立宫殿重建一事的激烈辩论,这条线索直入我们当代,并触及联邦首都如何处理普鲁士这个主题的问题。

如果需要一个我们活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证据,那柏林和过去

那个流氓国家自然而然且符合时代的表征。对辉煌与美丽,对治愈伤口,对艺术史上所证实的伟大的渴望,强烈到要不是经费有限的话,大家很想重建整条菩提树下大街。在关于宫殿的辩论中,大家很典型地问到这种大型建筑的用处。也很正确地论述到,没有市立宫殿,菩提树下大街便少了建筑艺术上的完美句点。这条大道的视界轴线,在共和国石棉翻修过的宫殿的粗糙墙面惨兮兮地结束。对当代建筑艺术的信任,似乎并没有给人深刻印象。几乎具有表决权利的人,都不主张以现代方法来解决。难道现代创伤了人类?

我有个梦。我飞在一栋方正的大建筑上,可以透过平面的玻璃屋顶看着室内。我见到一座光线弥漫的内院全是人。他们前来参观这栋在以前市立宫殿所在之处建起的大型艺术之屋。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在这栋建筑内生活工作,在我飞翔的那一天向参观者展示他们的作品。现场举办着一场音乐会。一楼的展览厅旁有咖啡馆和餐厅。楼上是住处与作坊。这天颇为特别:访客可以例外地从周围的阳台向下欣赏大厅里的热闹景象。其中一些人下午时已参观过对面博物馆中的艺术品;但现在他们要瞧一眼现代艺术。柏林艺术之屋闻名世界。在那儿,整年都能见到艺术家、画廊人士、收藏家、批评家与艺术爱好者,他们在此可以发现天赋的人,和他们对话,远离那已僵化的现代艺术。晚上,作者们读着自己的作品,电影制作人展示着他们的成品,音乐家在演奏。人们谈论着这个柏林人在此实现的第一个真正的世界艺术论坛。

这栋建筑的外观也得到称赞。在四根钢柱上架起的巨大钢架结

构,构成了简单的架构。我们可以看到过去宫殿的残余墙面嵌入侧面的结构中,著名的爱欧山德门(Eosander-Portal)也是如此,访客穿过此门便进入该宫殿历史的展览中。

宫殿的广场改成了一座树木公园。开始时,每位艺术家从自己家乡带一棵苗木来到柏林。世界上各种树木围绕着广场中心,那儿没有名字,只有一个数字:是其在我们共同居住的地球经纬度上的正确位置。

城市之眼,大陆中心

建筑师说的是另一种语言,既诗意,又专业,既有想象力,又脚踏实地,既兴奋,又冷静。他们集未来的工程师与冷静算计的现实主义者于一身。靠着犹太博物馆在城里留下自己品牌的丹尼尔·李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称亚历山大广场为“城市之眼的瞳孔”,位于“弥漫着历史的仓库区和卡尔·马克思大道(Karl-Marx-Allee)旁的住宅区间……城市之眼的瞳孔”,是他们“最有远见与最黑暗的地带”。对这位怪异的幻想者来说,亚历山大广场是“欧洲大陆的大广场之一”,他在自己的新构想中,赋予广场一个重要的中介功能,不只是连结起不同的城区而已。在“东西两方的关系网中”,广场未来负有其欧洲规模的重要意义。

广场的未来似乎已经决定。汉斯·柯尔霍夫(Hans Kollhoff)赢得了公开的竞争,他的规划中有新的拆除工程及高达 150 米的办公

商业大楼。一种溯及过往的解决方式已不可能。这个广场没有人们有兴趣重建的过去。就连都柏林的亚历山大广场也是个建筑工地。“亚历山大广场上，蒸汽打桩机在阿辛格(Aschinger)面前轰隆隆敲击着，那机器高达一层楼，轻而易举地把钢轨打入地里。”“到处铺着木板。”“亚历山大广场的风大，在提兹(Tietz)一角尤其强烈。风吹进屋内和工地坑洞中。”“不管有没有风，拿过咖啡壶，抓起三明治，我们必须辛苦干活，那些睡在自己羽绒被中剥削我们的寄生虫正坐在上头。”“阿辛格有间大咖啡屋和餐馆。没肚子的人，可以弄个肚子，有肚子的，可以看看自己愿不愿意加大。”

那是 20 年代末。提兹早就没了，现在换上一间几年前还叫做中央商品屋的百货公司，阿辛格也已不在了。在卡尔(Karl)和奥古斯特·阿辛格(August Aschinger)兄弟的分店中，可以吃得又快又便宜，啤酒可以一杯接着一杯。不需要任何特别的阶级意识，便可明白在仓库区的破烂住所和附近普伦茨劳堡(Prenzlauer Berg)及弗里德里希树林区(Friedrichshain)的出租房舍中会爆发何种社会动力。德布林呈现得最为清楚，他并未揭发，而是怀着同情心伴随着他那位摇摆不定的政治上犹豫不决的主角弗朗茨·毕伯寇夫(Franz Biberkopf)，甚至在他不得不看着他的被保护人手里拿着人民报刊想赚几个马克的时候：“他并不反对犹太人，但他要维护秩序，因为秩序一定是在天堂之中，每个人大概都这样看。还有钢盔，他见过的小伙子以及他们的工头也这样看，就是这样。”

德布林“比大多数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更熟悉北边和东边的穷人。在讨生活的职业中，他是一位精神科医生，更准确地说，是疾病

保险医生，也就是法兰克福大道 (Frankfurter Allee) 上的穷人医生……在共产主义作家做着革命的梦时，德布林创作了一个可以让人看出为何 30 年代大部分所谓的无产阶级投奔到纳粹的人物”，城市文学的专家米歇尔·宾内特 (Michael Bienert) 在《柏林：走在城市的文章中》(Berlin, Wege durch den Text der Stadt) 一书写道。这也让当时部分市民印象深刻，他们在《柏林亚历山大广场》可以发现“十分成功的企图”，“将我们当代无产阶级的事实提升到史诗的范畴”，正如在无产阶级生活与存活问题上受人认可的专家托马斯·曼 (Thomas Mann) 所尴尬地注意到的那样。

在前身为柏林城市酒店 (Hotel Stadt Berlin) 的公园酒店 (Park Inn Hotel) 北侧，到了冬天，酒吧里喝醉的人会在车站挤在观光游览巴士中间打着哆嗦，等着他们的夜间公车，他们在对面的墙面上读到德布林式的威胁：“亚历山大广场上的严寒再见了，明年，1929，还会更冷。”当我在夏天读到时，也不得不感到寒冷。2004 或 2005 年会有多冷？破产威胁着这座城市。我们住在一名女乞丐体内。

对西德人而言，见到亚历山大广场会大吃一惊。下车时，脑袋里想着德布林，口袋里装着他那本著名的书，当然不一定会失望，失望的往往只是那错误的期待。要在广场和书之间找出关系，我们必须在脑海中继续写这本小说，直到毕伯寇夫死去，甚至还要继续下去，写那些所谓一个个的工地，因为这个地点注定不断被翻动。我们忘了原始场景这个浪漫的想法吧。我们有小说当纪念碑。

最后一次试图规划未来的证明都还在，是在 1964 至 1972 年，简直丑得无以复加，两三次后，就让人不想再去理会。由于考虑到财产

关系,在西方各地只能做重点式的开发,但在这里,首都中心收归国有的地产可以进行不顾历史的大型开发计划。结果便是一个位于大而无当的城郊道路间的水泥乌托邦,比以前的大且宽上三倍,那些小型的卫星汽车在路上跑起来,显得更加渺小。在这里,人只成了点缀。只有柏罗林娜大厦(Berolinahaus)和亚历山大大厦(Alexanderhaus)躲过战争和翻新,像历史的沉默证人一般,围着这座大广场。

广场现在的样子,一种新的特价文化与水泥化的过去的乏味组合,当然配不上一座大都会。没人会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各地观光客应该要来的景点,另一方面又以它的诚实博得好感。广场纯粹是当下的产物,赤裸裸地反映出个工作机会不多的工人城市的实际状况:和波茨坦广场这个展示地点形成鲜明的对比。如果分别在这两地各待上一个小时,你就会了解在柏林得忍受的紧张气氛。

“我像拿着灯笼的第欧根尼(Diogenes),一无所获,”德布林在《命运之旅》中写道。“我瞧着从广场放射出来的大街,沿着敏兹大街(Münzstraße)晃荡着,以前这里有许多店面,也有不太正当的。这里也发生过许多犯罪事件。人群熙攘。那些店面我再也找不到了。”剩下的只是寒酸,也就是北区罗森塔勒(Rosenthaler)和卡尔·李卜克内希大街(Karl Liebknecht Strasse)间的穷困。住在那里,任何一栋建筑中的工匠也改变不了什么。当我漫步在这所谓的仓库区时,我没注意到人群熙攘的情形。屋宇和街道都沉睡着。在20年代时,亚历山大广场后方之地还声名狼藉,旅游手册都警告不要进入这个犯罪和小酒馆区的狭窄污秽的巷子。在东犹太移民和穷人的社区中,熟门熟路的小混混捉弄着无法完全肃清犯罪的警察。这里三百年前

真的有过仓库。出于安全的因素，易燃的物品必须堆放在城墙外。将国库 85% 用来治军的“士兵国王”威廉一世一声令下，1737 年这个地方划给居无定所的犹太人。19 世纪，在仓库和茅舍间盖起愈来愈多的出租屋舍，这个迫不得已的故乡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密集的住宅区，有着狭窄破烂的住房，住着只有一个遮风避雨之处的社会下层人士。东犹太移民的命运尤其艰苦，受到多数德国人及同宗的西方兄弟的敌视，他们在长期的同化过程中，部分成功地脱离了社会边缘处境。在柏林寻找落脚之处时，他们只能来到早在他们出现之前贫穷与愁困就已安身之地。1880 年代，柏林市铁的铁道工人也在这里栖身……弗朗茨·毕伯寇夫经历的实际场景就在那里。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作为人与商品转运中心的亚历山大广场只能被视为通往地狱的门户。

“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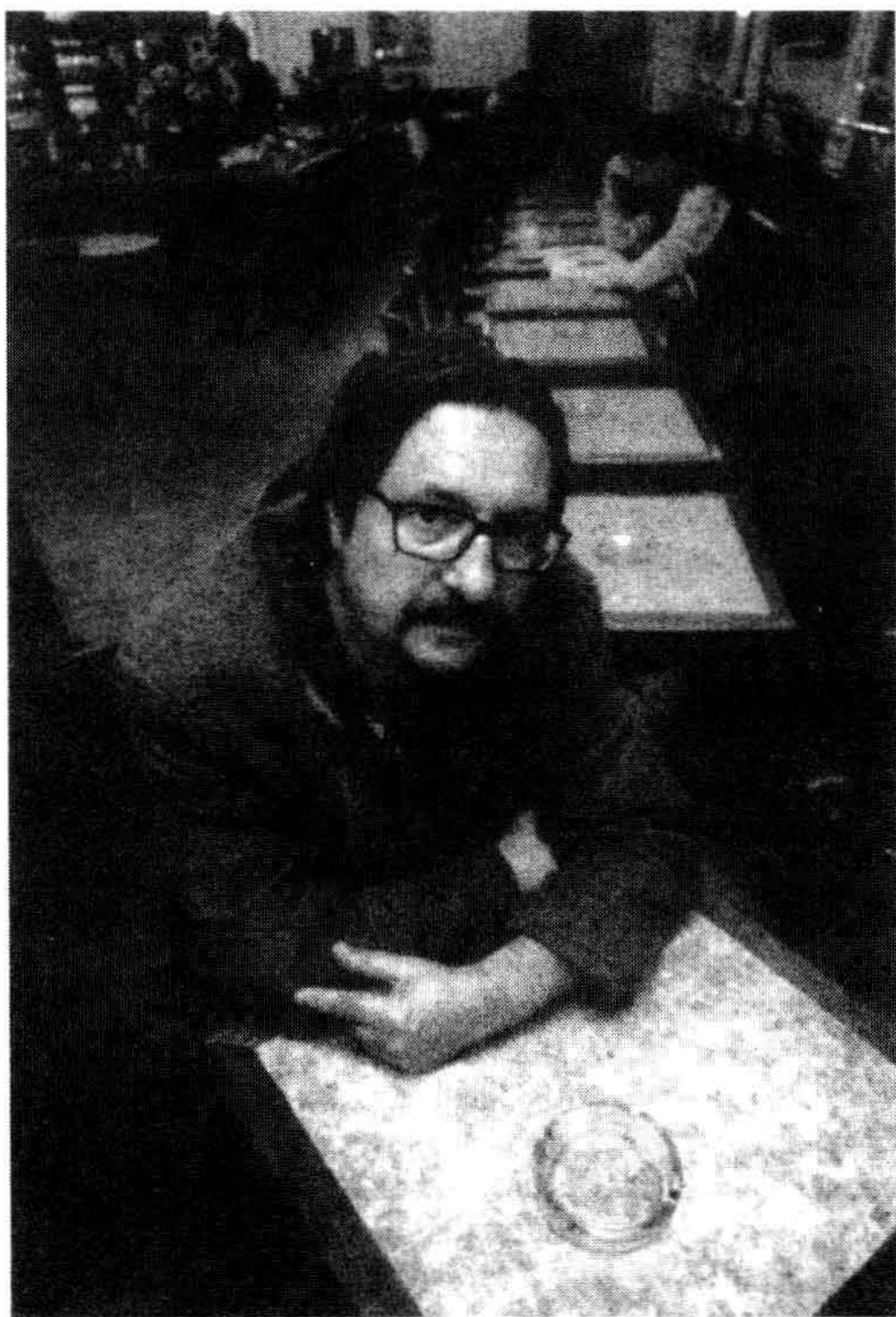
一个字在人民舞台(Volksbühne)那个类似掩体的建筑上斗大的霓虹灯中闪烁，这个地方可说是柏林最有趣的剧院，远远胜过其他剧院。直到我们这个时代，人民剧场一直小心保持着自己的东方形象。在弗朗克·卡斯托夫(Frank Castorf)领导下，这间剧院的格言可说是“你们得默默忍受”。只要一番煽动，这个受到资助的反抗巢穴便会质疑新的世界秩序。资本主义体系的内在矛盾便会在受苦的人类面前以大肆嘲讽或粗暴的方式——“只有人类尖叫出声，才会对卡斯

托夫说真话。”(罗宾·戴杰〔Robin Detje〕)——展现出来。人民剧场挣脱了传统剧院的框架。一方面演出永恒的经典,另一方面,是在舞台讨论及周末论坛中阐明立场。从来没有剧场像这里一样,在政治上的阐释如此贯彻始终。罗莎·卢森堡广场(Rosa-Luxemburg Platz)那里的房子没有堕落成教育人民的场所或好一点的人民高校,原因在于提问的方式。当工会干部宣扬工作法是宪法的目标时,人民剧场在2001年5月根据十几年既成的结构性失业状况,断然宣称人们有权怠惰,让剧场观众去谈论不工作的创造性互动。这个活动在红沙龙一场“失业人士为就业人士所办的庆典”中达到了欢乐的高潮,宣称“永远的下班”。红沙龙中的活动抓住了剧场观众大部分是年轻人的情况,因此大家把现今的人民剧场比成一个文化中心,而不是一个艺术殿堂。摇滚乐团和伴舞乐队在那儿演出,DJ播放唱片,演出有创意的电影与影像艺术,著名的作家和想成为作家的人在夜咖啡屋朗读。其他地方只是试图区分出E世代文化和U世代文化时,这座顽固的碉堡早就不再理会这种差异。在这座剧院的光芒中,“人民”这个沉重的概念反而有了一个相当怪异的新解释。

在卡斯托夫导演生涯中糟蹋了这或那部经典所引起的骚动中,我对许多在人民剧场上所展现出的人类图像深感兴趣,无涉戏剧学方法的讨论。我们真的是这些遭到虐待的人,被当时政治体制“屈辱冒犯的人”,也意识不到自己的情况,因而把不幸私有化,还是这种观点是东德所特有的?不过愈来愈少的人谈论东西德观点的对比。能说的可能是来自东德的刺激,那在西方复苏了的文化中被认为早已失落的不快。最后,建筑物前草地上的巨大轮子也搁置下来。

1989年，民主社会主义党在人民剧场对面的小亚历山大街(Kleine Alexanderstraße)上成立了他们的党中央——在一栋有着动人历史的办公大楼中。在德布林时代，德国共产党购得这座建筑，党中央委员会在里面召开会议。德国共产党的报刊《红旗》(*Rote Fahne*)的编辑部也在这栋共产党迁入后命名为卡尔·李卜克内希的大厦(Karl Liebknecht Haus)里办公。1933年2月，纳粹没收了这些房间，几天后便移交给盖世太保，他们在那儿审问拷打他们的死敌。1950年，德国统一社会党的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列宁研究院曾迁入这个恐怖之地。

许多年后，我在卡尔·李卜克内希大厦的餐厅里再次见到曼弗雷德·莫恩布里歇(Manfred Maurenbrecher)，一名德国小型演唱组合的大人物。我由于不了解状况，认为他失踪了，现在他在不到二十位的听众前举行音乐会，而观众似乎没人认识他。莫恩布里歇并未过度迷失在歌曲创作这个领域，他也不太适应德国流行摇滚那种一直荒凉的景象。安德烈亚斯·欧布斯特(Andreas Obst)写道，如果要期望“像莫恩布里歇这样的人”，那就得看得很远，说得大概没错：“在美国某地，人们见到他们坐在琴键前：兰蒂·纽曼(Randy Newman)、比利·乔(Billy Joel)、汤姆·威茨(Tom Waits)。我们很有理由想象莫恩布里歇是他们中的第四位。”我没问过曼弗雷德·莫恩布里歇，是不是觉得自己被低估了，但我估计他会否认。他视自己为一名“钢琴前的说书人”，而故事并不属于大舞台。莫恩布里歇可以靠自己的艺术生活，在他登台演出的地方也找得到自己的听众。因此他并没有不满意的理由。我推荐他的CD《白色火焰》(*Weißer*



曼弗雷德·莫恩布里歇
(1950—), 1998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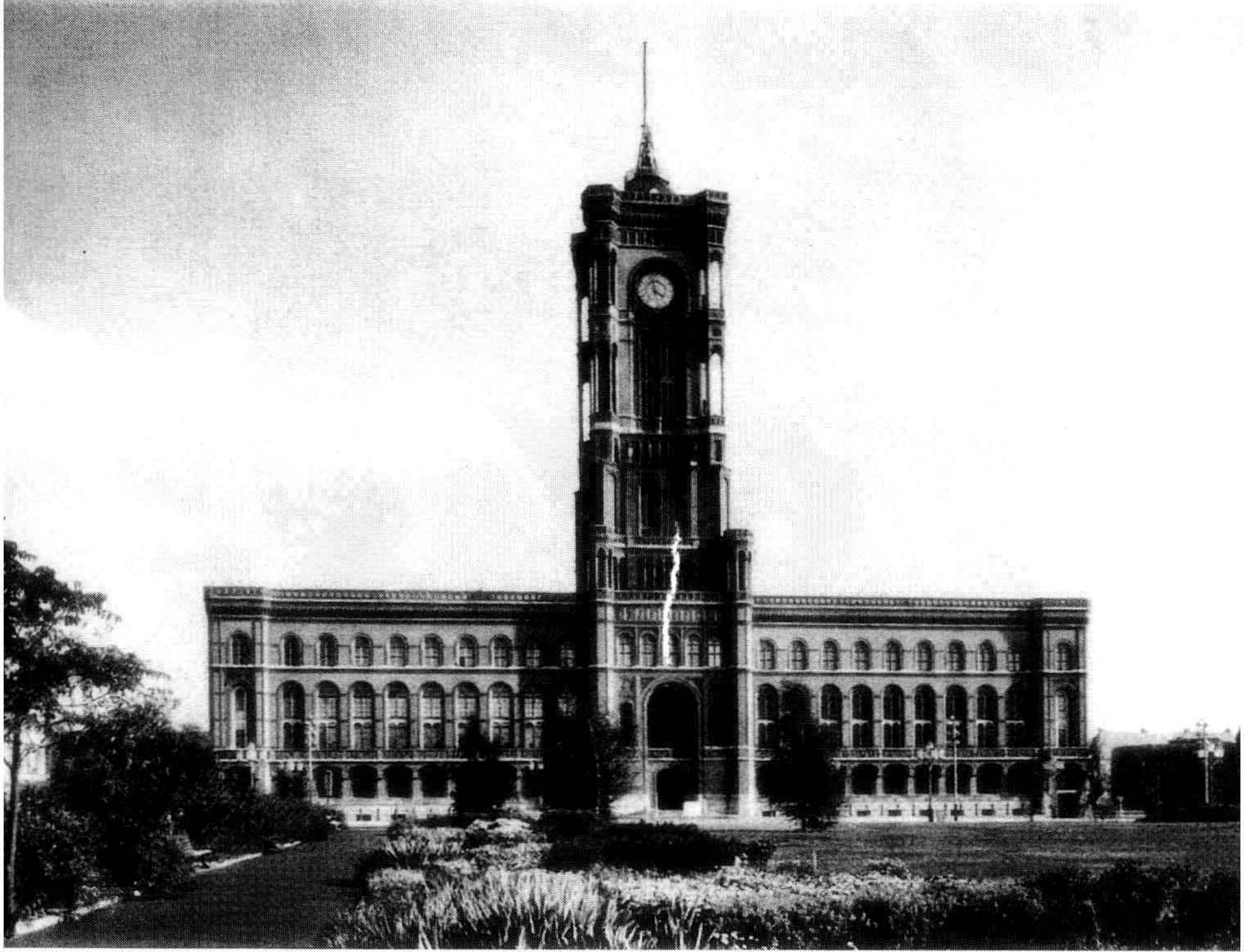
Glut)为必听的音乐,而且一有机会便去参加他的音乐会。

为了莫恩布里歇,我隔了好久,在2001年9月再次造访在托尔大街(Torstraße)的布格咖啡屋(Kaffee Burger)。“家与世界改革舞台”(Reformbühne Heim & Welt)邀请他参加他们的圈子。在这些改革人物演出之前,我仔细察看着立灯(不是落伍的设计)和有着花饰的缎纹壁纸。那些来跳舞的客人有时会靠在壁纸上,及肩高度以下的壁纸都被扯破,尤其臀部的高度最为明显。弗拉迪米尔·卡米纳(Wladimir Kaminer),柏林最著名、最受欢迎的俄国人,读着有关柏

林俄国人的段落,丹尼艾拉·波莫(Daniela Böhme)读着柏林人优于莱茵地区人之处,波夫·贝格(Bov Bjerg)谈着他母亲在施瓦本地区考驾照的事,等等。曼弗雷德·莫恩布里歇没开玩笑就现了身。他的曲子抒发出了这个世界不为人知的美。五十年来柏林人声名狼藉的嘲讽癖训练,并未驱走他的柔情。在现实生活中,宽大与自由同时隐隐约约地展开。听着他的故事,我仿佛在这个晚上回到学校那久久惦念的专注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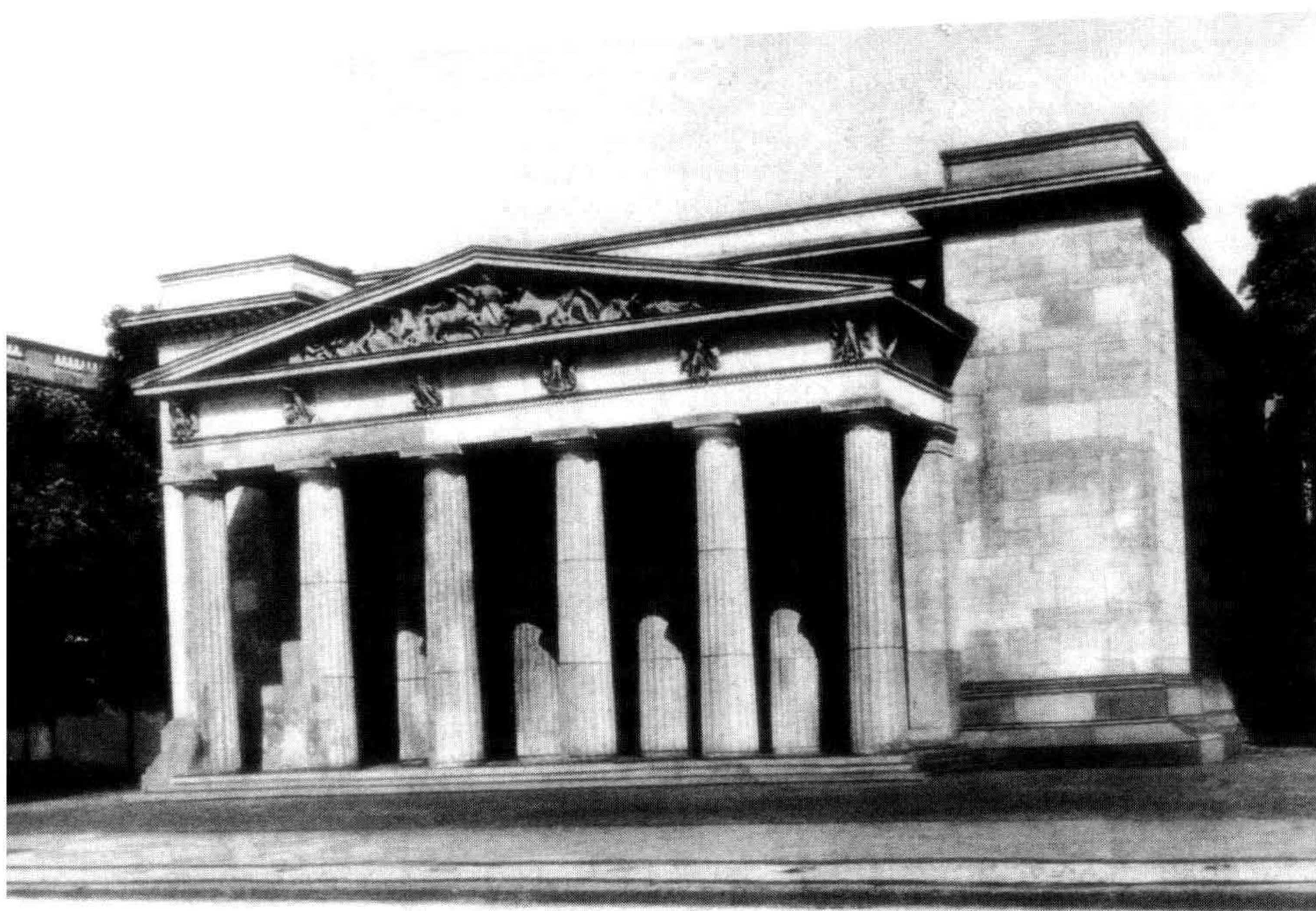
勃兰登堡门



柏林市政厅



帝国议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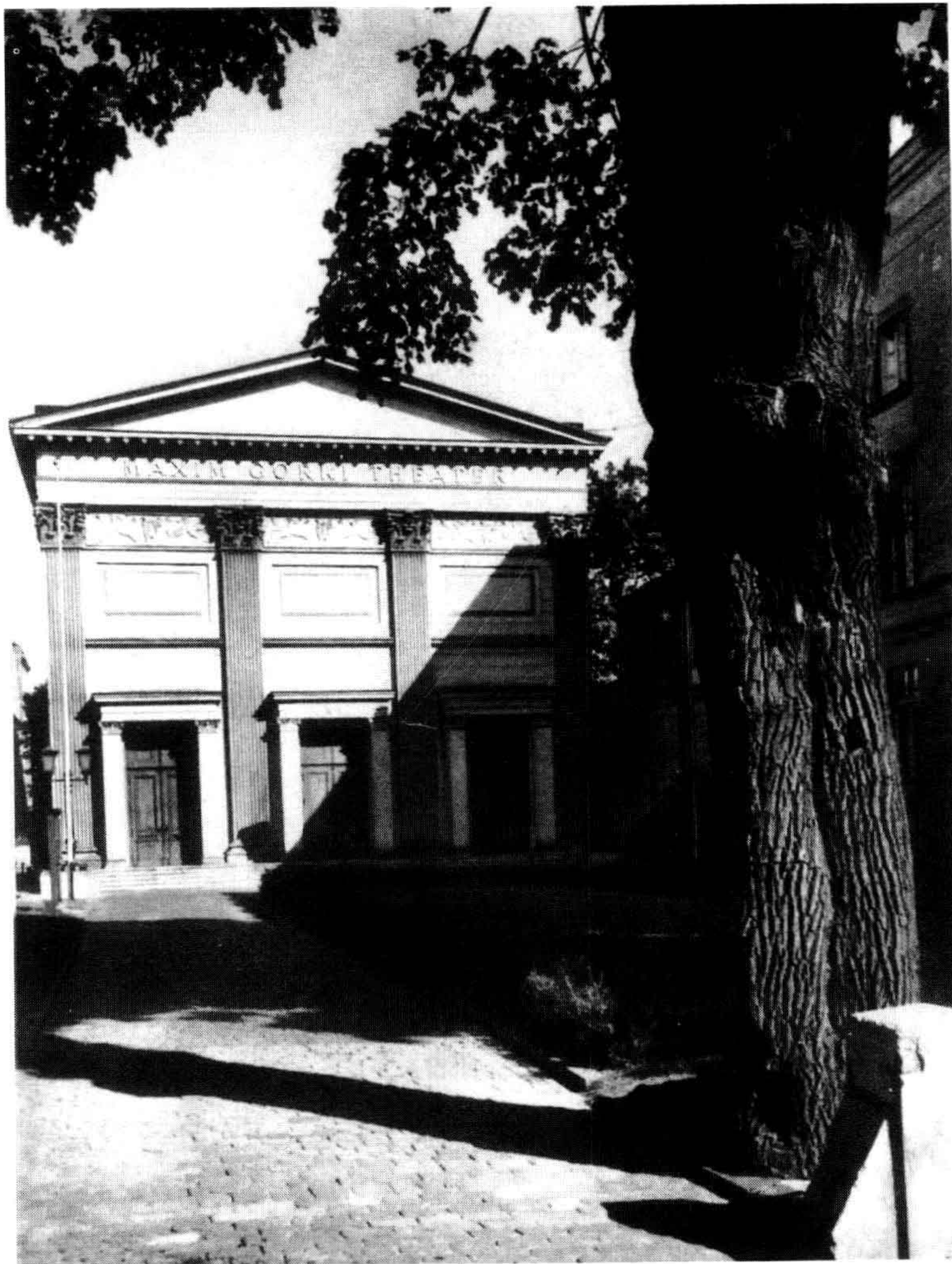
新岗哨



老博物馆



歌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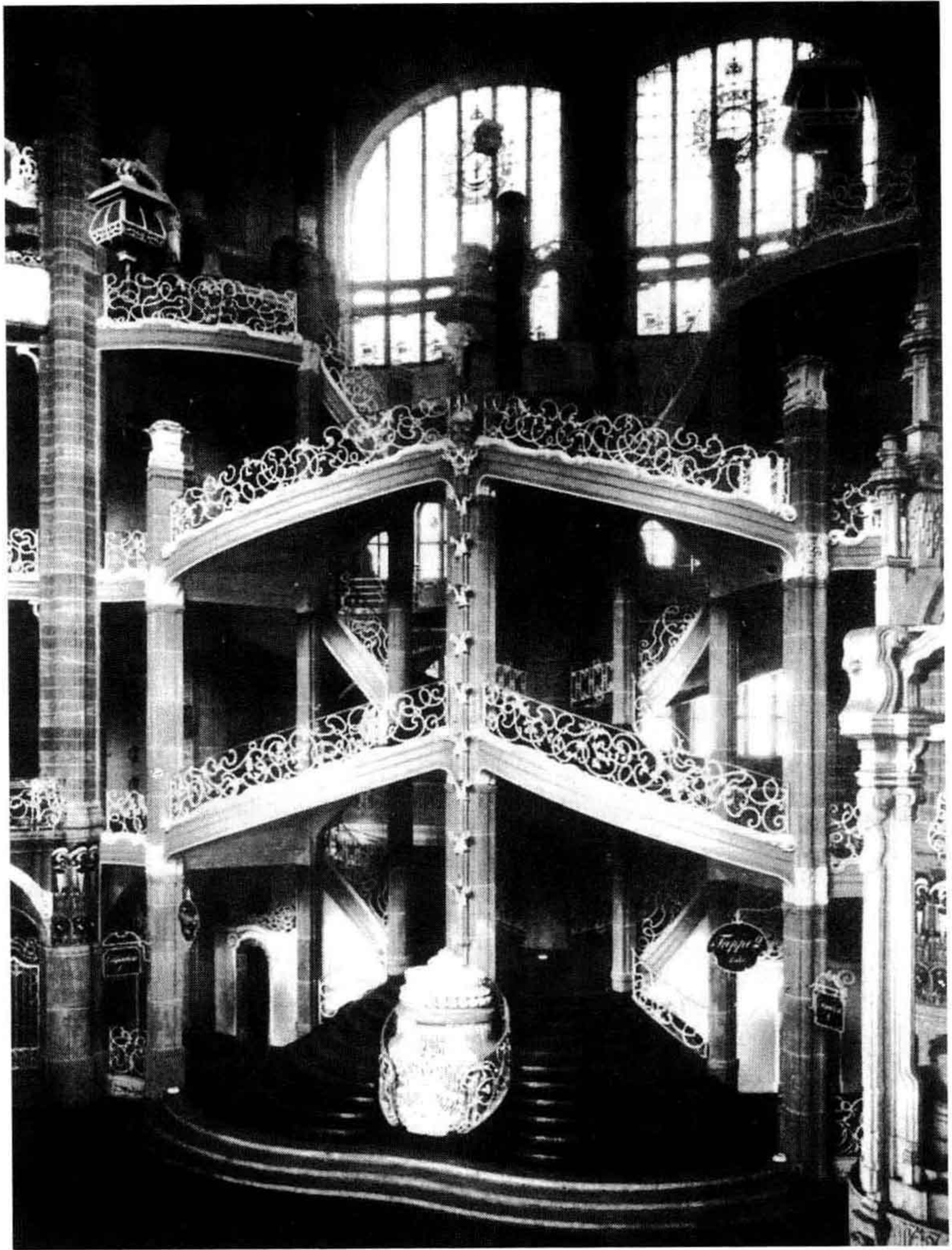
高尔基剧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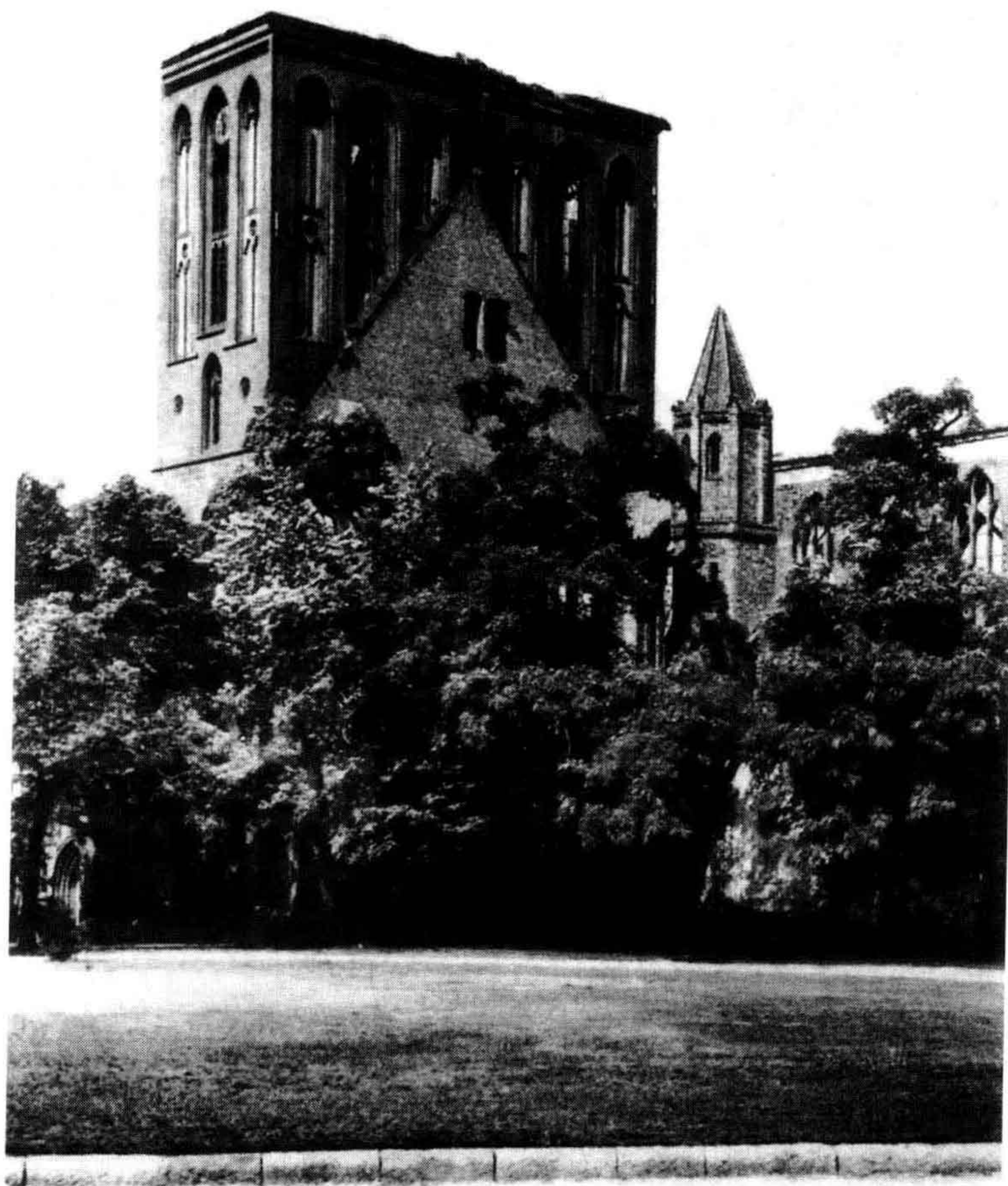
国家画廊



洪堡大学



柏林中心区法院的楼梯



尼古拉教堂



夏洛腾堡区的古代博物馆



美景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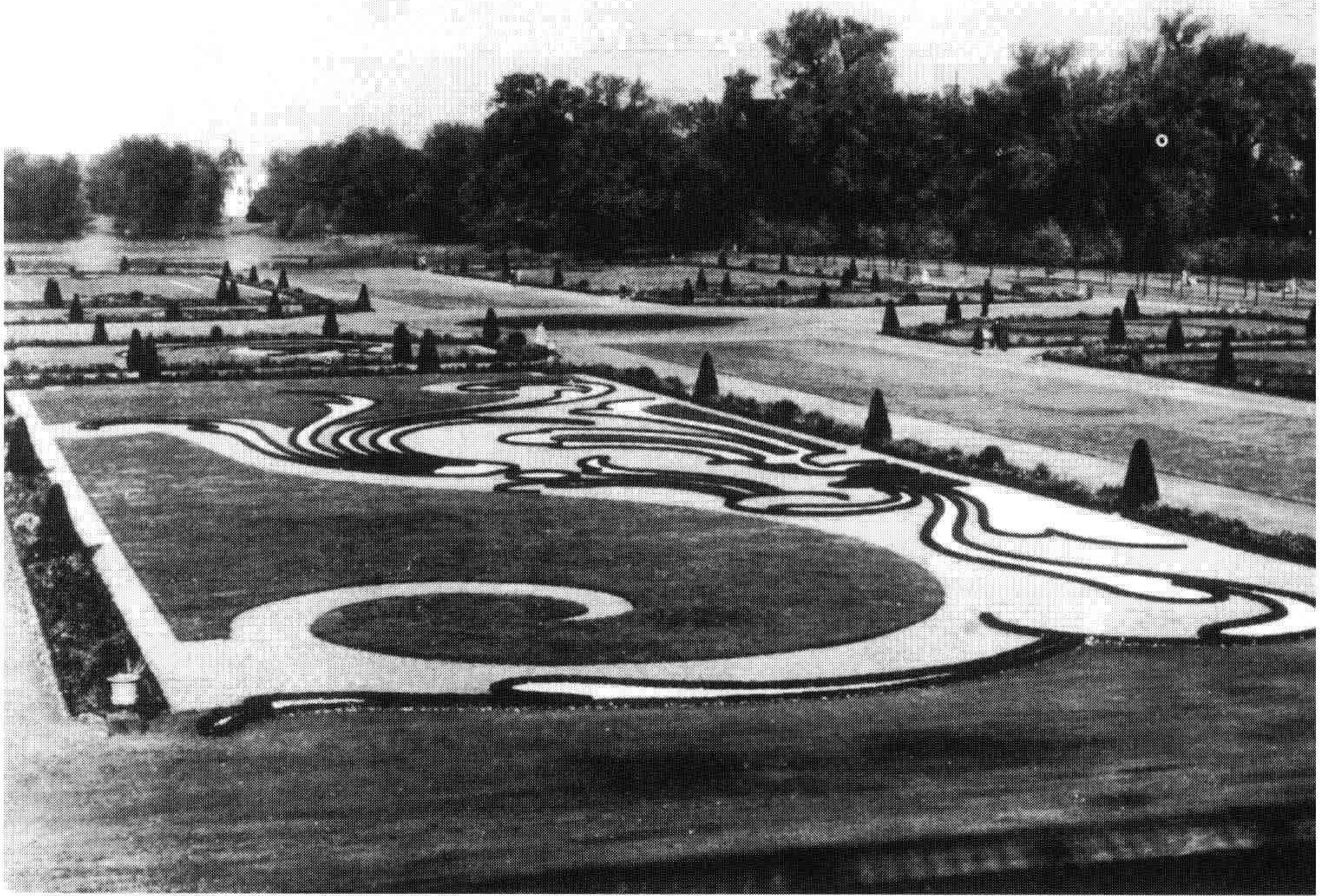
夏洛腾堡宫塔楼



夏洛騰堡宮



夏洛腾堡宫内景



夏洛腾堡宫花园



格林瓦尔德区的狩猎宫



达达区的圣安娜教堂



胜利女神柱



奥林匹亚竞技场



俾斯麦纪念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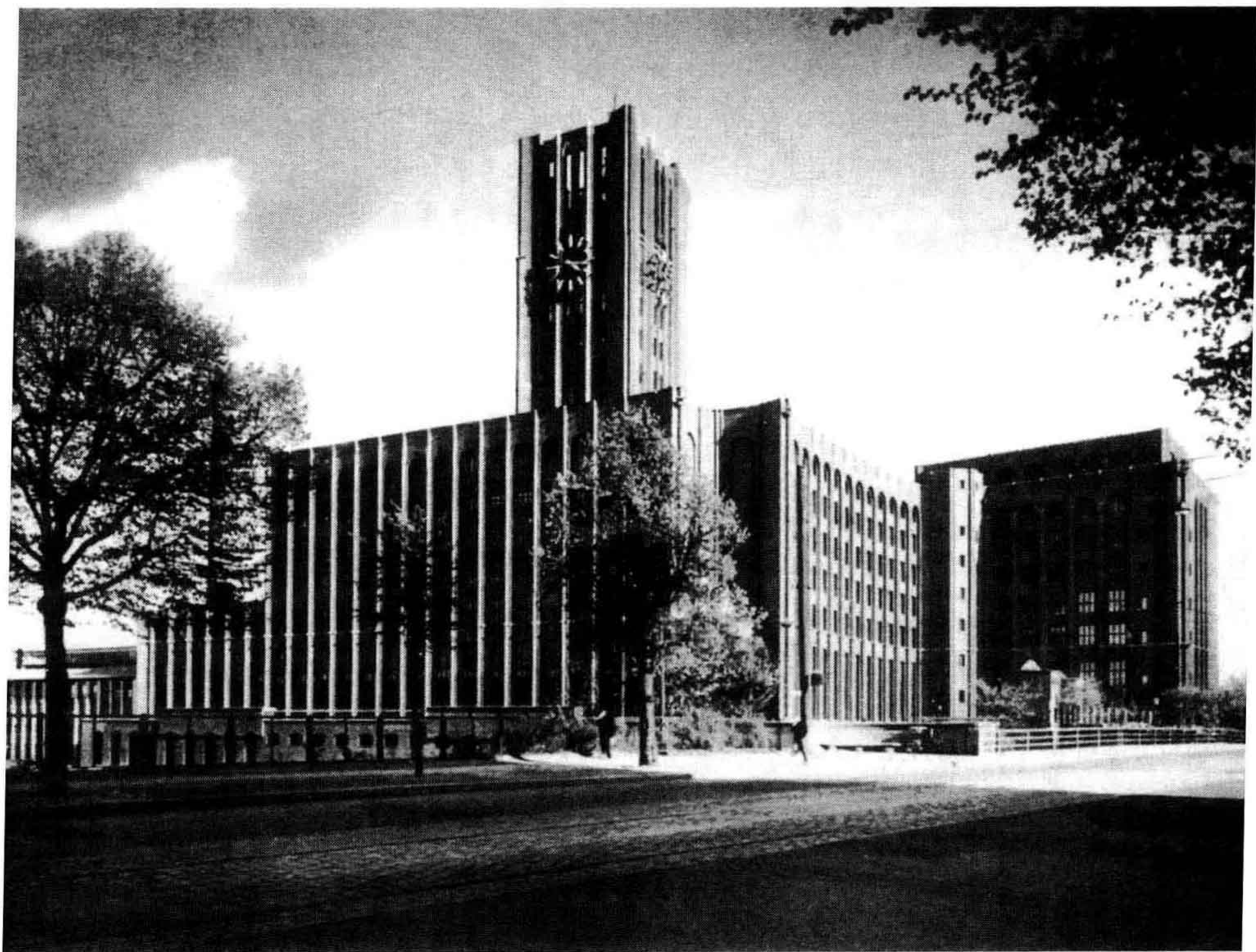
人民舞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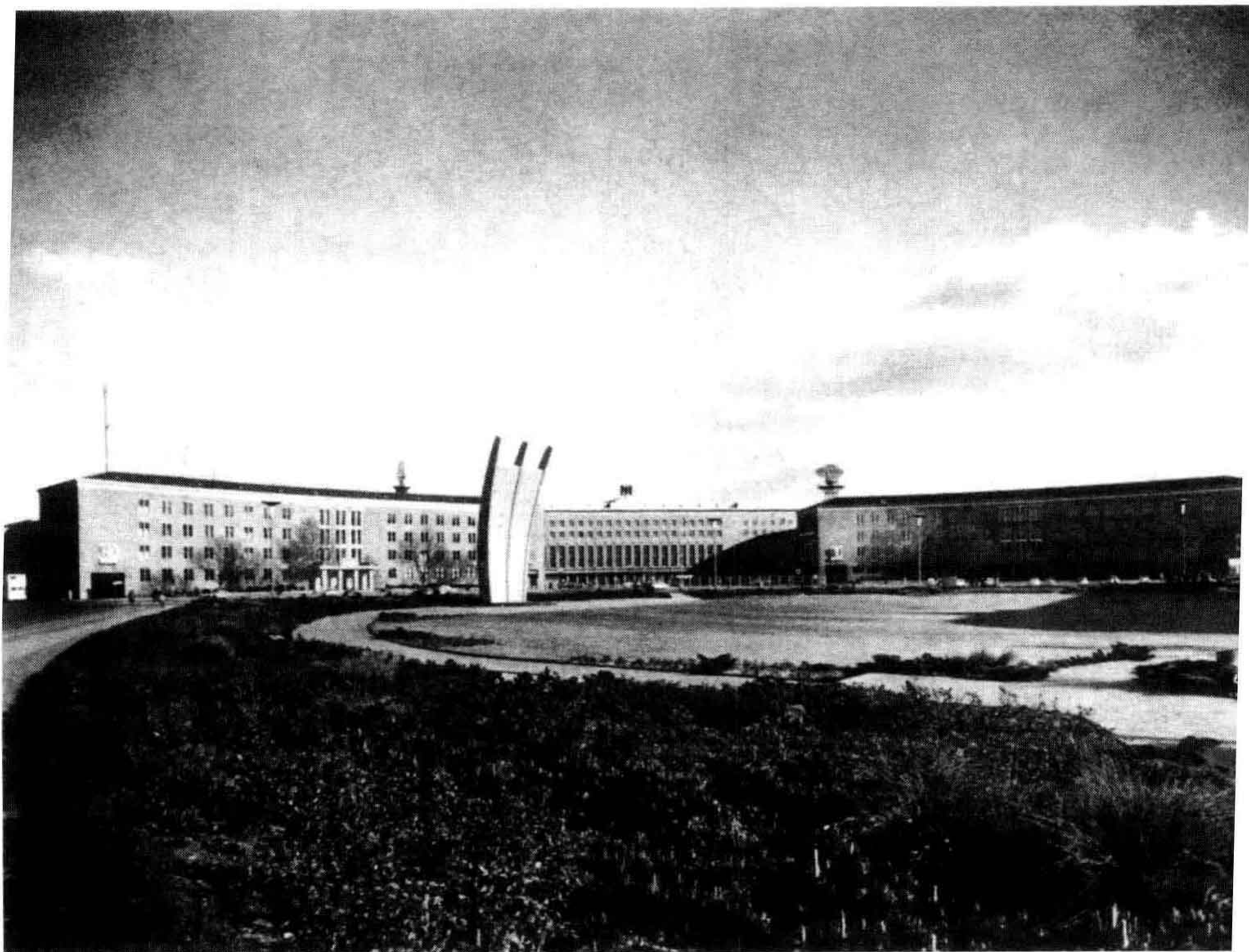
前斯大林大道



汉莎社区



滕珀尔霍夫印刷厂



滕珀尔霍夫机场



电器之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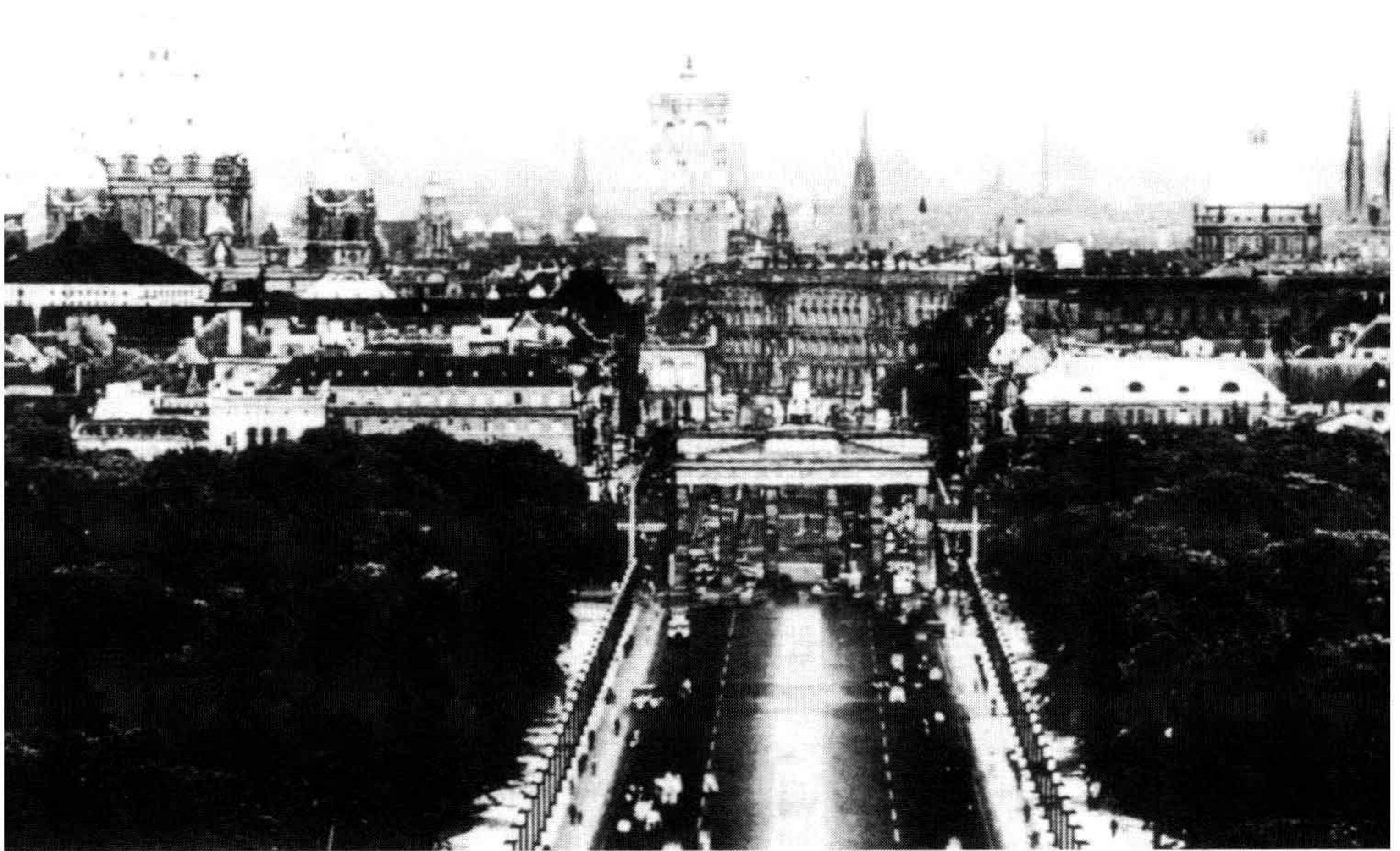
通用电气公司



柏林式住宅高楼



动物园区的高楼



俯瞰柏林：勃兰登堡门和东柏林

5 普伦茨劳山上

登山

“专制政权不是空中的疗养胜地/那让它更接近民主/酒不是毒品/酒是一种成就。”马提亚斯·“巴德”·霍尔斯特(Matthias [Baader] Holst)这样说过。当我们登上著名的普伦茨劳山,我们就有任务实地查验一下这种说法。对霍尔斯特来说,东德是“在埃尔福特(Erfurt)一带在批评那种让所有卡普里岛(Capri)渔夫害怕的类似猴子直立行走的姿势”,而西方根本不知道任何预言:“你必须穿过七个边界挨过七个致命的子弹你会报废七次西德猪也会有一次。”他能想象山上那里繁茂的风光吗,他只能退到成就之中。

约翰纳斯·巴德(Johannes Baader)是他的模范,那位“至高无上的达达”,也是他和西德人安德烈亚斯(Andreas)的联系,他不会觉得讨厌。“舌头是枪”,这个运用在文学城市游击战中为他在萨尔河

(Saar)畔哈勒(Halle)所怀念的极端无政府状态绝望地自由奋战的口号,因而让他流落到柏林的施普雷河(Spree)。他在这儿不太受到认可。

就在参观过塔薛勒斯艺术大厦(Tacheles)后,马提亚斯·霍尔斯特被电车辗过,1990年6月30日伤重而死。艾利希·玛斯(Erich Maas)在悼文中写道:“有人认为,从他的态度、他的生活及他的文章中得出结论,巴德可能是自杀的。难以相信巴德会做出这样刻意的演出,用一种他传记中如此简单的粗劣手法。”不过,正好死在货币统一的前夕,还真是岂有此理。差劲的意外看来是会建构神话的。由于霍尔斯特,玛斯迫不得已成了出版家,因为卡列夫印刷厂(Druckhaus Galrev)拒绝接受这位年轻诗人在前卫圈子中的身份。不是出版社造就了作者,而是作者造就了出版社。在施里曼大街,有人告诉我有关普伦茨劳山的“大型死亡”:过去文学界中的重要人物在几年内纷纷去世,仿佛向当代投降似的。玛斯应该相当敬重他的“巴德”,因为在字里行间,可以听出一种粗暴的温柔,像霍尔斯特这样一匹城市之狼是当之无愧的:“巴德在柏林的时光,并不只是一个信箱地址而已。他在厕所外、树丛、地窖中过夜,偏爱靠近装得满满的冰箱。”在文学界中,这样的人没有任何地位:“在文学上早衰的青年作家提早退休,或把副刊中枯萎的月桂串到自己的传记中,或像整个德国文学辞典中的肉干一样渴望着永恒之处,巴德是无处容身的。他引退,对他而言并非遗憾。遗憾的是我们。”大家都白白遗憾了,文学活动并不只是中产阶级的事。无论是谁想吓唬中产阶级,便成了大马戏团中的小丑。莱纳尔德·格茨(Rainald Goetz)在克拉根弗特(Klag-

enfurt)那个大型朗读竞赛中,拿着刮胡刀划开了额头,让血滴落在他的手稿纸上。他的节目叫做《迷途》,全世界都说着他的演出。一出成功的戏码。但霍尔斯特在克拉根弗特?难以想象。他会透过麦克风对远道而来的记者们说他怎么生活,他怎么想,他为何写作?写作是生存的唯一形式与可能——我们听到这个被新发掘的文学小鼠在摄影机前小心翼翼说着,深深窝在电视机前的沙发椅上喃喃念着这样一句崇高虚假的句子:万能的上帝啊!相反地,对霍尔斯特来说,生命是会让人意想不到的。电车来得正是时候。

要说到“文人区”,我比较喜欢走葡萄园路(Weinbergsweg)。这个名字听来有阳光与南方的味道,而19世纪这里真的种植过葡萄。我们一出地底,来到罗森塔勒广场(Rosenthaler Platz),就被一排小酒馆吸引住了。见到这个休憩之处,我们很高兴,接着就开始工作:查验霍尔斯特酒是一种成就的说法,就在紧邻“高尔基公园”(Gorki Park)的工人小酒馆“珍珠”(Zur Perle)中。在东德时期,小区酒馆算是客厅的延伸,平凡无奇,但在新德国这个地区争奇斗艳的餐饮框架中,几乎已成了罕见之物。大家会带着不信任的目光打量外来的人。对当地人来说,他们自己的城市变得再也无法辨识,但至少他们挚爱的酒馆还在维持下去。小区酒馆“敌视外人”,其来有自。要改变,只有拆除一途,不过不信任的壁垒倒是易于打破。只要叫上第二杯啤酒,行为中规中矩,便能很快热络地和众人谈着他们所关心的事情。知识分子对这种“老顾客”感到不屑,其实却是一无所知。在这些老顾客身上(小区酒馆就是一个独特的老顾客群),可以知道不少事情。对真正的民主人士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宝库。这些老顾客绝无一

致的看法。有时，他们高谈阔论，相互辩诘，让人宛如和平天使一般想振翅飞去。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提到，他大多数故事都是在这不起眼的酒馆中听来的。在那儿，作家会遇到对手：说故事的人和爱瞎扯的人。

广场上

在锡安教堂(Zionskirche)周围，可以十分悠闲地喝着，尤其在白天。30年代初，狄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这个身为信奉教派传教讲座主席、被处决的反抗人士，在这座教堂工作。他对政治的俗世兴趣，仍在这里持续发酵。在东德的最后时日中，这座教堂容纳了一间环保图书馆，并提供异议艺术家展览与朗读的空间。锡安教堂一直都不是一间平凡的清教教堂——门禁森严，不欢迎访客，除非星期天早上来。这里首先是电影院、画廊、音乐厅，其次才是小型社团的聚会地点，他们冬天都得在其他地方举行礼拜，因为老旧的暖气再也无法使用。

教堂周围绿意袭人。柏林是座街树之城。这里似乎一直都很注意这一点。我为何特别喜欢这座广场？我想是因为它那种带有些许温暖与亲切的与世隔绝的味道，让人宾至如归。欣赏不太起眼的东西，会使人感觉变得锐利。谁开始相信自己的眼睛，就不会再去理会所谓的名胜古迹。所有的东西都是名胜。明白这点的人，立刻就会懂得那些真的无中生有变出一个世界的艺术家“伎俩”。

城市杂志 *Zitty* 提到,锡安教堂广场这时已完全落入柏林新贵手中。阿尔弗雷德·比奥莱克(Alfred Biolak)住得离这儿不远,已现身在“小教堂”(Kapelle)咖啡馆中,妮娜·哈根(Nina Hagen)在这间只卖有机产品的咖啡馆窗边,有自己固定的座位。其他人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些不起眼的东西。

永葆如新

我提到了文人区。60年代末,艺术家们便搬到山上来,原因至今已难考察。有些行家,例如丹尼艾拉·丹恩(Daniela Dahn),在她的《普伦茨劳山之旅》(*Prenzlauer Berg-Tour*)中,召唤着会影响到社会外围的那些才智人士,并展现在与生俱来或代代相传的居民反抗意识中的地方神祇,靠着世代的工人对当时统治者的要求与承诺那种根深蒂固的质疑来喂养。后来,愈来愈多的年轻人加入,他们不把住屋看成像保险箱的住处,而就在南端的十字山上,尝试着不同的生活概念。一种有着邻人互助、居住方案、街道及后院庆典与无数非官方文化活动的公社生活不断出现,一种不受国家控制约束的生活。在70年代与80年代初,愈来愈多年轻的诗人、音乐家与画家来到这里,他们受不了向官方的文化机构讨生活。他们想一展所长,能和朋友与“志同道合者”在艺术上自由交换试验,不对既成的社会关系唯唯诺诺。几乎所有后来这个文学地下团体的著名诗人,都来自东德南方的省份。他们当然都在此栖身,而不是在城郊

的聚落,那里住着只求安逸的小家庭。此外,在这种残破的景象中,这些艺术家才会感到安适。残破让人自由挥洒,浪漫在过去那几十年的堆肥中勃发。西德不太允许老朽——会不断清理、补土与粉刷,仿佛不该有任何的过去,仿佛只能活在一种无所不在的整洁之中——而老旧建筑在东德有其他处置方式:抵抗着颓圮与可能的拆除。普伦茨劳山的建筑几年之后将无可救药,除了已经有了经费的个别路段与胡瑟曼大街(Husemannstraße)外。翻修过的墙面难免焕然一新,像是刚上过妆一般,对必须解释这里在前一世纪的后半叶发生何事的未来居民来说,是件好事。从旧王朝操控人们与城市的状况来看,我觉得现在抱怨新时代、窃盗与金钱的影响,显得怪诞。那些文学导师(斯蒂芬·海因姆〔Stefan Heym〕在1989年11月远远超出他所应有的程度)还能提供些什么?只剩下鼓励,一切都要再次从头开始,但只求这次能亲切些。在缺乏观念及原有的中心概念摇摇欲坠之处,部分知识分子逃至憎恨的安全死角,不管他们当时的态度如何是批判性及有建设性。于是所谓的“德东之声”——身为作家的女记者丹尼艾拉·丹恩今天想感受“和当时一样的压力”,并怕自己像根骨头,被“副刊的野狗”啃噬,因为他们想把她“当成一名基本反对分子”。把讨人厌的评论家比成动物,在德国并不值得一提,丹恩对当前批评她影响的反抗态度相当合理。把批评和审查混为一谈的人,都有急于服从的心态。但她根本不需如此,更别提自己会是“基本反对分子”。事实上,许多人还是渴望某些基本之物,只是大家乐于知道更多关于新基础的本质。民主社会主义党中普遍的被追捕妄想,简直令人费解:他们可以继续下去,旧

酒装新瓶，新酒装旧瓶。没人阻止他们，如果对某人而言，宽容过于温馨，那便可在其基本反对派中如鱼得水。

1990年，当《时代周报》(*Die Zeit*)和《法兰克福广讯报》(*Frankfurter Allgemeinen*)的编辑群起攻击时，克里斯塔·沃尔夫(Christa Wolf)一样也觉得被评论家侮辱。她的短篇小说《还剩下什么》(*Was bleibt*)遭到激烈批评。许多东德人视之作为一种对尊严的侮辱，而这位被成就宠坏的作家第一次觉得被西德人遗弃。大家提到围猎；君特·格拉斯(Günter Grass)不久前再次重提这种责难，只不过他现在称猎人为“刽子手”。批评成了处决的方法？这位高贵的人士还神志清醒吗？他怎么会想到把笔尖和利斧、把墨水和血等同起来，把一丝丝的痛苦说成死亡呢？当评论家莱希-拉尼奇(Reich-Ranicki)把他的小说《辽阔的田野》(*verreißen*)批得体无完肤时，格拉斯自己也觉得受到了背叛。这些文学秀场上的女伶并不习惯这点。在她们危急之际，她们发现邪恶的力量在运作，让阴谋的理论流通起来。然而，时代改变了，观点也跟着改变：克里斯塔·沃尔夫今天是统一德国的作家，受到景仰，也被痛骂。像东德一般人的良知这样的说法，她不再需要，同样也不再需要那种保护，让她免于东德文化官僚的刁难。

被逐

在艾伯斯瓦德大街(Eberswalder Straße)这个高架铁路站下，有个Konnopke小吃店传奇，所有的城市导游都会提及，因为那里有柏

林最美味的咖喱香肠。自制的酱汁味道一流，而接待饥肠辘辘的顾客十分专业，一比之下，所有首都的香肠店都逊色许多。少数不知点什么的顾客会犹豫不决，但里面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会。我读到，对可怜的彼得·布拉施(Peter Brasch)来说，那里过去几年变得过于时髦。不知他是从哪儿观察到的。但老家伙总有东西可以念叨，我们最好不要忤逆他们，他们确实知道得比较多。

“他这个不安的灵魂，在早晨时便已穿着飘动的大衣离开，在报摊上点杯咖啡(或在街角的土耳其人那里来杯啤酒)，好去勘查。在市郊，大家都认得他：香肠店里的女贩子、面包店老板、书店伙计、报摊老板及街角酒吧的酒鬼。从这些闲晃、观察、印象、想法中，他总能有令人意外的发现，而出版的却只有其中一小部分。他的抽屉中搁着文章、费心写下的日记、剧目中的歌曲、诗与小说。”

下一个悼词该来了，这回出自文学研究者彼得·波蒂希(Peter Böhig)的电脑，他在“个人回忆”中，以下述句子指出布拉施兄弟中的小弟的特质：“快乐的虚无主义者、敏感的粗人、正直的怪人、思考政治的诗人、固执的梦想家及醉心于存在的脱逃者。”布拉施和他哥哥托马斯(Thomas)一样，没机会在东德行动，他抗议取消比尔曼的国籍及以辅助工人的身份立刻强制注销学籍，并在199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身为广播剧作家，他在80年代末还小有名气，但从未享有大名。在《住的舒服》(*Schön hausen*)一书的普伦茨劳山之旅，是有关统一前后那里的酗酒及当地饮酒文化，由出讽刺作品的欧伦斯皮格尔出版社在适当的场合出版。克里斯托夫·迪克曼(Christoph Dieckmann)为《时代周报》读者走入“格里芬哈格角”(Greifenhagener

Eck),向格尔达(Gerda)打听了布拉施。她和他谈着,并回答问题:“格尔达说,前天,布拉施先生又来这儿,买了香烟。他以前是个酒鬼,那时还留着长发,老和女朋友站在楼梯前。他现在不再酗酒。他有问过,可不可以把格里芬哈根角当成他作品的书名。他给了我一本,还正正经经写了题词。我读了两次,第二次比较能懂,可不简单,不是拿来消遣的,可想到写这本书的人是有点……有点什么?反正就是有一点东西吧。”彼得·波蒂希知道,布拉施最后又喝了起来,表示这是分期付款在自杀。“他是有点像卡夫卡那样饥饿的艺术家,找不到合他口味的菜肴。”

那酒精起了什么作用呢?如果我们在文学史中探询一下,他似乎真的在“原创人士”中享有大名。在此,我推荐多纳德·古德温(Donald W. Goodwin)的《酒与作家》(*Alkohol & Aurtor*, 1995)一书。作者描述了一些酗酒的大文豪,爱伦·坡(Edgar Allen Poe)、司各特·菲茨杰拉德(F. Scott Fitzgerald)、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洛威(Malcolm Lowry)。他从未听闻过有关彼得·布拉施的事。

在普伦茨劳山上,有位我们可以就教的人:洛塔·费克斯(Lothar Feix),一位作家及敦克大街(Dunckerstraße)上“鱼雷甲虫”(Topedokäfer)酒吧的老板,一个相当浪漫的家伙,留着及肩的长发与大胡子。要是他愿意回答问题,便只会听到难以理解的喃喃自语。在医生不准他抽烟草后,他改抽的小雪茄几乎不离嘴,更别提说话,那看来就像黏在他下唇上一样。费克斯大概准备好了两杯烈酒。其中一杯按部就班毁了他,也就不必多问。在他死前不久,他写下有关

《当地酒吧行业的发展》(*Die lokale Entwicklung des Kneipenwesens*):“今天谁还提到普伦茨劳山,基本上是说着过去,因为现在大部分只是普连兹山(Prenzl Berg),我知道我电脑中的拼写检查会把 Prenzl 换成 Brennöl(燃油)。”

6 普伦茨劳山——地下活动与深渊

结束的开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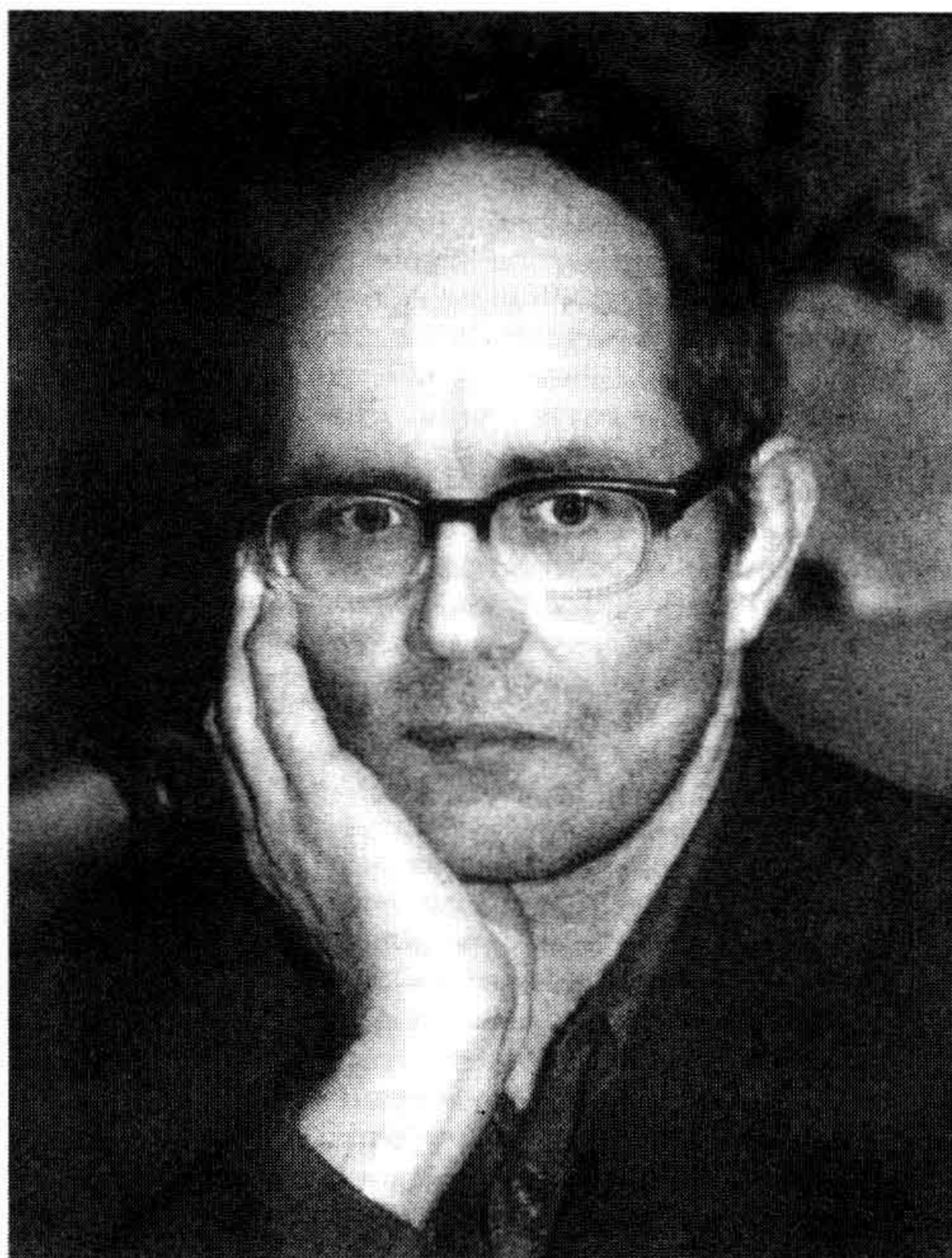
我们面对着讨人厌的一章，关于普伦茨劳山上诗歌风光结束的一章。相关的材料都可拍成电影，可以轻易地制成几集纪录戏剧或一部九十分钟长的电影，里头应有尽有，让观众屏息以待：忠诚与背叛，友情与转眼成仇，钩心斗角与自我膨胀，权力与道德，无关紧要的谎言与难以忍受的真相，艺术家的兴衰。舞台就在统一后的柏林，酒馆、住宅、出版社、印刷厂、普伦茨劳山上的街道与广场，东德异议分子迁往西柏林的流亡场面，在汉堡、法兰克福与慕尼黑主导舆论的报章杂志的编辑室。两位男士成了事件的焦点：天才诗人沙夏·安德森(Sascha Anderson)与老诗人沃尔夫·比尔曼。两人有自己的过去：留着大胡须的(1936年生)过了辉煌的日子，已进入生命的秋天，是收成的时刻：奖项接踵而来。只是推崇他十几年前的成就，稍微晚

了些。当时他是个英雄，没人像他那样既受推崇，又到处树敌。年轻的那位戴着圆圆的角质眼镜，一头乱发，胡子三天没刮（1953年生），好不容易捱过困顿的童年，是个流浪汉，半反社会，半天才，在一个朋克乐团中演出，发现了写作天分，在地下文学团体中找到朋友。

那里还有朋友：尤根·福切斯（Jürgen Fuchs）与贝特·帕彭富斯（Bert Papenfuß），各自表现出他们的坚贞。一位特别致力于特务档案，那得以解释他这辈子不幸的一段时光及他朋友的命运。另一位则脱离地下活动，面对阳光。但这里突然麇集着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士。记者占领了这一区，要为读者找新商品，调理着德国制造的文学奇迹。他是其中一部分：大家口耳相传着这位普伦茨劳山的前卫诗人。

安德森利用统一后的好时机，和莱纳·谢德林斯基（Rainer Schedlinski）成立了喀列夫印刷厂。他们掌控自己深具野心的作品的发行。1991年出版目录上的作者照片仿佛罪犯的档案照片。小心，我们是野蛮的德东人。你们要注意了。我们可是严肃得很。我们已活过一个体制。你们绝对无法了解我们的诗。忘了你们那些靠奖金过活被溺爱的孩子吧。我们是前卫人士，你们应该来写写我们。

达姆施塔特（Darmstadt）：诗艺与语言学院的颁奖典礼，那位刚被选出的得奖人正在致谢，像他之前的所有人一样，提到了毕希纳（Büchner）。那没什么特别的，例行事件而已，就连比尔曼也一如往常用尽一切方法，摇摆在完美的辩证与粗笨的简化间。但跟着他耍了手段，靠一个仿佛不经意间溜进演讲稿中的从句，像尖针一样扎进里榭纳大街（Lychener Straße）上空的一个热气球：“那位没才气、会



沙夏·安德森(1953—),
摄于 2002 年

吹牛的沙夏混蛋，一名国家全部特务，一直扮演着酷酷的缪斯之子，希望他的档案永远不见天日。”柏林骚动无比！比尔曼疯了吗：为什么只针对沙夏？喀列夫印刷厂电话不断，紧急开会讨论，被指控者发誓保证，文化记者不停问着，否认指控。他们想要干掉我们，西方的文化反击，阴谋论快速蔓延，但心里却害怕这种可怕的可能会有影响。呼吁起团体的感情：我们一起承受。不再接受西德媒体鲨鱼的访问。谁脱离，便会被切除。杨·法克特(Jan Faktor)后来提到这类隔离措施。

谁下的赌注比较高呢：安德森或比尔曼？总有一位会输。两人拿自己的信誉来做赌注。比尔曼获得莫里克(Mörrike)奖，在谢词中

表示：整件事是“国家全部繁花似锦的小花园”。“普伦茨劳山上刻意的非政治姿态是在逃避现实，是国家全部 HA-XX/9 与 HA-XX/7 部门的温室栽培出来的。国家全部园丁为那堕落的天才与胆怯的青年移植了一种做作的风格，在和当局摊牌的时刻终于无法避免时，他们却装成一副达达的姿态沉睡着。”

电影的第一幕高潮是两位对手于镜头前会面。显得绝望或濒临崩溃的安德森，宣称自己无辜，说着这里发生的疯狂行径，视自己为恶劣斗争下的受害者，并忆起自己也曾是国家全部的受害者。

是有误解吗？文化共和国变得好奇起来。大家应该要相信谁呢？比尔曼什么时候才会提出证据？他能提出吗，如果能，为什么犹豫了这么久，为什么要让他的受害者不安？他是想给他彻底承认的机会，还是把安德森当成实验用的兔子来利用，他是想对他说明：他们(国家全部的工作人员)到最后都在说谎吗？他想要什么：真相，还是正义？一些批评家指责他想报复，但报复欲和适可而止的界限在哪里？

对这整个团体的全面攻击，把当时地下文学团体的作者都动员起来。不安同时产生。正在聊天的邻人，有可能曾是非官方的工作人员。当柏林市府文化委员收回原本已答应给安德森在马西莫别墅的工作奖金时，弗兰克-沃尔夫·马蒂斯(Frank-Wolf Matthies)在一封公开信中向“德高望重的罗洛夫-莫明(Roloff-Momin)先生”求助，做出一份结结巴巴的声明：

“沙夏·安德森在那里(东德)是唯一，至少在这‘一代’，不愿意接受所谓反对派钉上木板的兔子窝环境。至少是第一位，在愈来愈

严重的醉酒状态中没有愈来愈肆无忌惮表露自己的革命意图，而真正做了些事的人。最重要的，先是利用其他人，鼓舞他们离开那种空洞、出自荒谬的前提而导致的意见摇摆——‘又有谁真正理解了纯洁的马克思主义’，并不让其他人继续决定他们的想法与行动。”诗人安德森有权“不被小市民看扁看轻，而是一生都该被视为‘整体的艺术作品’”，就算“卑鄙无端的指控”为实，也应如此。

马蒂斯的说法并非任意而为。1973年时，国家安全部便已没收他的手稿，逮捕了他。1980年，他们二度逮捕他，就在他隔年迁往西柏林之前。但为何马蒂斯要开个后门呢？要是指控为真，那就不能说是卑鄙，而一个“先是利用其他人”，并跟着向政府出卖他们的人，会在置身事外的读者中留下何种印象呢？

杜尔斯·格林班(Durs Grünbein)表示：“有些字眼应该留在其于严寒出现的地方。像‘国家安全部’(Staatsicherheit)这种字眼在其可爱的缩写(Stasi)中让人无比温暖：那个字是种难以甩脱的委婉表达方式，几乎成了博爱。所以我们要冷静下来。”他以一句话来解决安德森的事件：“打错牌，只有出局。”他认为争论该团体一位或多位成员有无从事所谓的特务活动，不过是表面的，而把比尔曼的攻击视为明显试图在诋毁普伦茨劳山上那种拒绝政治的策略。真有些人同意这种推论。这位作曲家不是攻击了整个地下文学团体，绝未集中在个别有过错者身上，并把这种态度(“刻意的非政治姿态”)称为国家安全部的产物(“栽培”)吗？在这场残酷的阵地战中，并不难找出前线：在那儿，海因里希·海涅或贝尔托·布莱希特传统中的政治现实主义制造出入世的文学，鼓吹并企图要诗人与诗艺清楚选边，不是

赞成,就是反对;但在这儿,拒绝与诗人顽固的态度,视所谓的责任毫无意义,是角色分配的荒谬剧的一部分,他们拒绝在里面扮演规定的角色。

现在谁是对的,那今天就会问到东德最后垮台的原因?当2001年庆祝撤销比尔曼国籍二十五周年时,会零星听到那个事件是结束的开端,而一位勇敢的人敲响了那个体制的丧钟。如果我们不管每个国家都需要自己的英雄及制造自己的英雄的话,那这些声音便指出谁赢得1991/1992年的美学论争。一个国家臣服在自己国民的抵抗下,这是最简单的逻辑,而这个抵抗需要名字、脸孔与作为。杜尔斯·格林班当时的看法正好相反:“这个体制需要内部的敌人与国外的对手才能存活。”东德不是因为内部抵抗而垮台,而是因为“破坏比赛者平庸的理性”与“不愿再受苦的人民解除了社会契约”所致。他以这些话来结束他的文章:“我1962年生于德累斯顿,没被国家安全部人员踢过下体,最多只是个美学白痴,一个政治变种,一个地理上的外星人。在沃尔夫·比尔曼和沙夏·安德森的争论中,我很敬重神圣的妮娜·哈根。”

在沙夏·安德森被揭穿他的秘密警察身份前那几周,诗歌诠释的艺术便已在运作。大家彻底在这位被告的诗歌中搜寻秘密的意象:找着矛盾之处、找着作者双重生活中秘而不宣的蛛丝马迹、找着隐藏起来的自我指控。一般读者和专家着手追查邪恶的伏笔,每个人仿佛都懂心理分析,可以发现似的。

然而,在这个统一后的文化犯罪纪录剧中,这点不过是个次要角色。1992年1月初,对早已不再否认他和米尔克公司代表合作,反而

为了他的朋友与大众福祉,想说出这件事的安德森来说,这场游戏已经结束。尤根·福切斯与其他人彻底调查那些档案。福切斯关于那间公司各类阴谋的几篇《明镜》(*Spiegel*)系列——《谎言的景象》早已出版,1月6日德国公共电视台(ARD)播出了政治刊物《对比》(*Kontraste*)的文章,作者罗兰·杨恩(Roland Jahn)仔细察看了沙夏·安德森的活动。虽然在东德垮台前,大部分可资证明的档案都被匆忙销毁,还是几乎可以完整重建这位被告的特务与分化任务。透过秘密警察“大卫·门泽尔”(David Menzer)、“弗利兹·穆勒”(Fritz Müller)及“彼得斯”(Peters)等身份,米尔克的工作人员随时知道普伦茨劳山上谁说了什么话、有什么企图或做了什么。透过他们一级特务的报告,就连最亲密的朋友都被入罪,送交国家机关:甚至遭到逮捕。他不仅听到并记录下来,而且参与其中,有目的地鼓动圈内活跃人士互相斗争。当安德森1986年迁往西柏林时,他继续提供他的雇主关于被撤销国籍者与逃脱者这个“流亡圈子”中的消息,一直到最后,1989年为止。接替他在普伦茨劳山职务的人,接管东边部门:太子莱纳·谢德林斯基以秘密警察“盖哈德”的身份继续忠实执行他前任的工作。

谢德林斯基喜欢主导的角色,对那些不像他研究过新法国哲学高等理论学派的穷酸同事,他只能一掬同情之泪,他们停滞在一个完全落伍的主体概念中。照他看来,在普伦茨劳山这个殿堂外的人,从意识理论上而言,生活在中古时代。至于邮差迟了好几年才把法国结构主义者与后结构主义者的作品送至诗人区的阁楼与后院一事,根本就不重要。晚期的东德是巴黎种子萌芽的沃土。政治与社会纯

为虚构,媒体为制造假象的工厂,空谈历史的意义,在哪里可以更易研究这些情形,又在哪里可以更加易于亲身体会呢?现在他也如此:有权力搬弄是非的家伙,被看破手脚的体制下的农奴。

这是普伦茨劳山上诗歌风光的终曲。虽然并未证实大体的怀疑,但他的事情还没那么快了结。毕竟有通讯记录的并不是随便哪个团体成员,而是“头头”本人。没有任何团体能从中恢复原貌的。关于有多少受害者一事,大家看法完全不同。只要看一下莱纳·谢德林斯基的公开忏悔,就能知道他是喀列夫印刷厂的负责人。但这对这个团体的其他人而言,又如杯水车薪,他们脱离了自己的出版社,现在在整个德国出版市场上,自由待价而沽。在那些事件后,他们和那个团体的关系,再也没有任何价值,他们的语言技艺不再受到青睐。有些人认为这些责难过于夸张,或采取其他评价。他们指出重要的西方媒体(与受到他们提携的作家)对他们的计划失去所谓的兴趣,但却忽视多半是当时的东德人揭发了安德森和谢德林斯基。基本上,西德人缺乏了解“公司”弃人不顾后,东德人所陷入的困境的内部消息。在持续不断的国安局辩论中,也是西德人先表示出疲态的:毕竟大家并不想知道得那样详细。少数大家了解的事,已经够让人倒胃口。东德与东德所剩的东西,四分五裂,但至今这种有关国家体制的分裂情况,并不存在于东、西德之间。

结束前的补遗

2002年,一本名为《沙夏·安德森》的书出版。作者把自己作为

书中的题材。媒体反应正如预期一般巨大，他们对当时那个团体则更感兴趣。安德森在被揭发后隐匿起来，离开了柏林，只有少数人知道他的所在。他是必须好好解释：如何走错这一步的，今天又怎么看待他的行径？有这种罪孽，他又如何生活？他会求受害者原谅吗？沙夏·安德森是这个团体中最重要的领袖，不知道有上帝的惩罚，但却认识文学界中的重要人士与机制。他这位“天才的组织者”表现出的能力，至今无人有任何异议。他安顿了那些无家可归的文艺人士，他们曾经相信他，或不得不相信他，现在他们要求补偿，或至少一种不拘形式的合理解释。

在他的自传作品出版后不久，我在电视上见到这位过去的思想家与舵手，身旁围着谈论他这个案件的专家。大家该不该同情一个“混蛋”？我看到的是一位“目光黯淡”（艾尔克·艾伯〔Elke Erb〕）的男子走投无路。他话不多，烟却因此抽得更凶。他所说的，听来杂乱。我想，他自己都不明白他这一生，又如何向其他人解释呢？专家们（记者、文学研究者、作家）谈着，交换看法与意见，仿佛他不在场一般。他在场吗？他们处理他的案子，就像教师会处理一名违规的学生一样。这里早已不谈处置及记过处分，而是如何结束这件事。这场电视活动彻底让人反感。审判一个人，让各方都受到污辱。我没关掉电视，只是很白痴地希望被告或许能有点表示——不是懊悔或真心的遗憾，但或许略微表明他明白这些人士想要他干什么。当在座的一位证实他有一种多重变态人格结构时，他是应该勃然大怒的……但他却毫无反应！这位在场的失魂人士说着另一种语言，孤独地活在一个他所无法理解的世界中，神志不清，愈来愈透明。我都怀

疑在一旁支持他的贝特·帕彭富斯,在这些犯罪行径下,如何能够坚持下去。我不知道,或许出于顽固,或许出于内心的博爱。

这部影片可以在这场专家聚会的一个镜头中结束:缭绕的烟雾中,而影片名称(根据安德森的一本诗集):每颗卫星都有自己的杀手卫星。

一群失败的人

这个案件算是解决了,留下一堆残局:被骗的朋友、出丑的代言人、被击溃的诗人、一个提前中断的文学计划,但我不会像汉斯-克里斯托弗(Hans-Christoph)一样,将之贬为“二手的前卫主义”,此外,还有无法预见的后果。除了一点(没错,他有回答!)之外,没有任何问题真正被回答过。整个环境遭到荼毒,一代诗人消失无踪,而残存的诗人独自苦撑,远离文学大众,不受重视。一群五花八门的新当代作家在普伦茨劳山上戏耍,他们大概也可在其他地方生活写作。他们的作品大半是速食:靠那是吃不饱的。格莱弗斯瓦德大街(Greifswalder Straße)阁楼剧院负责人英格伯格·夸斯(Ingeborg Quaas)在彼得·瓦维奇涅克的朗读会后表示,基本上只有两种作家:“一种想要写作,一种不得不写作。”我们这时似乎接近一种没什么可说的状态。一个没有命运、没有深沉苦难的世代聒噪不停,让那个主导他们所有行为和每行字句的死敌永垂不朽——无聊,那种吞噬一切的巨大的时间空转。而他们依然可以架构,再拆解出成千种爱情关系,

记下无数宴会上人们的话语——而这个对手还是坚持在他们一旁，直到终于有让他们哑口无言的东西出现。文学这时才会开始：探索还未有人写过的未知事物，勇敢突破言语的界限。其他的都是拼凑出来的世界。这种毫无所谓、“无拘无束”的写作方式，在德国成了主导，并在几年内整顿了很多文学出版社，尤其是在读者间获得成功的文学出版社。

我们回过头来看看那场失败，那个过去文学团体中陨落的明星。他们少数几位还能在全德国受到认可，也能卖出可观的数字。他们成功脱离了这个团体一开始就有的乱伦般的自我涉入中；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便可平步青云，没人会想到他们和诗人区的地方神祇有关系。这样似乎适得其反，不仅没有鼓舞，并激励个别人士的精神，反而显得碍手碍脚。正如文学工作坊主持人托马斯·沃尔法特(Thomas Wohlfahrt)所言，这些从前的天才卡在小区中。杨·法克特把卡在小区这种显然是地方特色的特殊形式当成写作题材。他把这场毫无结果的觉醒写成《为何我们一事无成》这样一篇令人沮丧的文章，登在2001年《每日电讯报》(*Telegraph*)这份东德民权运动产物的月刊上，其中也会不定期登载当时“后达达分子”与语言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法克特在所有作者中发现一种不自觉，却极为强烈的自我破坏在运作。“我认为普伦茨劳山的作家作品都遭到了拒绝的恶报。”仿佛他们至迟在1992年的打击后，再也不愿来到一种共同真实的(虚构中)，仿佛他们需要这种置身事外，以免失去他们紧紧依附的一定的生命谎言。法克特自诩为这个团体唯一的“反共分子”，当这个兔子窝打开后，他没有什么接触恐惧。他和“(西方)耸动的报

刊”合作,把比尔曼和福切斯的责难立刻当真,自此成了宣扬自己家丑的人。不过,就连他也无法摆脱失败的厄运。

参与过

对杨·法克特而言,斯蒂芬·多林(Stefan Döring)的发展过程是个清楚的案例。他“明确要求他俭朴的诗艺存在可以自主,但这个新的社会就是容纳不了。在统一后,他立刻发现这一点。他停止写作,开了一家酒吧,放弃任何在文学活动上的应有名声与较量。”多林格的诗《参与—参与过》(mitmachen—mitmacht)以独特的风格展现出普伦茨劳山的非政治氛围。

每个人都有自由
要轻要重地蔑视
绝无仅有的国度中
特定人物的懦弱
社会游戏中的博弈者
走样变形并且没有注销身份
不过是未被允许的平民百姓
射杀他们人人得而射之
并该好好解放他们
因为参与过就是参与过

就算他在内部是个局外人
他依然珍视让他喘不过气的事
让他无比软弱的事
反之他清清楚楚说着
这样便能摆脱他不能做的事
略微恼怒地和下一个人
涉入这个短期目标
他不受法律保护遭到驱逐
那些熟知射杀名单的人
在街上遇到他
绝无仅有国度中做作的人物
他已学得清清楚楚

这首诗没有句点、逗号，自言自语着，同样也适合当成一幅安德森的小画像来仔细检视。审查不仅让风格更加优美，也助长了疯狂——因为会被认真对待。不过这并无害，因为没有应有的疯狂，所有的艺术只能是粗劣的作品。但这样一首诗该如何在比尔曼所要求的清晰明白中发声呢？诗的内容是永恒的：参与和参与过的关系可在地球各处观察到，或在自己的良知中探索。是否这个机制十分严肃，要看不是我们一直都能影响的因素而定。

今天在我再次涉及这个“失落的一代”（国内到底有多少人？）的诗时，仿佛读着备受折磨者的见证。这种语言便是典型的阴险：在节奏与措辞的形式装甲后，可以察觉出彻底的沮丧。诗歌中的自我听

来受到压抑,从个人的底层蹿出,钻过官方语言控制的滤网,直达受到感动的读者耳中。为了在那个绝无仅有的国度中不发疯,他们要求自己要有以怪异的文体描述自己心灵状态的技巧,一种持续绝望的状态。安德烈亚斯·科齐奥尔(Andreas Koziol)事后如此描述他身为作家和《阿里阿德涅涅工厂》(*ariadne fabrik*)杂志共同发起人的生活状况:

对我而言,那是个难受的时期,一个绝望与慢性神经官能症的时期。仅仅两步之间,便仿佛永恒一般。恶劣的失重状态,压制的封闭状态,抽搐的消沉状态,这样我便可不用夸张地描述我老练的空间感。对我来说,友谊当时只在名义上存在。人际关系上有着阴影,只要自己一动,影子也跟着动。大家说:政府荒谬,让我们成了外人,让我们说着政府自己也不懂的语言。

他《把差异加起来》一诗的最后一段如下:

有人把自己的话当成证据
有人当成全国的公墓
有人当成屈服的工具
有人中午时分离开城市

一首没有未来的可怕诗句。性手枪乐团单曲封面上的那两辆巴士叫做“厌烦”与“无处可去”,曲名为《没有乐趣》与《非常空虚》。在

这种次文化的背景下，上演着东柏林语言艺术家的存活斗争，和西欧大都会中他们所不认识的战士一样，努力要表达自我，争取尊严。就算他们出现在条件严格的小东德中，却和他们的对手相当类似：身为官员的官僚或经理，身为难以斡旋、只会空转的体制的前导者与人云亦云者，一个相当平庸、心满意足的市民阶层，只想维持他所熟悉的规则，不管他自己对这规则理解多少。

7 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离开过去

施普雷河上的桥

70年代的一张照片中，那位信仰坚定的大嘴巴，那位又唱又骂、敲着吉他的国家头号敌人，那位对在德国土地上实际存在的社会主义政治官僚而言过于共产主义的家伙，那位沃尔夫·比尔曼在草堤桥(Weidendammer Brücke)上。他双脚交叉，孤零零站在高耸的铸铁打造的普鲁士之鹰前，大衣口袋里塞了一份《新德国》(*Neuen Deutschland*)，仿佛那个巨大的徽章动物的翅膀是他的一样，这位“普鲁士的伊卡鲁斯”(Ikarus，译注：希腊神话中装着蜡制翅膀想飞向太阳的人)在批评他的敌人眼中，早已迷失在危险的乌托邦天际中了。党报的文字遮住了左手肘部位，仿佛一名可怜信仰者的臂章，他就是无法停止梦想着他既爱又恨的半边德国的美丽未来，一反所有的政治理性。他的目光似乎说着：是的，现在我们有了沙拉。我只能站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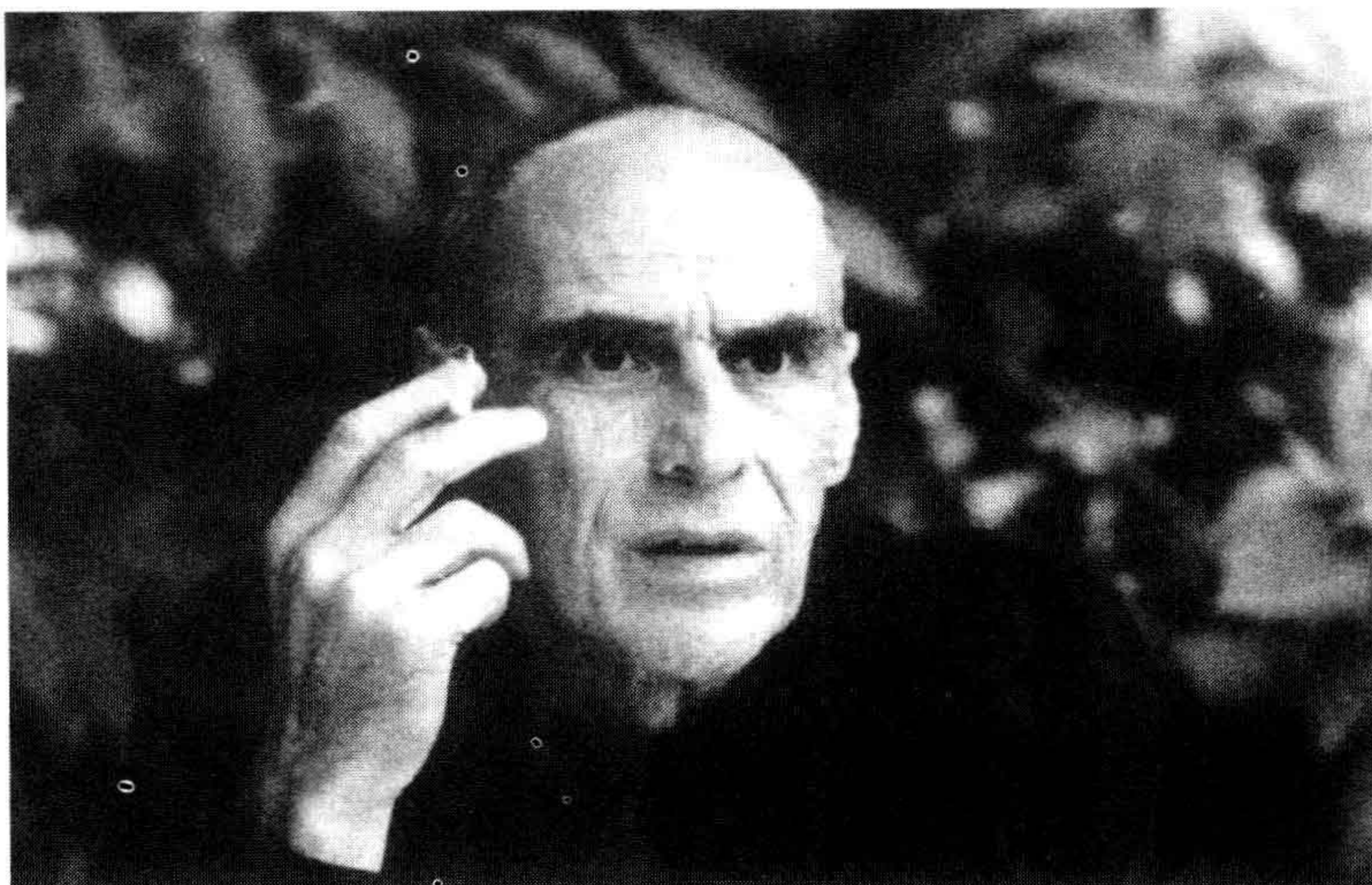
这儿。那你站在哪儿呢？

如果你想离开，你就得离开
我已见过许多人逃离
我们的半边国度
我坚守在这儿，直到冷了起来
那头可恨的大鸟伸出爪子
把我拉入深渊

我跟着成了普鲁士的伊卡鲁斯
有双灰色的铸铁翅膀
然后我的双臂痛得要命
我飞高——跟着坠落
卷起一些风——然后有气无力地
停在施普雷河上的栏杆

交钱的事也发生在这座桥上，犹如一出间谍片。托马斯·布拉施收下了装着钱的信封，坚持要现金。《法兰克福广讯报》已停刊的首都副刊《柏林角度》(*Berliner Seiten*)的一位编辑，在这位剧作家死后几天，说出了 90 年代末的秘密会面。那不是黑钱，而是因为布拉施和让-吕克·戈达尔(Jean-Luc Godard)打的赌。两人几年前协议，从今以后稿费只拿现金。

这是一篇悼文中的插曲。对一位踏上不归路的人来说，又该在



托马斯·布拉施(1945—2001),摄于1999年

他身后喊什么呢？插曲安慰着人，让人有所依靠。没错，他就是这样！在世的人点点头，非常高兴，就算在痛苦中也可笑出声。因为死亡这位君主并不会笑。在他的统治中，一切静默，生命在极不经意间消失，没有可不可以的问题。在这个个案中，他挑出2001年11月3日。二十天后，在他葬在柏林最有文学气息的墓园——多罗廷区墓园那一天时，剧作家朋友洛塔·特罗尔(Lothar Trolle)在《柏林日报》(*Berliner Zeitung*)上表示：“我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宁可不认识他。”在刊印出来的照片中，我们在这位抽烟者的眼中看见恐惧。燃烧的眼睛仿佛一名吸毒者，每一口都贪婪地把死亡吸进自己体内。

用这根火柴，点燃你的眼睛

让我好看到你

或是把火柴丢到你的十二滴泪水中
让它淹死

他不是一位亲切的当代人，至少不会让人感到舒服。格奥尔格·斯蒂芬·特罗尔(Georg Stefan Troller)在1977年3月见到这位诗人，却顽固地抗拒，不愿以异议分子的身份出现在这位纪录片导演的《人物素描》中：“……早知道您想把我廉价促销……让西德人尽情享用我还未痊愈的伤口。”他也拒绝走到柏林围墙：“我又不是动物园访客，去看那边关在笼里的动物！”几个月前，他自己还坐在那儿，这位共党高官诗人的儿子4岁时曾坐在前东德领导埃里希·昂纳克(Erich Honecker)的膝上，当他散发传单反对入侵捷克时，却被开除党籍，以“攻讦国家”之名被关入狱，接着发配去生产，到丽草的卡尔·李卜克内希变电厂。布拉施表示：“你可以闻出一座城市在瓦解。城里的人喝掉了所有的汁液，只剩下包装在街上踉跄走着。”但他依然认为：“作家的题材并不是他生活的土地，而是他所面对的问题。”是否因此见不到任何德国国内这种无可名状的痛苦，不像这里在座谈讨论、知识分子脱口秀及学院的专题活动中那样长篇大论着？这时有个人特立独行，摆脱了东德给他的角色，但并不想换上西德所给予的适当角色。就算个人生活问题与两德困境显然起了冲突，布拉施还是坚持一种独立发展，驳斥了海纳·穆勒(Heiner Müllers)阴森的预测——离国者迁移到“他无法着力的国度”，令人印象深刻。他在东德还会有什么影响？海伦娜·瓦伊格尔(Helene Weigel)帮他在布莱希特档案局找到一份职务，但在这位寡妇去世后，他也失去了

这份工作，而当罗斯托克(Rostock)的辛斯托夫出版社(Hinstorff-Verlag)以“严重扭曲东德的工人世界与青年生活”的理由，拒绝出版他的作品时，布拉施终于觉得受到放逐，在1976年申请出境许可。答复肯定：大家只想摆脱这位年轻的叛徒。

1977年，《儿子比父亲早死》(*Vor den Vätern sterben die Söhne*)在西德出版。这本散文集让他立刻成名。他父亲一直当到文化部副部长，让这个“不肖子”(托马斯·史坦费尔德[Thomas Steinfeld])突然事业告终。祖国不得不逐出这位年轻人。他让祖国蒙羞。这又回到了教育者身上。犯案者的角色转成了受害人，反之亦然。这位被逐的人可以找什么人呢？正如《给K的催眠曲》中所说：

黑夜，还是白昼，还是现在
我想躺在你身边
被骇人无比的和平追捕
就在两场战争之间

K是卡特琳娜(Katharina)，姓塔勒巴赫(Thalbach)，职业是演员。这位迷失的儿子和她及4岁的安娜(Anna)迁至西边，柏林的另一边。

比尔曼与布拉施所在之处，布莱希特也不会离得太远。他僵坐在造船师大街(Schiffbauerdamm)剧院前的纪念碑上，坚定地瞧着东方。他是在等那班最后会载来真正社会主义的火车抵达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还是只等着好香烟？在他慈父般的眼前，“德国最佳的

莎士比亚译者”(克劳斯·派曼[Claus Peymann])搬进了他最后的住处,就在“卡尼美德”(Ganymed)上,看完柏林剧团表演的观众会来这儿喝上一小杯酒。我们现在向思索过许多别离的托马斯·布拉施告别:

我们到底还有多少人。

那不是那个有吉米·亨德里克斯唱片的人。

现在他成了工程师。

现在他穿西装打领带。

我们激动不安,而他酒足饭饱。

我们到底是谁。

我们想离开,但我们想找什么。

这个洞叫什么,

这个让我们一个接着一个消失的洞。

波恩(Bonn)在一个屋角远处:就在“常驻代表处”(Ständige Vertretung)的客房中。当德国议会以略微过半的多数决议首都所在,震撼了莱茵地区,这位老板便已看出时代的征兆。当然迁往普鲁士并不容易,但比多数国家官员迁往离那位“老家伙”^①总理府不远的故乡勒恩多夫(Rhöndorf)附近的大学城容易多了。如果我的老客

^① 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德国战后第一位总理,主张首都设在波恩。——译注

户走了,我自然也走,他自己这样想着,计划油然而生。他的代表处总是挤得水泄不通。顾客除了波恩的老客户外,还有许多西德的新柏林人、报界人士、粗估形势的代表:在这儿能赚更多钱的人,因为东边有一部分是中央。

我们最好坐在靠窗的位子,欣赏施普雷河漆黑河水上的夜景。左侧窗边,新犹太教堂的金色圆顶耸立着,而火车站深色铁皮屋顶后,右边便是巨大的电视塔。白天蒸汽游船驶过。站在“代表处”前,可以听到船上城市解说员透过扩音器传来的声音,就几个句子而已。对面便是“泪宫”,被涂鸦喷得乱七八糟的小棚屋。

一切都在掌控中

边界官员挥手要我过去。我得跟着他。窗玻璃后他的同事查验着我的护照,搁到一旁后,又察看着下一本。我被带到一个有着桌椅和衣服挂钩的小房间。我得脱掉皮夹克、鞋子,接着是衬衫和裤子。对身着制服的官员来说,这不算什么。他的目光镇静,我察觉到里面有一丝嘲弄。说不定看到一个穿着内衣、内裤和袜子的年轻人,他觉得好笑。我得转身,接着他说:“您可以穿起衣服了。”现在他检查我袋子里的东西:钥匙圈、钱包,他打开,翻了一下纸钞、收据、驾照和其他证件。“对不起,你的夹克口袋也要检查。”我把市区图搁到桌上,迟疑了只有一秒,便伸手到暗袋,拿出我的日记。“让我看看!”我又迟疑了一下,同时希望他没察觉到我的迟疑。“这是什么?”他问,没

看我。他略略翻了前几页,在我看来,目光熟练。我回答,而这时我的心跳几乎停止。里头什么都有,我的观察,我的感觉。我年轻,充满理想,憎恶这个边界。这些一定都记在我的日记中。他继续翻着,读着,然后翻到了最后的注记。幸好在柏林这里,我还没记下任何东西。“没问题!”他说,把日记还给我。“您过来!”我没忘记什么吧?小房间空荡荡的,四角桌子清得干干净净。“您现在回护照检查哨,不用再排队了。”就是这里,1986年夏天。我搭城区地铁在午夜前不久离开武装的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前往动物园。我早上拿着单日签证来到另一个大陆,付了入场费,换回东德马克及旅行护照上的一个戳印。我迎着阳光,进入德国的西伯利亚:前往马厂(Marzahn)。一名女友住在太空人大道(Allee der Kosmonauten)不远处。公园内空无一人,是个平凡无比的工作日。远处,在绿色草坪上,大型公寓一栋连着一栋,所谓社会主义的变种,我已在马克区(Märkischen Viertel)见到,让我眼花缭乱,无话可说。我心里有个声音结结巴巴说着,那是进步,你现在终于懂了吧?我很看重蚂蚁:它们懂得盖东西,就像人类一样,它们把住处以生动的形式盖到让人晕眩的高度。但这里这个是什么?那位女友在这儿想干嘛?她搬来这里是想学习害怕?她不再需要这些课程。她是家中最后一位东德市民。父母一到退休年纪就迁了出去,承办官员不久前批准了她哥哥的出境申请,和他之前还被关在女子监狱几个星期的女友一起。没人会以为可以这样轻松地溜到对面去吧。

她待在哪儿,基本上已无所谓了,是烧煤炭取暖的老房子,外头还是同一个月亮。在于尔根·福切斯的书中,她叫爱娃·布劳(Eva

Blau)。她是他的初恋情人。我称她为女友,但事实上,我们是亲戚。她对我说了很多他的事,说到他们两人长大的赖兴巴赫(Reichenbach),那里的街道突然坠入深渊,另一头又陡峭升起,在路的尾端时,只瞧得见天空。说到一起散步到自杀者跳下的哥夏谷桥(Göltzschtalbrücke),以及无数和他的谈话,那位想成为诗人、毫不妥协的年轻人。

我慢慢买他的书。带着一种羞愧无比的感受,我读着《审讯记录》(*Vernehmungsprotokolle*, 1978),关于他“1976年11月至1977年9月”在霍恩施豪森(Hohenschönhausen)国家全部检查拘留所的日子。长年拘留,还是撤销国籍,是于尔根·福切斯能有的选择。一名审讯者以下述东德市民的话释放了这名比尔曼的朋友:“好了,福切斯先生,现在要开始大拍卖了。(大笑)明天起,您可以尽情交心、好好抱怨了。等您被消耗殆尽前,还会有几篇文章。我已经很期待在牙膏和香烟广告旁看到您挑出来或抱怨的文章了。”九天前,在1977年8月16日,他的同事是另一种语气:“您别来惹我们。我们到哪儿都可找到您,在西方也不例外。到处都有车祸的。但您可不想去西方吧。您以为这是威胁,没错,不然会是什么。”

这个威胁是认真的。国家全部用了无数分化手段来对付于尔根·福切斯,直到1989年。他们的长手臂可以轻松伸至他在滕普霍夫大街(Tempelhofer Damm)的新住处:他们有所有地窖房间的钥匙,多次试图控制敌人的车子,划破农舍拖车,松开孩子脚踏车的把手,以他的名义订货,不断要除虫公司前来除臭虫和虱子,搞电话恐吓。福切斯一点也不安全,还有最后一笔账没算。这场神经战持续



右为于尔根·福切斯(1950—1999),左起克里斯蒂安·库内特、格鲁夫·潘纳赫与沃尔夫·毕尔曼,摄于1977年。

了十二年之久。

有次,在80年代末,在他作品《懦弱的结束》(*Das Ende einer Feigheit*, 1988)朗读会后,我对他提到爱娃·布劳。他只看着我,没说话。我解释我怎么认识她的,终于有了反应,但却短暂失神:“啊哈……”就这样。我无计可施,无法解释他的行径。今天我认为,他以为我是折磨他的人的狗腿子之一。这个插曲以老套的方式说明一个自觉受到追捕的人如何活着。“我们到哪儿都可找到您。”我却一点都不知道,以为他会感到高兴。

1999年5月9日,于尔根·福切斯死于血癌的一个变种(和之前的鲁道夫·巴罗[Rudolf Bahro]及作曲家格鲁夫·潘纳赫[Gerulf

Pannach]一样)。他自己怀疑,病痛是在被拘捕期间的高剂量辐射所导致的。统一后,在国安局的检查拘留监狱找到了被藏起来的 X 光仪器。于尔根·福切斯活了 48 岁。

除了迫害他所搞的致命威胁等“小手段”,他是怎么看待当时的西柏林呢? 1979 年出版的《日记》,收集了朴实痛苦的诗,围绕着如同在异国的德国那类放逐意识的问题。其中一则写道:“这个小岛/亮片与石头堆成的/可能是出路所在/就算四处是水/而且也不是我的家。”内心深处和消费资本主义的距离,让这位新的岛民放弃在心理上抵达西方的希望:

我知道
我们会死
在这些百货公司中
在我们
还没学到,辨识
我们手中
陌生的钱币之前

因为这个世界由石头造成
而我们没有
它的寒冷

就是这种两德之间存在的莫大失落。对东边的封建社会主义失

望,厌恶西方价值中的商品性格,在错误的选择中消磨着,他们成了后来战后历史中的麻风病人。他们在西方有段时间受到政治左派的重视,却无法掩饰在评估东欧的现实和希望国家社会主义改革上,无法相容的事实。“我们会打扰吗?”福切斯在1983年美因茨(Mainz)作家大会上问道。“我常常觉得自己是不速之客,出于放松心情的原因,宁愿不说出自己的真相。”

“遣词用字很累/说出来也累/‘别说话’/但谁又说了‘社会主义’/‘民主’/‘自由’令人作呕/而且害怕/我们走失/在句子的丛林中/也怕再也没有任何话语/表达我们要表达的事。”他在《审讯记录》中就已表示出来。然而,他依旧以人类重要观念的名义写作,勇敢地在权势者的倒行逆施前捍卫这些观念:“我属于那种无法容忍把社会主义这个字眼变成谎言,拿来嘲弄的人。这个字眼不属于那种以人民的名义统治自己人民的善变君主,并逐渐把自己的国家变成军营的人。”在“君主”不流血垮台后,我们会看见这个字眼平步青云。

宫殿

在弗里德里希大街边境服务大厅里,泪水可没少过。东柏林人不得不看着自己西边的亲戚消失在隔离室后。在此之前,最后的话不外是:真好;希望很快再见;一切平安;要写信来。这里不适合多愁善感和动不动就哭的人,还是如大家所想,就是要给这些人。正是这些不祥之地塑造出柏林的“印象”,就算新柏林现代化,完全迎向一个

干净、没有污点的未来。身为访客，找着自己的“柏林之光”，是不会空手而归的。只不过要在这里体会这座城市，而没有任何的风险与副作用的话，实在很难。

一般人把这个服务大厅称为“泪宫”。十多年前起，这里举办了许多文化活动。隐藏式摄影机没了，挂上了喇叭和天花板上的照明设备，那些隔音的小房间改成了厕所，只要有入场券就可进入。会场经理怎么说呢？一个有独特气氛的场所。迷人，就是这样一个过去的边境站。在这个棚屋中，今天还是可以嗅出一丝淘汰的味道。有太多的人在这儿被拒，就在当时的柏林还不像今天这样国际化与欢乐之际。

对面是当时的海军上将宫，一栋 1910 年有点笨重的华丽建筑，已相当破旧，显然不太能吸引投资者。大家还是想立刻进去，登上一些阶梯，在一间十分老式的咖啡屋大厅阅读、抽烟、点杯白兰地，忘却时间。在轨道另一头的文化百货公司，可以买上一本书，但该在哪儿读呢？或许菩提树下大街有不少咖啡屋，但这种特定的退缩与珍惜的形式，保证了一间真正好的咖啡屋，让人别无其他选择。

这个宫殿是在一座盐井上搭起的“海军上将花园浴池”之后盖的，经历过繁华时代，里面也容纳了那个时代的品味所留下的东西：保龄球道、咖啡馆、赌场、电影院及临街的大型餐厅；带有浴池的冰宫（“柏林冰上轻歌剧”）、歌舞剧院、杂耍剧院及建筑后侧的歌剧舞台。1946 年 4 月 21 日，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德国共产党结合成为德国社会主义统一党那件耸人听闻的大事也在这里完成。两党主席奥图·格罗特沃(Otto Grotewohl)和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相互握手，展

现德国工人运动的再度统一，但那不过只是在苏联占领区当局的巨大压力下才实现的。这出蹩脚的历史剧并不乏人赞扬；握手成了新的政党普及全国的象征。1953年，讽刺小品剧团“飞廉”(Die Distel)在当时的海军上将赌场演出。两年后，世纪交替之际便奠下歌舞剧传统的大都会剧院(Metropol-Theater)来演出。直到1997年大都会闭幕前，更衣室、按摩间、烫衣间、男女澡池及老浴池的酒吧都被当成剧院的储藏间。今天油漆剥落，地窖积水，建筑处只允许在这间华丽的殿堂中举行小型的活动。“飞廉”在这种条件下，才可撑到今天。但总有一天，只要有人找到五千万的资本，这座从前的娱乐场所的病态魅力便会告一段落。

我们离开这个施普雷河、火车站与弗里德里希大街构成的三角地带，往北走过草堤桥，老远便看到右边的游览车。他们以一点小钱便从整个德国把退休人士和其他朋友拉至弗里德里希宫。老练的听众在那儿欣赏着“流行音乐与轻歌剧的国际巨星”巡回演出，屈就于流行音乐产品的魅力，睁大眼睛看着所谓伤风败俗的夜间节目。柏林早已彻底堕落。

1985年，老旧的弗里德里希宫被拆除掉。在当代的照片中，那座宫殿显得轻盈、缤纷、奇特，有如一座童话城堡，那里起先只是一个按照法国模式搭建的市场大厅，在1867年揭幕时，仍是城里的第一座。不久后，马戏团的辉煌时代展开，像萨拉曼斯基(Salamansky)和伦兹(Renz)等名人辈出。但街名却留了下来：在柏林剧团斜对面，介于莱茵哈德大街(Reinhardtstraße)与造船师大街间的小街便叫做马戏团街(Am Zirkus)，然而马戏团团员却不见踪影。一片废弃的土

地。马克斯·莱茵哈德(Max Reinhardt)在这儿起着影响,直到 1924 年:大厅在战后改建成为有着巨大圆顶的极端现代剧院。在侧翼的舞台,“声音与烟雾”(Schall und Rauch)讽刺小品剧团演出他们的作品,作者包括:瓦尔特·梅林(Walter Mehring)、库特·图霍尔斯基(Kurt Tucholsky)、克拉邦德(Klabund)。

出自梅林 1921 年《异端手册》(*Ketzerbrevier*)的《大城市进行曲》,今天听来仿佛未来的阴森景象,有着可怕的战争与内战、左派承诺的革命及德国右派血腥的反革命,尤其是第六段及最后一段的行进:

手枪与刀子先生

前进!

杀掉富有的贪婪鬼,

前进!

夜里,在最后一回合开始时,

等大家都在断头台前翘辫子。

好好杀人。

那是我们的时刻。

前进!

当时大家会觉得好玩,狂叫欢呼,还是听众感到背脊发凉? 这些文字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总是赶在事件发生之前?

今天还有人读图霍尔斯基,并乐于引述,且常常再转述,但梅林



瓦尔特·梅林(1896—1981),摄于1929年。

呢？德国流亡分子的经历可是惊险无比。自找的，那位在所有体制中相当正派的市民这样想：他是不会碰上这种事的。教师会一定是由这种人组成，以“不爱国”的名义把中学生瓦尔特·梅林踢出威廉国王中学。这位年轻人在外面通过会考，研读艺术史，不久后又放弃，此后只从事写作。接着这位“革命和平团体”的成员被派往战场当炮兵。1919年，他为“声音与烟雾”讽刺小品剧团写下他第一部作品：一出名为《真棒！》(*Einfach Klassisch!*)的木偶剧。真人大小的木偶出自约翰·哈特费尔德(John Heartfield)，舞台布景由格奥尔格·格罗兹设计。

“所有艺术的动力便是煽动。”尤金·德拉克洛瓦(Eugène Delac-

roix)这句话也有可能出自梅林。他的一篇达达主义文章,就在处理刑事诉讼。身为20年代早期著名的政治讽刺小品剧作者,他总离不开丑闻。图霍尔斯基热烈说着:“节奏这码事,根本就还不存在。他有种新的生命感,新的节奏,新的技巧。”梅林把大都会柏林的景象、政治口号、头版标题及过去世代的诗艺技巧,拼成自己的“爵士语言”。他的攻击也落实下来,这位炮兵终于学会射击。媒体、帝国部队、高等法院、市民阶层、教会,无一幸免。在他眼中,国家只是一种“密谋推翻个人的合法利益团体”。

巴黎那四年(1924至1928)绝未让他驯服下来。回到柏林,他攻击纳粹(1932年,他为希特勒画了一幅诗意的“写实画像”,而承诺要亲手对付这位“聪明野兽”梅林的戈培尔,他则献上《跛脚的魔鬼》一文):人家嘲笑他为“灾难梅林”,他根本不予理会。他知道自己面对何种危险,但依然不抱持幻想:“我写作,不会改变任何原子。”1932年,就在纳粹夺权前不久,他最后作品之一——《地狱喜剧》(*Die höllische Komödie*)被禁止演出。梅林在最后关头脱逃,前往维也纳,继续写作:两部小说,并为几乎所有重要的流亡杂志写文章。当奥地利被并入纳粹帝国时,他逃往巴黎,但在二次大战开始时,同时被关入无国籍者的拘留营中,因为1935年德国当局因他不在国内,把他剔除国籍。后来他逃往美国,靠着写作凄惨维生。1953年,他回到德国,奔波不定,下榻于汉堡、慕尼黑及柏林的廉价旅馆。最后他迁往苏黎世,1981年在那儿去世。

“我不是被人遗忘的作家,而是未被出版的作家,”他这样抱怨出版社与读者对他作品的冷淡。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Friedrich

Dürrenmatt)对他这种极度沮丧解释道：“人们要不是想要歌咏他们的没落,便是想要遗忘。梅林两者都不想。”对他来说,重要的似乎是保有思想独立,并不让自己的作品被误解。东德建设出版社愿意支付 5000 马克,重新出版他在维也纳流亡时的小说,被他拒绝,同样他也拒绝德国总统海因里希·吕布克(Heinrich Lübke)给这位陷于困顿的艺术家的 2000 马克救济金。1976 年,照他所说,陷入他这一辈子“最不幸的灾难”:一个旅行箱不见了,里面有一份八百页的手稿,是一份“地下世界都会地狱报道志”。

这些奋战不已的作家们,真的只剩下声音与烟雾,他们被编入文学史中,作品不时在一定的安全距离中被曝光整理,只要是和“当时”有关,和“狂野的 20 年代”有关,和德国第一共和的思想及野蛮思想有关? 梅林在异地又再说过:“奖金最高的谜题:基督存活过吗,被改成这个问题:你们有没有来到人世过?”

8 在奥兰宁堡大门和哈克市场间

生活艺术家

谁想从弗里德里希大街到奥兰宁堡的话,在 1909 年其揭幕后,便可走捷径,穿过弗里德里希大街长廊(Friedrichstraßenpassage),上面便是欧洲第一座钢骨结构建筑。零售商组成工会,试着在这有着巨大圆顶大厅的显赫建筑中,和大百货集团维尔特海姆与提兹(Wertheim und Tietz)一较高下。1928 年,在大萧条之际,通用电气公司(AEG)接收整栋建筑,以“科技大厦”(Haus der Technik)之名继续经营下去,接着遭到炸毁,大部分的长廊成了废墟,只有奥兰宁堡大街(Oranienburger Straße)那部分的建筑躲过战争及后来的拆除,那里有东柏林唯一的院线电影院“卡梅拉”(Camera)。在统一后的混乱时期,即兴艺术家迁入这个没有百货的百货公司熏黑的废墟中,搭

起工作室与咖啡屋,再度经营起电影院。他们直觉地为这个新的黄金城后面的废地,当时的犹太人地带,取名为“塔赫勒斯”(Tacheles),作为露天啤酒馆及木屋与旅行房车的工地。这在无政府时期的蜜月期间才有可能,不过很快幻想与随性艺术收复了城市的生活空间,没有计划,狂野,混乱。很快地便众所周知了。塔赫勒斯艺术家中心成了欧洲与美国生活艺术家的圣地。90年代初,这里似乎又兴旺起来,大家都想插上一脚。仿佛就在等好时机似的,地下活动一下子又出现了:在地窖里简陋地成立了俱乐部,过去零售商的店面进驻画廊,清扫干净的工厂楼面成了艺术家的住房,音乐商店迁入有壁炉的三房住宅。国家掌控的单一文化退位,空气中都是觉醒的声音:听来是古老、却永远年轻的自由之名,和以前一样令人着迷。

这种占领城市空间的奇特情况,并非全是东德人造成的,虽然普伦茨劳山上受到冒犯的剩余团体成员们这样认为。这种氛围也感染了西柏林的活跃心灵,证明了城市两区都需要同时克服他们自己的困境。在西半部,人们住在拥挤的环境中,想离开,又不愿回去西德,起先几乎令人喘不过气来。十字山的方案在艺术上与政治上已被耗尽,眼前没有任何新的计划。突然间,围墙倒塌,荒芜的东边提供了这些让人迷惘又让人激动、有着不同程度颓圮的城市风光。离饭店、使馆、博物馆及政府部会聚集的壮观大道不到十分钟的路程,在奥兰宁堡大门和罗森塔勒广场之间,柏林被遗忘的中心正打着盹。时间在这儿并未停止,只是走得不一样:缓慢,且是东欧式的。墙上的弹孔见证了几乎已半个世纪前的首都之战。人行道上,褐煤搁在地窖天井中,檐沟中长着杂草和畸形的桦树。共同的未来并没有来敲门,

而是一下子就出现了。

当时 26 岁的杜尔斯·格林班(Durs Grünbein)在《明天的灰色地带》(*Grauzone morgens*, 1988)这八十九页诗集的噩梦中,捕捉出东德城市的停滞与逐渐颓圮的图像。出版社称这位德累斯顿青年的诗为“来自失落一代社区的慢动作影片”,他不久前搬到首都,经历着这个地区如何接上西欧的富裕标准。诗集中一首诗名为《那就从头开始》。在“慢慢驶进一座被毁的城市”时,从模糊不清的地下室窗子看见:火车站厕所前死气沉沉的男子和疲惫的女人,“天哪,怎么会有这种疲倦的脸孔!”及“记忆中滴落下来屋舍:/战前手风琴的甜美琴声,一桩/在防空地窖的秘密恋情……多美好/在肉店/橱窗中的灯影下/迷乱地看着一只乳猪。(你终于醒了。)”

西边来的访客看着想象中的田园风光,嗅着眼前依然蒙尘的、令人喜爱的异国世界。这种风光让他们感到讶异,以近乎老套的方式描绘着东边的图像。他们的眼睛是否在五光十色的西方见不到任何东西,现在到这个触动他们诗心、充满各种可能的“灰色地带”来趟发现之旅。

当大家试着在官方机构中依照西德模式建构一种可以运作的管理方式时,在柏林中心、弗里德里希树林区及普伦茨劳山,小型餐馆不断冒出来:蝴蝶和夜蛾围绕着这些缤纷的野花,以马克帮它们授粉。闪闪发光的次文化小绿洲出现了,有些仿佛体现了东西两种文化间的第三条路。照明不足的夜色,为这里的熙熙攘攘添上一些鬼魅气氛和地狱般的腐化,在一个残破的对比世界中,有着堕落与纯然享乐的影子。在空窗期间,先锋植物最能生长,但很快当局代表便以新体制的全权代理身份出现:建筑局的人察看着访客的安全是否受

到保障,还有卫生局、商管局与税务机构。以前的屋主回来登记。一定会被拆除的房子,最有不动产潜力,租金必须讨价还价,完全根据这区的魅力而定,不然就要在几周内开始翻修,自然会顺带把前任房客赶出去。至今仍可察觉许多重新开始的好处,带给这座城市一个新的百慕大三角洲,有一阵子,晚上出来猎奇与“冒险”的人都会相遇。是否这种复苏最后只会剩下一种对普受欢迎的变换花样的记忆,对一种在城市大海中一个至今陌生的地域的短暂兴趣的记忆?我很难想象。因为今天的柏林仍靠着传奇的中心区在过活,也有商业上的,混合着时尚、音乐、影像与造型艺术,自然比较缓慢的文学并不积极,就算在这期间从一些经验报道中可以回味那种觉醒的声音。——像诺曼·欧勒(Norman Ohler)便能及时在1995年从纽约来到这里,在哈克市场的一栋屋中开始写作他的小说《中心》(Mittle)。这本书2001年出版时,城市发展早就把他鬼故事舞台中所有阴森的东西拿走了。我们读到,欧勒把哈克市场视为“敌人国度”。——要是没有孕育这类传奇的历史童话,传奇将一无是处,这座城市主要要感谢早期那些快乐的业余活动。但传奇往往只能依赖可靠的资本。正是最早的先锋不得不最先体会到这点。谁要是不能及时职业化,便只能退场。市场法则并未为出力的老兵预留例外。准确地说,经济不懂过去,因为只为现在算账。然而,不少音乐俱乐部懂得记取教训,尤其是四处流窜的WMF俱乐部,至今不受逃窜与驱赶的影响;仍然继续迁移,最后迁到卡尔·马克思大道的前莫斯科咖啡屋。短期间便在这儿聚集的画廊,情况较好,大多数在李宁大街(Linien-straße)及奥古斯特大街(Auguststraße)(1999估算超过七十

间)。只有在这儿,它们的生意才能更上层楼——只要这个传奇持续下去,便可吸引有购买力的艺术爱好者来奥兰宁堡。

“水果与蔬菜”(Obst und Gemüse)现在也消失了,这是一间不是第一时间营业的咖啡馆,由三名西柏林人 1992 年开始经营,就在塔赫勒斯艺术家中心对面。我最喜欢冬天的时候去,尤其下雪时,那个橘黄色暖色调的空间挤满了冻僵的人,他们在那里取暖、阅读、写作或三三两两交谈着。它的名气全靠名字(东德的店招直到最后都挂在门口):我没在那儿见过一丝大惊小怪和柏林刻意的装腔作势。或许出于老习惯,那些不会出现在柏林旅游中心点附近的人会来到这里:大城市饱经风霜的脸孔,活生生见证着自我坚持有其代价。在那间咖啡馆 2002 年夏天整修关门几周后,我在拉下的木门上看出问题:“结束营业?”

在我最后一次去查帕塔咖啡馆,那个喷火的铁皮怪物还呼啸着,吓到了一群来参观塔赫勒斯艺术家中心想喝杯巧克力的西班牙学生。他们拍了照片,可以看见友善的南欧人坐在做工粗糙的板凳上,和这间屋子废铁利用时期制成的比例失调的椅子所构成的粗暴室内装潢中。这种原始主义是 19 世纪繁荣时期的最后回响。惨不忍睹的厕所便能清楚见证对市民秩序标准的蔑视(没有牌子的门前有着猜谜游戏)。像雨果·雷斯(Hugo Race)这样的人,似乎在查帕塔咖啡馆感到舒适。他会定期出现在这儿,沙哑低沉的声音说着阴暗的年头还未过去。身为在柏林备受重视的尼克·凯夫(Nick Cave)的前战友,没人比他更了解人类存在的深渊。他和他的乐团“真实心灵”(The True Spirit)为一群激动入迷的听众展现,如何合乎规矩地

拆解蓝调,加上一点佐料创造出些崭新的音乐。屋顶上的麻雀啁啾着塔赫勒斯艺术家中心存活下来。经营团队起了争执,留下的和投资人商议出一份使用合约,让他们还能有几年落脚之处。整修早就开始,随着新铺设的管线和被补起来的墙洞,部分过去的认同感也跟着消失。最后的沼泽干涸;他们还让废墟的孩子再玩一会儿,直到终于赶走他们。

踏上奥兰宁堡,会有失落的感受。几间小吃店还在,那些在街边揽客的女孩也还在,而同时许多到中心参观的人在温暖的夏夜挤在咖啡馆、酒吧、夜店及餐馆林立的人行道上。时髦的新餐馆是外来的,仿佛漂浮着,在这儿没有根,占着之前不相干的空间,不知该说什么话,因为什么都想说。相反,那些警察二十四小时必须看守的犹太店面及新犹太教堂,他们在这个地区的历史中有根。

激情与无聊

“我对各种文化现象都感兴趣,在没有亲眼瞧见之前,我是不会轻易拒绝任何东西的……”《慕尼黑广讯报》(*Münchener Allgemeinen Zeitung*)记者汉斯·亨提希(Hans Hentig)在他关于“新激情”(Neopathetischen)一夜的报道中这样开始。雅克布·凡·霍迪斯(Jacob van Hoddis)也算其中一分子,他的本名为汉斯·大卫桑(Hans Davidsohn):“是难产来到世上,”一位有可卡因毒瘾医生的儿子,“一位脾气暴躁的牛皮大王与独来独往的家伙”(迪克·曼德[Dirk

Mende])。只有 1.55 米高的大卫桑是“新俱乐部”的发起人之一，一个犹太学生的结社，企图对德国文学进行革命，他也是所谓新激情讽刺小品剧团的主办者。在他著名的诗《世界尽头》(Weltende) (“市民的帽子从蛋头上飞走，/空气中回荡着叫喊……”)中，朋友库特·希勒(Kurt Hiller)认为发展出了表现主义的诗学。

总在强调自己没有偏见的汉斯·亨提希，描述并评论着 1910 年 7 月 6 日这些文学造反者的演出：“一名自称为雅克布·凡·霍迪斯的年轻人上了讲台，一开始就对被虐的听众幸灾乐祸微笑着，跟着很快朗读了他的作品，大家无比吃惊。每念完一段，他就满意地微笑着。我还很少听过这么丑陋的东西。凡·霍迪斯先生，他有我不喜欢的眼睛……”接着是在暗示这位年轻人的伟大令人恶心，并对艺术感兴趣的听众提出好建议：“新激情还有几晚的活动，对认真的人只能警告他们别碰凡·霍迪斯先生，也不建议来听其他的新激情分子——盖奥尔格·海因姆(Georg Heym)、库特·希勒、艾文·罗文森(Erwin Loewenson)。他们会影响柏林的精神卫生的。”

在诗艺和卫生纠结之处，我们看到正常精神的艺术卫士已接近内心之眼。艾尔瑟·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Schüler)，一位德裔犹太浪漫文学团体的神秘精灵，印象则完全不同：“一下子，一只乌鸦飞起，”她写道，“一颗乌黑的头阴郁地从讲台桌前看过来。一位叫做雅克布·凡什么的？他固执却热情洋溢地念着他的短诗，如此晶莹，让人想偷走。”

6 月 1 日，新俱乐部在哈克施旅馆举行第一个新激情之夜。在开幕词中，库特·希勒勾勒出艺术与生活统一共同理想，说着“新的

激情”，是激扬的活力，是对知识与艺术的强烈欲望，是“思想冒险家”“普世的欢愉，惊慌的笑声”。

我们大胆离开这儿，离开文学的激情和经验哲学，跃入当代，来到今天反激情人士的世界，他们既不关心哲学，亦不关心他们历史前辈的觉醒和愤怒，并在柏林的讽刺小品朗读舞台上对他们的日常存在赋予自我嘲弄的味道。我们面对的是艺术之后的文学，置身于一种精神上的松弛。

嘲讽便是王牌。相关团体的名字已经透露出这一点：除了“改革舞台家与世界”（Reformbühne Heim & Welt）外，“网络诗人”（Surfpoeten）定期参加“斗争与自由联盟晚会”（Abend der Liga für Kampf & Freizeit），其他的举行“爱情换毒品”（Liebe statt Drogen），梦想着“狂热者公路”（Chaussee der Enthusiasten）上的林荫道，或总在星期天空着肚子在“怪博士上午酒”阅读。他们早就用脚表决过了。就连成名的作者也难以吸引像他们一样多的观众来他们的传统朗读会。

每个朗读团体有固定的核心成员，有的会邀请业余的客人上来表演。文学上的要求和形式上的精练受到唾弃。文章要短，免得听众疲累；要立刻起作用，不然就算了。让我们有时陷入错误绝望的德意志深沉内涵，似乎被超越了，原有的意义重力消失。我曾去过汉堡大街（Großen Hamburge Straße）的慕德俱乐部看网络诗人表演。在这些穿着球鞋的人中，有两位穿着裁掉的军队迷彩裤，在他们拖着脚步在讲台上舒服坐定前，DJ 会先用音乐帮我们理解他们这个自由战斗团体的玩笑文化。我立刻陷入那种忍耐的呆滞中，而

这个“砸诗”(poetry slams)团体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在传统文化活动中观众自己造成的无能,也不无道理。在随后的朗读中,直到我周围二十多岁的观众大笑回应其中一个成功的桥段时,我才清醒过来。我觉得回到了学校时代,果真如此:这个有着长啤酒凳、坐坏的沙发和破损的单人沙发的地窖,和在大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情形下,自行搭起的咖啡厅,我们学生在那儿不受老师监管,不理睬生命的严肃,挤在那儿坐着,对勇敢地让我们分享他们文学处女作的人大声鼓掌。有何不同?我们一名同学叫做阿涅(Ahne),已出版了两本书(《我怎样拯救世界》及《我再重头开始》)。他朗读着大家都感受到的沉重生命及他特有的乳酪脚,不动声色,当掌声响起时,他转过身,坐回到沙发中。阿涅是网络诗人中言语简洁者,这个顺风无比的诗艺股份公司——一路回到了青春期。

柏林书写一个已不再如此崭新的方向,致力于东德的童年与青春初期。在《太阳大道最短的尽头》(*Am Kürzeren Ende der Sonnenallee*)中,已彻底证实世界这个部分的无比趣味,不论在书中(托马斯·布鲁西克〔Thomas Brussig〕),还是电影里(利安德·豪斯曼〔Leander Haußmann〕)。最近出版的作品——雅克布·海因(Jacob Hein)的《我的第一件T恤》(*Mein erstes T-Shirt*, 2001)可为典型——可说是幼子文学,由再也不能明白年长的兄弟姐妹曾经必须经历的事的最小的弟妹来写作,他们不明白兄弟姐妹以何种愤怒和重点与祖国打过大战。对这些后辈,也是“这个地带的孩子”(雅娜·亨泽尔〔Jana Hensel〕)而言,有个免费的小小自由空间,里面有许多只在濒死的国家体制中才有的晚期欢乐,可在一定的安全距离下来描绘。

在文学及朗读舞台上发掘了东德的娱乐价值，透过电影进入电视中。

现在看来并不是只有少数几个人想要脱离这种结合了渴望与距离，成为世纪交替的一种典型现象，让告别过去变得轻松的家乡电影。像《柏林在德国》（汉纳斯·斯托尔〔Hannes Stöhr〕，2001）与《再见列宁》（沃尔夫冈·贝克〔Wolfgang Becker〕，2003）虚构出的时光之旅，得过奖并且吸引观众，虽然完全表面地强调消逝的过去与可以运转的现在之对比，因而放肆地利用两个不合时宜的人不得不陷入的情境幽默中，可以拿他们和像《夜的身影》（安德里亚斯·德里森〔Andreas Dresen〕，1999）或《不可触摸》（奥斯卡·罗勒〔Oscar Roehler〕，2000）等深入描绘多数人的适应能力艺术电影对比，照我看，那是德国历史中令人惊讶也令人狐疑的东西。

大思想家

踏进一位死者的住处，真是怪异。原本还在使用的东西，突然间一无是处，到处搁着，留给后人。它们的主人离开了。我们看见的是个冻结起来的瞬间：被推开的椅子，打开的书，喝了一半的杯子。

在十几年后这个住处成了博物馆后再次踏进至今依然出名的死者的住处，便更加怪异。最后一刻的杂乱成了圣地神圣的规则。死亡让这些物品变得珍贵。请勿触摸！

1956年8月14日，贝尔托·布莱希特在这间住宅去世，在这

张床上,午夜前一刻死于心肌梗塞。但参观这里不是从卧室开始,而是从前的茶水间,看见小工作房的第一眼便驱散了最糟的忧虑。这里并未展示一位经典作家的生活,没有展示玻璃柜,没有照片,没有海报,只是一间住宅,有桌子、书架和一架黑色的电话,和在旧影片中见到的一样。只有味道让人想起这是展览,这里什么味道都没有:没有老人的味道,也没有雪茄的味道。不过到处是烟灰缸,这是布莱希特逃离追捕的德国士兵变换住处后,总是第一个开封的东西。有多少张照片见不到这位大师抽着雪茄?不可能太多,因为布莱希特早就明白营销法则:没有相关的意象及吸引观众的自我表演,是不会成功的。奥格斯堡的肖像照片最为有名,只见这位三十岁的作家穿着黑色的皮大衣,嘴里叼着雪茄,头发理得短短的(那也是一个标志)。这个人刻意保持他的独特。这个意象十分强烈,在他死后,还影响了一大群学生、年轻人与模仿者,其中还有几位小有名气。(像海纳·穆勒及特拉格伦〔B. K. Tragelehn〕等“抽雪茄”的作家)。

1978年起,等到布莱希特—魏格尔纪念碑揭幕,这些房间便不再有人抽烟。如果有人胆敢抽的话,烟雾警报器就会运作:把抽烟的人看成纵火者(布莱希特说不定会喜欢)。房间相通,小的进到大工作室(四个烟灰缸),角落的窗户旁,诗人坐在打字机前,一台Royal Quiet De Luxe,可以看见下面多罗廷区墓园中的黑格尔墓。1951年,弗里德里希·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已经写过:“大概只有在巴黎的拉雪兹神父墓园(Père Lachaise)才会再见到这么多灭掉的火把。”



贝尔托·布莱希特
(1898—1956), 1956年

“亲爱的苏尔坎普(Suhrkamp),”1954年3月,布莱希特写信给出版家,“我现在住在乔叟大街(Chausseestraße),在‘法国’墓园旁,里面安息着胡格诺信徒及黑格尔与费希特(Fichte),我的窗户全都对着墓园。令人愉快。”令人愉快,这位唯物主义者现在同样安息在那儿,离德国唯心论的明星不远,但诗人同侪与社会写实主义者约翰内斯·贝歇尔的墓更近,他曾当到东德的文化部长一职。

“这个大房间约九米见方,我可以加好几张桌子来做不同的工作。基本上,所有的尺寸都很合理,真的应该住在房子与家具至少有一百二十年之久的地方,也就是在早先的资本主义环境中,直到后来成为一名社会主义者。”

在整面墙都是书的房间里最大书桌旁,最上层的书架搁着他心

爱的平装本犯罪小说。今天，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海莲娜·魏格尔1930年生下的女儿芭芭拉，踏进他父亲最后的住处时，还会取下一本，打开搁在卧室的床旁（“老爸总是这样”）。就在现在搁着报纸的小桌上，有布莱希特订阅的《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法兰克福广讯报》、《新德国》（头版标题：军国主义是最大敌人）及《世界报》（有张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泰根湖〔Tegernsees〕的照片，图片说明：经济奇迹的假期），那是1956年8月11至14日出版的，是这位清醒的读者的忌日。在导览时，我得知贝尔托·布莱希特和沃尔特·本雅明想要一起创作犯罪小说，不过因为30和40年代的政治恐怖而无法实现。这两位流亡作家经历着完全不同的犯罪故事：朋友以死告终。

访客看到的图书馆约有四千册书，但不能拿来阅读。学术整理（书的来源、阅读笔记、阅读注记、画线、评论）已经结束。布莱希特算是本世纪被阐发最为透彻的作家之一，看来几乎没有必要再加研讨的题目。没有三楼的布莱希特档案馆，这一切显然不太可能，那要感谢著名演员（勇敢的母亲）与柏林剧团的经理海莲娜·魏格尔。为了靠近剧院，布莱希特在1953年10月从白湖（Weißensee）搬到这个三房的住宅。1954年，布莱希特和魏格尔在他们回来后成立的柏林剧团，终于搬进在造船师大街自己的窝中。在那之前，这个自1949年1月勇敢的母亲首演后全世界知名的剧团，一直在舒曼大街（Schumannstraße）的德国剧院（Deutschen Theater）演出。

我在半个多小时的游览中得知布莱希特很喜欢房子的两个出口：布莱希特和女性——下一位来到时，前一位就得不动声色地离

开。他也有许多访客，多半是造船师大街的剧院人士，“他们一来就是一大群，但您(苏尔坎普)知道，我是很欢迎的。”他喜欢笑，也笑得很多，是位耐心仔细的听众，如果这位“天性难以自制的人”一下生起气来，也会道歉的。“如果我又再骂起来的话，请提醒一下”，他会在一份通告上向柏林剧团的舞台工作人员求助。他是开自己的车去那儿，不喜欢走路。他去世前几周，他不敢再开车。屋前通往乔叟大街的汽车出口太窄，布莱希特已过于虚弱，不敢单独开出去。

在执导海纳·穆勒的《迁走的女人》(*Die Umsiedlerin*)后于1961年被党判处“生产缓刑”(他下放到褐煤矿场)的作家和导演特拉格连，1956年8月说到布莱希特之死，那来得突然，但“就是布莱希特的样子”。两个月后，坦克开进匈牙利，五年后，党在柏林搭起一座“反法西斯的保护墙”，十二年后，坦克开进布拉格。如果要为慈父般的朋友请求世界性的宽容，那这可算是一种亲布莱希特式的论断。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工人起义，就已让布莱希特陷入困境，这位辩证历史解释的大师自己也不知如何说服别人。半年后，斯大林清算的整个规模曝光，布莱希特写了他最后一首给这位最高领袖的诗，那位“有贡献的凶手”。他还能把这个政党当成正确的观念多久？每个人都想在这背街的房屋里找些不同的东西，不管是匆匆的访客，还是没被整齐的档案柜和分类卡片之林吓到的探索者。我找着那个不想教训我的布莱希特，他朝我走来，没有武装，却又失去了人类的最终目标。在他的《工作日记》中，我找到了。1942年的一个条目表示：“我对清楚明白的热爱，是来自我甚不清明的思想方式。我会有点教条，因为我急切地需要教训。我的想法容易混

淆,说出这点,并不会让我不安。让我不安的是混淆。当我发现什么时,我立刻会强烈反驳,因为忧虑,又会马上质疑一切,因而我还喜欢以前那种幼稚,至少让我似乎可以肯定我所说的,是些微小的要求。”

8月17日,按布莱希特所愿,他被葬在自己屋旁的墓园。他给艺术学院写过:“在我死后,我不要被安置在灵柩中公开展示,也不要墓前悼别。”

1936年生于汉堡的沃尔夫·比尔曼定期到那儿拜访他,17岁时迁移到东德。在地下,这位大师躺在他的锌制棺材中,不能再交谈,远离人世——上面是他的崇拜者与学生,来自布莱希特根本没入过的党,后又被开除,被禁止演出,受到监视察看,后来甚至被逐出年老的布莱希特再也无法真正当成家的第二故乡及国家。“我们多接近某些死者,但/某些我们活着的人又多死沉”,比尔曼在《胡格诺墓园》(*Hugenottenfried*, 1977 未出版)里写下这个会面,和布莱希特一样,在他提及法国墓园时,指的是多罗廷区墓园。比尔曼之屋——我现在已这样称呼——位于萧泽大街131号,他在此闭关创作时,“表现得仿佛有五千人坐在他面前似的”(彼得·施奈德)。这里斜对着欧郎宁堡大门的十字路,与布莱希特的125号只隔着几栋出租公寓和那两座墓园。

9 布莱特沙伊德广场周围

商品与价值

柏林西区的大道汇聚在威廉皇帝纪念教堂，这里的柏油路名称也跟着换，刚刚还是选帝侯大道(Kurfürstendamm)，现在便叫做陶恩钦大街(Tauentzienstraße)，转向东南，往维腾贝格广场(Wittenbergplatz)而去，那里有一家在德国无可匹敌的百货公司。从一楼贵得吓人的香水与化妆品区起，顾客随着电扶梯一层层向上，来到什么都不缺的顶楼，那里流着牛奶与蜜，广播里放着天堂般的旋律，柔得让人脑袋麻木，根本不再思索，只想嗅闻品尝。然而，这里并非天堂，等大家看到价格时，自然便发觉到了。我们来到卡达威百货(KaDeWe)大面积的生鲜食品楼层。

还是单独住在凯斯大街(Keithstraße)一幢两百平方米几乎空无

一物的住宅时，波托·施特劳斯(Botho Strauß)便定期造访百货公司顶楼。1980年春陪同他购物的弗尔克·哈格(Volker Hage)描写着他的印象：

我们排队买小吃时，我有时间好好打量这个男人，他35岁，正是在德国的文学小世界大展鸿图的时刻。他中等身材，瘦削有力，一头短发，脸上无须，穿着及踝的时髦粗呢大衣，没有一丝艺术家的味道。要是我们问刚帮他打包虾子和鹌鹑蛋沙拉的女售货员，她会迟疑一下，大概认为他是年轻的大学教授吧。他的姿势与表情展现出优雅的理性。他不瘦削也不圆润的脸庞上只



波托·施特劳斯(1944—)，
摄于1997年

见到那个漂亮的弧形鼻子。那是一张从侧面看会突然产生惊人变化的脸。

哈格属于这位怯于接触大众的诗人愿意亲近的少数记者之一。他迷人的批评倒是大力促成了这位曾被猛烈批评的作家的成功，二十五年来，他享有独家特权，透过细心采访的家庭故事大大弥补了这位禁绝媒体的作家的生活。

没人像施特劳斯那样诊断着西德富裕社会的心理状态，并以他常被演出的作品在 70 年代成为高雅副刊中被宠坏的孩子。至于裂缝何时出现，(好心的)社会批评何时把他视为(恶意的)文明批评者与文化悲观论者，今天依然难以重现：他在《明镜》周刊中长达六页的《愈来愈大声的山羊之歌》(Anschwellender Bocksgesang, 1993)，导致了彻底的决裂与更强烈的回响。

我在作秀谈话和作秀审判间，只看见受到公开非难者在程度上差异的展示。谁在私人谈话时，让几百万无关紧要者呆呆看着，尊严受损，遭到终身再无隐私的惩罚。电子手段的舆论政体可说是最不血腥的暴力统治，同时亦是历史上最无远弗届的集权主义。它并不需要砍人头，只是让脑袋变得多余。

这位极被推崇(与嘲弄)的作家的拒斥媒体，后来可在这篇怒气勃发的文章中找到一个好战的解释。批评家反驳他，认为他赋予电视屏幕过多的意义，最好回头想想他原有的美德：对社会现实的敏感

认知。但他们拒斥出自一位叛徒口中的政治解释。根据旧有的联邦共和习惯法，他们要求并捍卫意识形态批评的特权，以猛烈的炮火来立刻捍卫自由、启蒙与民主的群众社会。

施特劳斯相当天真、笨拙或阴险，对政治“左派”解放文化概念失望，因而把自己界定成“右派”。当这些战士知道真正让他们上战场的是何种基本信念的话，许多人会倒戈。1993年，双方似乎在一种幽灵国度操作概念，打着太极拳。已经没有任何无愧于左派之名的政治左派了。只要他们还想表达什么，那些前社会主义者早已转到自由主义的阵营了，一个能够认真回答他们所渴望的社会模式为何的政治与文化上的独立右派已不复存在。施特劳斯攻击自由主义、平等的群众及消费民主体制与其意见市场，以及他们几乎把极为珍贵的事物平面化与琐碎化的致命倾向。只要知识分子准备把这当成正确与值得期待的发展的“副产品”来无奈接受的话，便会出现他们有多认真看待自己使命的问题。不久前，他们还要准备前导知识并促进国民的分辨能力，现在已与玩世不恭相安无事了。照我看，真正的论辩似乎在于在“后意识形态时代”的主导意识形态依然悬而未决。在其中，所谓的左派和右派不再让人惦念。动摇不定的年轻人不知如何是好，他们不了解实际状况，只要有人提供他们东西就行。

波托·施特劳斯 90 年代中离开这座大城市，隐居到柏林北边遗世独立的乌克马克(Uckermark)。“我花了好多年才从城里人的地牢与呢喃中找到我的声音”，他在《模仿者的错误》(*Die Fehler des Kopisten*, 1997)中记载着，那是他来自乡间(之前他已在文学上接近

美国西岸的隐士罗宾逊·杰弗斯〔Robinson Jeffers〕的第一份报道。他也在其中描写了千里迢迢进城来柏林的情形。这座城市曾经让他成为当代最仔细的观察家，而现在他却没太多话可说了。那些资讯丰富、人际关系薄弱的城市人让这位自行放逐的作者感到无聊。“我在这儿的时间：起床、看着外面，无法理解。打开书读着，再也读不懂。由于惊讶而无比拘束，思绪困顿。”

如果我正确理解了他最近两部作品《个体》(*Das Partikular*, 2000)与《当茱莉亚在屋外轻手轻脚，和爱丽斯在一起的夜晚》(*Die Nacht mit Alice, als Julia ums Haus schlich*, 2003)，施特劳斯现在又转向城市生活。“那里的美丽之处，我无法写下。”他当时告诉弗尔克·哈格，对乡村生活不满。时代见证人在大都会中会比在遥远的乡村更快注意到思想与文化的发芽，在更大更缓慢的规律性中运作，而非当时的人类理智。或许在那外面，再也不可能有一位德国的尚·乔诺(Jean Giono)或罗宾逊·杰弗斯，不是因为血缘与土地或赫尔曼·隆斯(Hermann Löns)，而是因为土地的城市化与居民的市民化。保守分子最喜爱的原始观，往往只是陷阱。

在浏览了一番的大柏林中，我们再回到出发点，西方的那座百货公司绝对是我们先前未中断与坚定的信仰的真正标志，认为过量的商品会将欢乐的生命物质化。在这座消费殿堂后，隐藏着整体的生命哲学，只会问着：这个世界多少钱？这栋建筑存在这许多年来，一点也未丧失其吸引力。这座城市的其中一颗心在这栋建筑中怦怦跳着，我们无法不理睬。

丛林小径, 铺上柏油

布达佩斯大街(Budapester Straße)在水族馆并入选帝侯大道。大家都知道动物园值得一逛。只有人才在那里忙着。狮子最令我喜爱。它们从不享受危险的自由,就算在铁栏杆后,依然展现出其王者的威望,混杂着至高无上的慵懒与令人畏惧的完美力量。它们吼叫时,我像是被打一样缩着身子,听着自己羚羊般的心怦怦跳着。再度当选的总理最喜爱的诗是那头植物园的豹,而下一首诗得考虑一下人类狂妄的无能,胆敢把城市丛林中的草原之王置于其敌人的目光下。一种安全距离下的戏,这样我们才会喜爱我们过度夸赞的自然。在享受与惊恐的影响关系下,这场王者之戏随时可和舞台上的演出一较高下,因为这个有安全措施保护的主角并不是演员。

一位参观动物园的诗人,也活在这座城市的保护墙内(在勃兰登堡的沙地草原外):杜尔斯·格林贝恩(Durs Grünbein)。他对人类这种“形上动物”的研究促成了同情的动物学。这位曾是德国新诗的天才儿童对他自己与同类的想法,可在他1991年最邪恶的诗集《头颅基本课程》(*Schädelbasislektion*)中读到。这本书受到友善讨论,但内容较少被注意。格林贝恩似乎也感到遗憾,在诗里捕捉人类的动物本质。等他年长成熟些,没有了早年的狠劲,便转向西方的文化遗产,也就是古代和蔼、思想相承的大师。他的诗集《公开的夜》(*Erklärte Nacht*, 2002)见证了这种转变。这位年轻人回忆一个

叫做东德的没有未来的国度的童年时所显露的愤怒,及柏林图像中一位市民的倦意(“长久哀悼并无意义,我们要弄走尸体。”),会不时闪现出来。格林贝恩知道,他的成名(毕希纳大奖得主;统一德国向外输出的主要诗人,被歌德学院当成当代经典作家,行销到半个世界)会带来什么:“一个男人坐在那儿,快四十岁了。/这意味着什么——功成名就? /人们来到世上迷失。/有天,夜会降临。”

选帝侯大道一路回到旧西区(Alter Westen),那个位于波茨坦广场和维腾贝格广场以前有钱市民的住宅区,弗朗茨·黑塞尔在他著名的《漫步柏林》(*Spazieren in Berlin 1929*)一书中,在此留下伤心的回忆。

旧西区消失了,就像不再时髦的美女一样。“大家”不再住在旧西区。在世纪之交,有钱人家已搬到选帝侯大道区,后来更搬至西端(Westend)或达勒姆(Dahlem),甚至到格林瓦尔德(Grunewald)的别墅中。

这听来是威廉式的“居住品质”,指的却是一定圈子搬出一个至今受到高度评价的地区的戏剧事件。柏林在帝国建立之际,朝西迁移,中心倾斜,最后发展出第二个中心。后来这个“西迁”,主要因为1871年至1920年柏林居住人口的倍增。市郊的兴起更加明显,特别是富裕及讲究文化的夏洛腾堡区(Charlottenburg)。在帝国总理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的建议下,随着把选帝侯大道扩建成华丽的大道,柏林坚守这个发展方向,将旧中心和新兴的市郊结合起来。

一个偌大的铁路网及南北环城路与城市地铁,在 1890 年代涵盖了这个巨大的地区,在 1920 年结合了七座城市和大柏林许多乡间社区,形成一个响亮的名字。英国作家斯蒂芬·斯彭德(Stephen Spender)在这个都会的两极中看出两个原则的对比:一边是“普鲁士夸耀试图建立一种造作的希腊古典主义”,另一边是“巴比伦妓女”的诱惑。换句话说:这里是自由买卖的民主体制娱乐(咖啡馆、夜总会、百货公司、妓院),那头是君主代议政体僵化的精英文化,有市立宫殿、教堂、博物馆、政府部会及缪斯殿堂,一个在借用风格中建立起来的昨日世界。“这两种方案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两个不同的卧室,如同一个柏林精神的两位情人,被巨大的铁路网线分开。”

旧西区:在统一后,这个历史地区有了新的风貌。当大家一致向东边看,全神贯注在旧的市中心与其附近的城区时,这个从前的新西区突然变老了似的。选帝侯大道上的店面营业额急遽萎缩。弗里德里希大街和亚历山大广场再次兴旺起来,有特色的餐厅纷纷在中心区、普伦茨劳山和弗里德里希树林区争奇斗艳。然而,这期间危机可算过去了:零售贸易最佳地点仍为陶恩钦大街和选帝侯大道,接着是维尔莫斯朵夫大街(Wilmersdorfer Straße)。

选帝侯大道很长,但各个段落并不无代表性。在诺伦多夫广场(Nollendorfplatz)附近,有个咖啡馆连锁店——爱因斯坦咖啡屋(Café Einstein)。这座别墅的一楼曾住着电影明星亨妮·珀腾(Henny Porten),一位 20—30 年代的女明星,这是旧西柏林众人聚会之所。“爱因斯坦”是大城市知识分子的圣地,大家必须来此现身。别墅在这期间成了总部,其他小的“爱因斯坦”分店四散在柏林城的

旅游中心。除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分店外，这个咖啡屋并不地道。

选帝侯大道在某处戛然而止。在同名的地铁站后，住着所谓的社会弱势群体。旧西区有时像是一道斜坡，从 20 年代一直跨到我们的世纪：小心滑倒。波茨坦大街(Potsdamer Straße)前的那一段最能展现这种特色。这里的交通绝不会因过久的红灯而堵塞。车子慢慢滑过女孩们面前，有的停下来交易。无法马上决定的人，便右转进波茨坦大街，那里也有女孩，或再右转到布洛夫大街(Bülowstraße)找新的女孩。夜间美女围绕此地也算是耸人听闻的事。赤裸的欲望让男人在买主的商队中流连。从北端的酒吧可以好好观察这情形，当然这里也有同情，只不过不知道该给谁而已。

10 从康德大街到萨维尼广场

舞台世界与真实

“康德大街(Kantstraße)起先还试图和选帝侯大道一较高下,有几家电影院和剧院,但还没到萨维尼广场就退出比赛,继续保持小市民的调调。”(弗朗茨·黑塞尔)至今仍是这副风貌,但“小市民”,或我们爱说的无聊的界线,往西移动,在萨维尼广场周围,要比那位著名的竞争者多数段落来得更加有趣。就在康德大街尽头,有着小尖塔的西方剧院(Theater des Westens)墮落成的轻歌剧宫殿,正如多数柏林的剧院,这栋雄伟的剧院建筑亦有着多变的过去。1896年,以歌德剧院(Goethe-Theater)之名成立,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国民大歌剧院(Große Volksoper)。二次大战后,继续以柏林市歌剧院(Städtische Oper Berlin)之名经营,现在看来又面临着未知的未来。

80 和 90 年代初的音乐热潮终于退去,但这个有点浅薄的传统还是会新的承租人手中继续下去。

1921 年,女歌手楚德·赫斯特贝格(Trude Hesterberg)在这个剧院的地下室成立了自己的讽刺小品剧团“狂野舞台”(Wilde Bühne)。贝尔托·布莱希特在那儿首度登台,这位来自奥格斯堡的瘦小子企图用他的诗与剧本征服这座大城市,像位指挥官一样亲自推动自己的艺术使命。他等了好几年,直到 1924 年才从原本想读书的慕尼黑搬到首都柏林。起先,他摆脱了各种疑虑与自我怀疑,观察着柏林地区的可能性。接着在狂野舞台演出,以他那浓厚的巴伐利亚腔调唱着自己的歌谣,拿着吉他伴奏,一副实验性格。直到 1923 年,《夜半鼓声》(*Trommeln in der Nacht*)在德国剧院演出,不久后是《城市丛林》(*Im Dickicht der Städte*),他终于能肯定在节奏与文体上正确捕捉到时代与当地的脉动。由于生涯计划不能听任偶然,不能全怪罪于这个 16 岁即已开始出头的诗人所承受的家庭压力。1920 年 9 月 15 日的日记写道:

老爸中午又再说共产主义的坏话。园子里两颗苹果被偷,我为小偷辩护:树上结的东西不属于任何人。这时老爸大叫起来,报纸上讲协约国规定营业时间到 11 点,在德国就是针对我们这种人的。他想知道我到底做了些什么,还是一事无成。我五年中还没通过医科大学预科考试。他现在想看我有份认真的工作。至于文学,他个人是嗤之以鼻。那还得要证明一下。我很快出去,还没赚上一毛钱。

1927年，在康德大街152号出版了《世界舞台》(*Die Weltbühne*)，是本政治、艺术、经济周刊。发行人是齐格弗里德·雅各布松(Siegfried Jacobsohn)，库特·图霍尔斯基协助，卡尔·奥西埃茨基(Carl v. Ossietzky)主编。不久前，奥西埃茨基才接管了编辑工作。在这有六个房间的住处每周出版一份刊物，是20年代“左派定义最广的整个德国左派发声”(图霍尔斯基)之处。原本是份名为《剧院》(*Die Schaubühne*)的杂志，在战后改变了出版方向。文章倾向政治，原有的名称一下显得狭隘，让人迷糊。齐格弗里德·雅各布松自己主导改名。他为这份战斗性刊物争取到新的作者：阿诺德·茨威格、瓦尔特·梅林、恩斯特·托勒(Ernst Toller)。库特·图霍尔斯基



库特·图霍尔斯基
(1890—1935)，年代不详



卡尔·奥西埃茨基
(1889—1938), 年代不详

1913年起便为他的老师撰文,好长一段时间每年交出超过一百篇文章,1928年的选集《五个PS》(*Mit fünf PS*)以真名发表,还有以著名的笔名“虎豹公司”(Panter, Tiger & Co.)出版的文章。1926年发行人去世时,图霍尔斯基应该接管编务,但他并不想待在柏林,也不想置身在日常编务的组织琐事中。他在巴黎继续其报道工作,将编务交给奥西埃茨基。这位拘谨深思的继任者不负众望:使这个小开本的刊物销量倍增,以在德国第一任共和中实际权力关系的犀利批评

者身份,引起政治对手的关注。他写道:“公开说出没有德意志共和,并非廉价的悲观论,而是准确认识到事实。我们听到人们说这是一个没有共和人士的共和体制。”我们在我们的第二共和了解这个原理。“不幸的是,情况正好相反。共和人士没有共和体制。”

当奥西埃茨基踢到对手的一个敏感部位时,他绊了一下。《世界舞台》揭露了帝国国防部的秘密再度扩军计划与活动,因为根据凡尔赛合约(政治右派说是强迫合约)的严格规定,德国不能发展空军,甚至连战斗机都不能有,同时也禁止拥有坦克、防坦克武器及防空武器、重型炮兵与潜艇。在《不可靠的德国航空》一文中,只是指出在柏林的飞机测试可能有军事目的,而飞机在试飞时飞出国界而已。帝国国防部立刻做出反应,要求控告该文作者(一名飞机工程师)及编者奥西埃茨基,因为其刺探军情及谋反。揭露的实际内容则未受到质疑。由于德苏的教育计划,德国早就又再拥有轰炸机、战斗机与侦察机,只不过不该有人知道而已。奥西埃茨基真是见鬼,为什么刚好捅上这个马蜂窝?奥西埃茨基是个勇敢、绝不畏惧争论的人,是位和平主义者。当他见到这个消息时,便自觉有义务揭露出来。

在所谓的《世界舞台》一案中,法官依照检察官的提案,以叛国与泄漏军机的罪名,判两名被告十八个月监禁。总参谋部比照工程师放逐巴黎的提议,被奥西埃茨基拒绝:“我待在这儿:一名关在普鲁士监狱者,一个活生生的抗议象征。”他为他的勇气在泰格勒(Tegeler)监狱付出 226 天自由的代价。奥西埃茨基这个案子的后续发展众所皆知:在帝国议会遭到纵火后,他再次被逮捕;遣往诺伊马克(Neu-mark)的索纳堡(Sonnenburg)集中营,再转至下萨克森(Niedersachs-

en)的帕彭堡(Papenburg)集中营;1935年,他拒绝接受诺贝尔和平奖;离开集中营,在他的迫害者看来,还算及时——卡尔·奥西埃茨基由于牢狱因素死于柏林尼德舍恩豪森(Niederschönhausen)一家私人诊所中。他的墓位于布赫霍尔茨大街(Buchholzer Straße)的尼德舍恩豪森墓园,编号 A1 - 35。

我们会问,这位《世界舞台》编者的象征举动有何意义。只要仍以文字在捍卫真理,那就甚有效果。但在30年代初,界线已被跨越,再也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内战的逻辑终于进入德国。卡尔·奥西埃茨基有可能误判局势的险恶。

“这位想以打字机来阻止灾难的矮胖柏林人”,艾利希·凯斯特纳如此标示他的文友图霍尔斯基,其内涵也适用于卡尔·奥西埃茨基,并十分精确地描述着针对这两位的不平等条件。凯斯特纳自己走上了另一条路,在第三帝国时,选择不危险的题目。后来,他把自己这种小心谨慎视为落入褊狭。在《法比安》(*Fabian*, 1931)一书中,有段关于30年代初柏林的句子,至少可以看出秩序与善良风俗的没落是邪恶的征兆:“罪恶住在东边,欺骗在中心,北边是悲惨,西边是淫乱,而没落则在四面八方。”

这期间,另外一种风貌的舞台现实在康德大街152号落实下来。在既不朗读、更别提写作的“巴黎酒吧”,在一些看热闹人士旁,名人在这儿聚会,未让平等的群众民主感到难以忍受:他们替代了贵族,二三十位脱口秀主持人忙着在屏幕上甜蜜大叹,让我们昏昏欲睡。几间屋子开外的“黑色咖啡”(Schwarzen Café),又是完全不同的景象,那里更加阴沉,尼克·凯夫以他那阴郁的迷信抚慰晚生的一代:

“以苦痛之名！（以苦痛和受苦之名）以苦痛之名！”——从夜的漆黑逃至酒吧的漆黑中，喝到天明，有许多好理由。夜的身影坐在那里，驱走睡意，没有乌托邦一代的夜的身影。这期间，墙壁有了颜色。时代在改变，记忆留了下来。

另一篇文章中，出现在句子中的一个字眼，被排版工人称为“他种字体铅字”。在萨维尼广场的“他种字体铅字”（Zwiebelfisch）中的b，是用另外一种字体：1969年，这是这家新开张的学生酒馆一种自觉的特立独行方式，传说学生运动及共和俱乐部的积极活跃分子在选帝侯大道上的示威后，会在“他种字体铅字”聚会，庆祝他们的英雄行径。坚持造成了传奇，这家酒馆成了国会外反对运动的聚会地点，名气远远传出柏林。乍一看，这里的群众和类似的啤酒屋的顾客没有差别，谈话也没有不同：市井老套、日常生活、柏林地方政治中的托钵修会笑话。但气氛不同。这里的老顾客是左派，有些是很久以前就在这儿出现的，是活生生的清单。在入口的桌上搁着被翻阅得凌乱的德国大型日报。在昨天最后一位客人遇见今天第一位客人时，可以在一大早拿到刚出炉的报纸，浓咖啡对最后一杯啤酒。但要小心，“他种字体铅字”6点关门，工作人员打扫清理，准备入睡，而同事在六个钟头后会开店，接着月色便笼罩安静的萨维尼广场。

动力

艺术家是感性的人，在他们的感性世界中，他们是潜在的狂喜之

人。看上去有的人安安静静坐在那儿，不动声色，似乎只沉醉在自己中，啤酒一杯杯喝着。其实错了，他们可是有灵敏的耳朵和锐利的眼睛……他们可是在这儿捕猎人类的人，收集不同的场景，啜饮见到的影像。压抑？没有压抑，就不会有任何值得一提的艺术作品出现。在这里被认为可以统一起来、颇受称赞的现实，却是人们可想见的最小、最差劲与最无聊的世界，在这里早就不再需要艺术，也不知道还有一个外界。艺术可是要认识外界的。

当艺术家和作家需要一些动力来前进与扩张时，就会说到在生产力上寻找及在特定之处克服麻痹的重力，而不是把酒精提拔为艺术家。酒馆、酒吧和咖啡馆不是加油站，而是饱含现实之处，是人类、故事与命运的转运站，不单艺术家需要这样的感知空间。

我们在萨维尼广场。1959年7月5日到6日深夜，画家与版画家格奥尔格·格罗兹(Graphiker George Grosz)死在五号屋前。几周前，他和妻子才从纽约的流亡中回到故乡，在岳母的住处找到安身之处。在拳击手酒馆“迪纳”喝得酩酊大醉后，他在深夜踉跄走过格罗曼大街(Grolmanstraße)南端，越过广场回家，却在屋前虚脱而死，回到永恒的睡眠中，一种里尔克(Rilke)式的死亡。这间“迪纳”酒馆位于“西城的塔特厅”(Tattersall des Westens)，一栋从前的马厩，就在城区地铁站旁。弗朗茨·迪纳(Franz Diener)是位拳击手，一位德国重量级的出色选手，1928年在体育宫(Sportpalast)在第十五回合败于年轻的马克斯·施梅林(Max Schmeling)。

20年代，除了赛车外，群众主要为拳赛激动疯狂。体育宫的大赛日子令人无比期待。1919年起，有了职业比赛。要快、有力、狡

猾、不择手段，善于防守，并适时出拳。拳击台上的胜负，成了外面街道上的赌注。拳击手的美德与突出的知识，也保障了城市丛林中那些黑市、放高利贷的人、投机客及大小骗子的活口。“迪纳”酒馆开张后，很快在 50 年代成了电影与戏剧名人、文化与报界重要人士的资讯场所。酒馆的墙壁贴满演员照片，而早就不再经营这个店的弗朗茨·迪纳也被挂在吧台后的画像群中。

品味人士

北边及南边各两条路通向被交通繁忙的康德大街横穿的萨维尼广场。一直通往斯坦广场(Steinplatz)的卡默大街(Carmerstraße)是西德文学的检阅大道。作家书店在十号安身。文学书店是零售贸易的绿洲；在这儿可以脱离日常沙漠跋涉后的疲惫，恢复精神。书在这里不是喊着“买我！”，而是“读我”。价格退居其次，展现出实际价值来。正如在好餐厅中，付账与收账双方都显得难受。我就常常碰到书店店员和顾客间的尽情交谈，尽管顾客正要买书，钱已搁在一堆书上，准备找零之际。书像是珍贵的礼物一样被递交出去。这是自由与必要的差异。在选择东西之际，读者便知道他置身在哪一间店里。在只碰到大众商品的地方，他会被视为文化消费中的群居动物，被敷衍了事。而在购买奢侈品处，有着各种诗集，也展示出精美少量的版本，便是相信读者有这种眼光，呼唤着文学上的品味人士。在经常造访后，便会却之不恭。作家书店是个互相展现敬意的地方。但这里

的气氛并不浪漫,值得我们读者尊敬的是那位十几年来靠着这些难卖的商品成功运营的女店员。

每个星期四,在书商地窖有场朗读会,那并不能算是地窖,而是年轻作家接触更多读者的重要舞台。谁在卡默大街一号朗读,谁便踏上晋升文学生涯的重要一步。真正的地窖位于和平湾区。1951年,青少年书商协会成员便成立了自己的书商地窖,当成朗读与讨论的空间。在我们现在回顾之际难过地称为苏尔坎普文化中的明日之星在这儿朗读着:马克斯·弗里施(Max Frisch)、君特·艾希(Günter Eich)、乌维·约翰森(Uwe Johnson);是一些在一片废墟及首度聚成团体后,努力重新认识德国文学的作家。书商地窖的出席名单在今天读来像是德语文学及其当时趋势的名人百科。直到1979年,这个地窖才搬到一楼,读者在那儿乐于坐在报废的公车坐椅中出游:只要文章真的有声有色。

理想主义者之死

沃尔特·本雅明在两栋屋子隔壁在柏林度过了几年童年,那时他家已从旧西区的大住宅搬来这里。10岁的他一早就慢吞吞走到附近的威廉皇帝小学上学,在他眼里那是一栋“像老处女般自哀自叹”的建筑:“我没有留下任何愉快的回忆。”当我们读到:“那些楼梯令我讨厌,每当我不得不在我面前那一堆腿脚前……爬上去时。”令人同情。这位小个人主义者以装昏的拒斥手段对付这种把孩子训练

成小大人的方式：他常常生病、迟到或上课心不在焉。三年后，父母把他送到图林根(Thürigen)一间乡村教育之家，负责人是知名的教育改革家古斯塔夫·维内肯(Gustav Wyneken)。父母证明了他们的决定是对的。“在这乡间学校……他第一次体会到他的理想主义受到认真对待，学生及老师是自由平等的、为相同的人文目标尽责的伙伴。”本雅明的传记作家班德·维特(Bernd Witte)这样表示。

他到第一次大战那些年，展现出青年的叛逆，没有这点，后来的发展将不可能。那是候鸟运动的时代，一个在柏林施蒂格里茨(Steglitz)成立的学生旅行团体，可谓当时青年运动的核心。离开城市，离开笔挺的西服，离开大人的掌控，离开以打骂教育为主、类似集中营的教育机构，迎向一个在自我选择的公社中的自决生活，走向乡间，在浪漫的营火中一同唱歌跳舞。在今天青年自决这种理所当然



沃尔特·本雅明(1892—1940),约1930年。

的事,在当时遭到了强烈抵抗。青年运动必须在大改革运动的脉络下来观察,那在当时几乎涵盖了所有的社会生活层面。当大家对 60 年代末的“公社”不满,严厉谴责性解放时,只展现出浅薄的民主人士想盲目拼凑出自己完好的世界而已。天体运动于 1900 年左右出现,不婚者的生活共同体在 1890 至 1933 年许多乡间社群中形成。第三帝国也终结了这点,切断了德国市民过去的自由,达十几年之久。无数的青年运动团体在帝国青年领导的指示下转成希特勒青年,后来则被视为国家青年:一种国家主导的候鸟运动。但这个运动基本上在第一次大战的战壕中死亡。西弗兰德(Westflandern)的一个小城朗格马克(Langemarck)成了这个理想一代没落的所在。据传,候鸟运动一代的年轻士兵嘴里唱着祖国之歌,被只想扩张阵地几米的将领利用鼓动,绝望地前仆后继赴死。在朗格马克的德国士兵墓园有 4.5 万座墓。

沃尔特·本雅明两年后从乡村学校回来,在萨维尼广场捱过五年中学教育,在 1912 年复活节近二十岁时,拿到中学会考证书。一家人继续往西迁移,搬到格林瓦尔德别墅郊区的戴尔布鲁克大街(Delbrückstraße):“他们一直来到格林瓦尔德别墅”——弗朗茨·黑塞尔在这儿当然也想到他的朋友沃尔特,这个“富裕的市民之子”(在《柏林年鉴》中的自我描述)完成了上层市民的西进。

在从研习哲学的弗莱堡(Freiburg im Breigau)回来后,本雅明在 1912—1913 年冬季学期在柏林成立了“讨论厅”,结合了志同道合的年轻朋友,在边界堡垒运河附近租了一栋住处,以便自由讨论困扰他们的问题。所有成员都可随时自由进入这个栖息地点。在这时期,

本雅明开始为赞同激进生活改革者的不同杂志撰稿，反抗父母与学校的压制，致力让学生们了解维内肯的学校改革理想。他满怀一种精英式的使命感，大骂枯燥、有害生命的学院主义及庸俗人士的胆怯。他的朋友弗里茨·海因勒(Fritz Heinle)也抱持着文学雄心，想成为诗人。本雅明则自视为一名批判的分析家，想彻底了解生命的现象。

为了不离开朋友，沃尔特·本雅明也自愿从军，但绝非好战人士。接着发生了那件意想不到的悲剧：1914年8月8日，弗里茨·海因勒和丽卡·塞立格森(Rika Seligson)，也是他的一名好朋友，由于对战争绝望，在他们的青年之家自杀。本雅明无比震惊。在从军体格检查时，他假装“颤抖”，格哈尔德·肖勒姆(Gerhard Scholem)在他的《沃尔特·本雅明：一段友谊》(*Walter Benjamin. Die Geschichte einer Freundschaft*, 1975)一书中这样描写。他在医生前小心演练着，装成无药可救的样子，躲过了战争。

两位朋友之死标志着他背离青年运动的团体和期刊。1915年初，他和维内肯一刀两断。在一封私人信中，本雅明仔细读过他老师“青年与战争”的呼吁后回信，指控他背叛曾经分享的信念，坚决拒斥他那一代带来死亡的理想主义。三年后，他在一篇文章中写到有关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jewski)的《白痴》：“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书中的最大控诉：青年运动的失败。……由于没有自然与童年，人类只能走向灾难性的自我毁灭。”

思想与力量

70年代,卡默大街4号的民宅不得不屈服在建筑艺术下。要不是1962年沃尔特·霍勒尔(Walter Höllerer)在此成立了柏林文学讲座(Literarische Colloquium Berlin),这里根本不值一提。四年前,他被柏林科技大学聘任,并不只提到作家的名字与作品,而是把有血有肉的作家介绍给学生。他们朗读自己的作品,回答大讲堂中学生的问題。受邀的也有君特·艾希,他在1947年以“清单”(Inventur)一诗写下所谓废墟诗学的纲领性诗作,一名从战争恐惧与战俘营的侮辱中归乡的人,他质疑在上位的人,知道唯一可靠的便是自己微薄的东西:一顶便帽、一件大衣、刮胡刀、麻袋、一块毛毯,不用直接睡在光秃秃的、冰冷的地上——还有:

铅笔芯

我最喜欢的东西:

她在白天写下,

我在夜里想到的诗句。

这是我的笔记本,

这是我的帐篷帆布,

这是我的手帕,

这是我的钞票。

在读者还没机会沉湎在诗篇救赎功能的浪漫想象前，这首诗便逼着他回到最为迫切的事物世界。这份清单一目了然，根本不再需要任何解释。这首诗表示，这就是一切。谁再添油加醋，便是说谎。

君特·艾希一生都拒绝评论自己的作品，或甚至他自己。他不熟悉文学外的活动。他著名的广播剧《梦》(*Träume*, 1950)却呼吁听众：“不，别在维持世界秩序的人忙着的时候睡觉！不要相信假装要帮你们的掌权者！要警觉，别让你们的心空着，不然你们的心将会虚空！做些没用的事，唱些人家没期望你们唱的歌！要令人难受，要做沙子，而不是运转世界的油！”

他自视为“负面的作家”。在《土拨鼠》(*Maulwürfen*)这本刊行在1968至1972年的尖锐的散文集子中，他几乎热情洋溢地写道：“无政府万岁！随着这声欢呼，我来到下一回合。对我而言，木屑比木板更重要。”诗人担心与注意的是个体，并非机构，而无政府主义不同于后来的，不是以纲领的形式出现，而是以自决意志的表达方式出现。艾希的激情是一种敌视的激情，随着社会的逐渐政治化变得典型，最后成了时尚。在这变得吵闹和歇斯底里时，艾希已经隐退，只是一些颁奖场合短暂地出现在众人面前。

讲堂上的另一位客人是汉斯·马格奴斯·恩岑斯贝格(Hans Magnus Enzensberger)。他的第一本诗集《狼的抵抗》(*Verteidigung der Wölfe*, 1957)引起轰动。当三年后第二本诗集《国语》(*Landessprache*)出版时，阿尔弗雷德·安德施写道：“汉斯·马格奴斯·恩岑斯贝格出现在德国思想舞台上，就像回忆着海因里希·海涅的出现一样。”在《狼的抵抗》后，安德施松了口气：“终于，终于我们有位愤怒

的年轻人了。”在诗集的第一首诗《狼群抵抗羔羊》中，听得到布莱希特的声音，但最明显之处在于一种近乎恶心的厌烦，对所谓无能者的啜泣感到作呕。“秃鹰是否该吃掉勿忘我？/你们要求胡狼什么，要它蜕掉狼的皮？”时间的戒律表明，因为世界会改变，而被带到屠宰场的羔羊是历史的失败者。有狼就有羔羊，有改变就有抵抗：这是这位年轻人给他读者的简单信息。他在柏林找到仔细的听众。60年代中，恩岑斯贝格搬到第二次青年运动的未来首都，创办了《时刻表》(*Kursbuch*)，新左派的知识分子机关刊物，标志着这位作者由诗学到政治评论者的路。

马克斯·弗里施、海因里希·伯尔(Heinrich Böll)、君特·格拉斯、乌维·约翰森、英格伯格·巴赫曼(Ingeborg Bachmann)、马丁·瓦尔泽(Martin Walser)——只要霍勒尔一呼，他们就来。他是一位文学的中间人，不断奔波，富于经验，对局势敏感，集诗人与文学研究者的身份于一身，编过文学杂志《重点》(*Akzente*)，1962年主办“四七社”(Gruppe 47，编注：1947年一群德国青年在魔林湖一栋小屋成立，他们承认德国战败，准备革新)在万湖的聚会。成立柏林文学讲座后，他同时创办一种今天在各大城市都有的机构：文学之屋。在文学之城柏林，同时有三大机构在赞助作家、介绍文学与朗读文化，还包括一些小的协会。柏林文学讲座今天位于万湖一栋大别墅中，主要在赞助作者及翻译者。文学作坊则不得不离开在潘可夫(Pankow)的马雅可夫斯基环城路(Majakowskiring)上的房子，暂时迁移到文化啤酒厂(克纳克大街[Knaackstrasse]，普伦茨劳山)。不像作坊自己的名字，这个作坊实际上并不负责与赞助作品，而是在读书会外，组

织大型文学活动,提供网际网路国际诗歌,把读者的注意力转移到和古典诗学相关的艺术形式上,如电影和音乐上。夏洛腾堡区法萨安大街(Fasanenstraße)上的文学之家有咖啡屋和书店,不只是对文学感兴趣的城西漫游者的起跑点,并以定期更替的展览维系着柏林文学史的记忆。

11 选帝侯大道

过渡

在选帝侯大道上可以去哪儿？这条大道一直让我无计可施。我接连三天来回找着，在维腾贝格广场和阿登纳广场(Adenauerplatz)间徘徊，专注于橱窗里的商品，踏入精品店，研究女顾客如何挑选衣服——仿佛不曾看过千百次似的。在人行道上的玻璃橱窗间，我见到双腿间搁着一块纸板的乞丐，读着那博人同情的个人不幸遭遇。在“大伊甸园”(Big Eden)迪斯科舞厅前，我陷入人群里；在纷乱的照相机闪光灯中，一辆带天窗的乳白色豪华大轿车停了下来，一位脸上有妆的老先生带着胜利的微笑下了车：罗尔夫·伊登(Rolf Eden)，德国最老的职业花花公子，至死都不愿意服老。在新克朗兹勒角(Neuen Kranzlereck)后面的鸟园，那些五大洲来的艳丽的鸭子、雉鸡

与鸚鵡让我大开眼界,鲜活地证实了我们这座城市的国际化。男人坐在路边咖啡馆,欣赏着无忧无虑的美女逛街购物。欧元现在是否昂贵,这里无人在乎,那是无关痛痒的争论。几乎每个人都买了东西,最棒的是各家公司绞尽脑汁设计的购物袋,那些造型美丽、带有公司品牌的袋子,让女性成为众人焦点。名牌的部分光华在女顾客身上增添了雀屏中选的光环。

一位波西米亚人的生活

我看到一位头发雪白的老妇人。她穿着一件美丽无比的夏装,肩上围着一条柔软的丝巾,纤细的脚穿着一双软皮小鞋,看来十分舒适。围巾、衣服与鞋子的颜色搭配精致:轻柔的淡绿色,层次丰富。她快步越过斑马线,往对面的车站去。我匆匆看了一眼这张曾经严厉无比,而今在岁月下变得温和的脸,想着:艾尔瑟·拉斯克-舒勒(Else Lasker Schöler)——她还活着。这位柔弱的女子瞧着时刻表好久,接着继续走到下一站,再瞧着时刻表,摇摇头,走到车道边,左右打量,又再摇头。我不敢和她说话,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

“艾尔瑟·拉斯克-舒勒是位犹太女诗人,成就非凡。”柏林传奇的波西米亚人士,不幸的彼得·希勒(Peter Hille)在我耳边悄悄说道,声音沙哑,但显得内行。“她的诗思有如切开她额头、令人疼痛的黑钻石。疼痛无比。以色列的黑天鹅,一名萨福,世界在她眼中已经破碎。散发着童稚的神色,却是异常阴郁。在她如夜色的头发中,漂



艾尔瑟·拉斯克-舒勒
(1869—1945), 摄于 1906
年左右

泊着冬雪。”漂泊着冬雪,我重复着。是的,那可以清楚见到。回到家后,我读着哥特弗里德·本恩(Gottfried Benn)笔下的她:

艾尔瑟·拉斯克-舒勒当时(1912年)住在哈伦湖(Halensee)一间有家具的房子里,那时起,直到她去世为止,都未曾拥有自己的住处,只是一间狭窄的房间,堆满了玩具、娃娃、动物、各式各样的杂物。她矮小,当时瘦得像小男孩,一头剪短的乌黑头发,在当时还很少见,一双黑而灵动的眼睛露出难以言喻的闪躲眼神。当时及后来和她一起过马路时,仿佛整个世界都停下来盯着她看:宽大异常的裙子或裤子,上衣令人难以想象,脖子及手臂上挂着醒目的假首饰、链子、耳环,手指上戴着廉价的戒

指,又由于她不停拨开额头上的发束,我们得说,那些女仆戴的戒指便不断地在众人眼前晃动。她用餐不定时,吃得很少,往往一周只靠坚果和水果过活。她常常睡在长凳上,任何时候都穷兮兮的。这是提比斯(Theben)的王子约舒夫^①,巴格达的黑天鹅。

这是德国绝无仅有的女诗人。……她的题材常是犹太的,她的幻想是东方的,但她的语言却是德文,一种生动、华丽、轻柔的德语,一种成熟甜美的语言,每个转折都冒出创造的果核。她自己一直坚定不移,狂热地献身,敌视所有的饱和、安稳、舒适,试着在这种语言中表达她的激情,却不揭露和赠予她本性中的神秘气质。

这名穿着绿衣的女子正好越过那条许久以前的、仿佛永恒一般的西城咖啡屋所在的街。女诗人在这儿出入,常常在她第二任丈夫赫尔瓦特·瓦登(Herwarth Walden)的陪同下。她把这个名字给了作曲家暨钢琴家的格奥尔格·列文(Georg Lewin)。这间咖啡屋是选帝侯大道上的第一家。1893年开张时,通往格林瓦尔德狩猎宫(Jagdschloß)的路才刚扩建,被有些人贬为木排大道(Knüppeldamm):54米宽,两条车道和中间一条骑马绅士的通道。

^① Jussuf,舒勒作品的人物之一。提比斯位于幻想国度,让人联想到圣经中的埃及,而约舒夫是当时法老王的解梦者及后来的粮仓总管,一位在异国的外人,遭到出卖,却富有天分。舒勒也将这位作品人物纳入到现实世界来,常在朗读会时,打扮成这位王子,以他的名字写信。

这条长 1500 米,有着别墅和华丽公寓的大道,是在世纪交替之际才开始开发的。

最先出现在西城咖啡屋的是“现代派”(die Modernen),当时通称为“最新德国人”(Jüngstdeutsche)。所有的团体名称都有争议,在文学史上坚持下来的则是“自然主义者”那个不幸的代号。在他们的《批判性战斗》(*Kritischen Waffengängen*, 1882—1884)中,可以确定的是,海因里希·哈特(Heinrich Hart)与朱利乌斯·哈特(Julius Hart)一把火烧了废话连篇的写实主义的干草堆。

“在上一个世纪博得影响与认可的诗人与作家,乐于静静保有尊严与自己的收入;他们和读者间有着惬意的关系,没人再多要求文学什么,快乐自足愈来愈令创作者与享受者陷入一种舒适的暮色气氛中,预见了快要出现的健康的文学之眠,”在这对兄弟的回顾中,可以读出一种前革命的气氛。“直到 1880 年,没有任何青年,任何文学青年——现在他们来了,自然还有运动、发酵、风暴。”

哈特兄弟正如他们的战友,前来柏林求学,从平静的敏斯特(Münster)来到机器时代的熔炉中,来到朱利乌斯在他的诗《前往柏林》(*Auf der Fahrt nach Berlin*)中所深刻描写到的“地狱国度”。“但那不是在他们学习的大学讲堂中——因为我们很少造访那里。我们的讲堂是街道、酒馆、百货公司,偶尔还包括帝国议会。”海因里希在回忆录中写道。

大城市柏林成了年轻诗人的主要题材:杂沓而来的图像,纷乱的感官印象,社会苦难和奢华浪费并陈,造成了学派。1886 年,新运动的赞同者与追随者成立文学协会“冲破!”(Durch!)成员包括哈

特兄弟、布鲁诺·威勒(Bruno Wille)、苏格兰社会主义者约翰·亨利·马凯(John Henry Mackay)、约翰纳斯·施拉夫(Johannes Schlaf)、亚诺·霍尔茨(Arno Holz)与格尔哈特·浩普曼(Gerhart Hauptmann)。我们从协会记录中得知,他们十分努力并自我批评,想在概念上澄清他们的艺术意图:“自然主义是(和理想主义)相对的品味走向,原是企图描写自然的原貌,却戴上有色眼镜,任意选择扭曲的原貌,也就是在美学与道德上遭到冒犯之物。”布鲁诺·威勒在评论家及协会创办人里奥·贝格(Leo Berg)的讲演后这样记录道,我们相当讶异,在场人士应该一致视写实主义为理想,因为写实主义避开夸张,追求客观。1887年4月,他们自视为现代写实主义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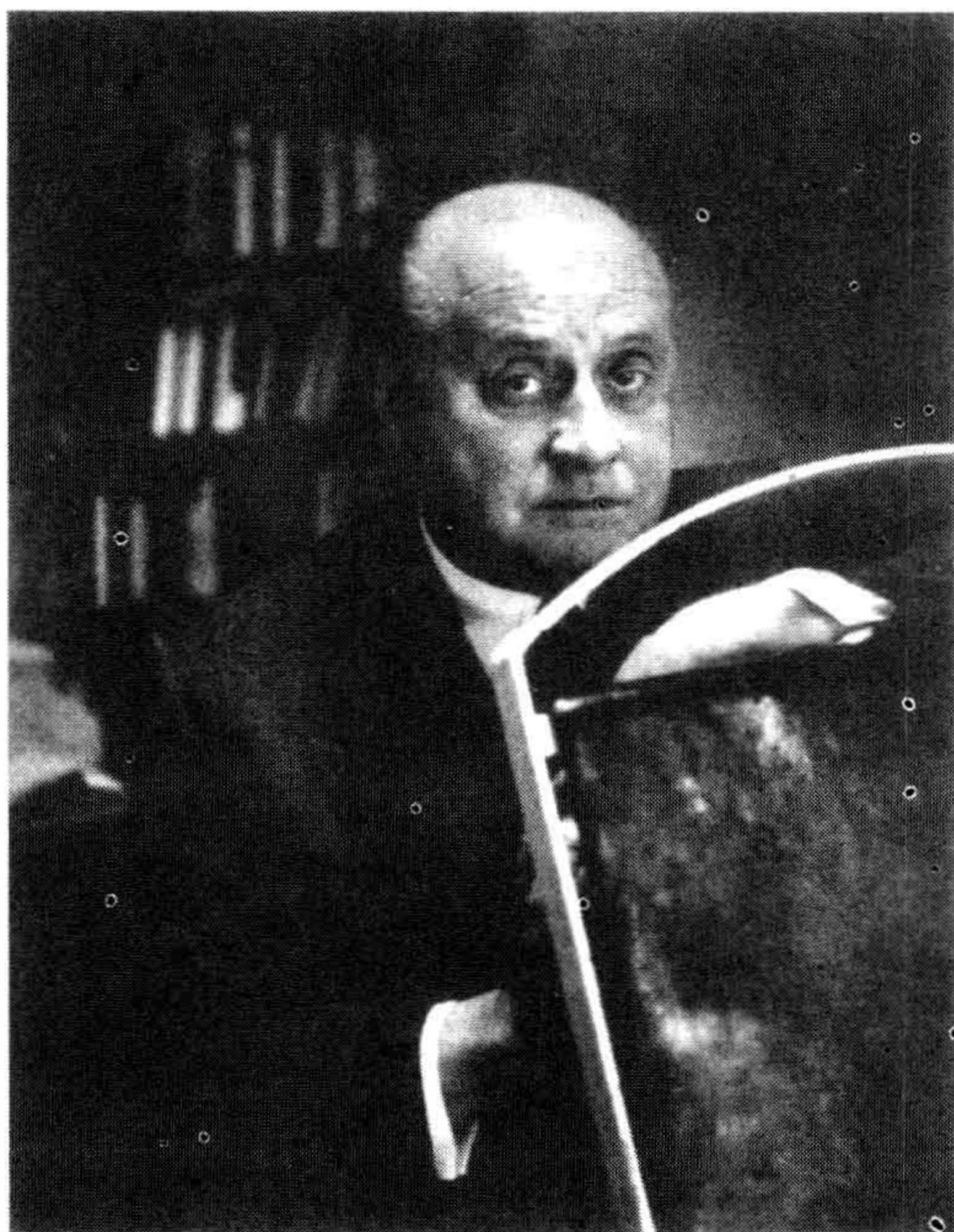
当他们选择西城咖啡馆为聚会地点时,其中一些人已不住在柏林。他们往东南边的米格尔湖(Müggelsee)去,搬到宁静的城郊弗里德里希哈根(Friedrichshagen)。他们在那儿寻找其他的东西,一种所谓的原始自然,和城市的现实尖锐对立,一直是个默默守候着的背景。

空幻

“在约阿辛塔勒大街(Joachimsthalerstraße)和选帝侯大道交会处,他们设置了地狱。……纯朴的市民匆匆经过这个地狱渊藪,胆怯害怕。……他们毛骨悚然,不寒而栗。长发男子留着蛇般的鬃发,领

带松开乱飞,穿着分离派的袜子和不含酒精的内裤,在这儿放浪形骸。刻意地挤在沙发一角,自我吹嘘,相互吹捧,……靠着无耻堕落的咖啡,把德国艺术带往深渊。”

赫尔瓦特·瓦登在他的“特别报道”《柏林的泥沼》(*Der Sumpf von Berlin*)中报道着各种关于西城咖啡屋的陈腔滥调,也就是很快被喜爱耸动却自命清高、担心自己城市声誉的媒体称为“空幻”的咖啡屋。“白日消逝,直到每日现代之夜的放荡狂欢开始:咖啡屋文人殚精竭虑的瓦解工作。跟着分离派的爬虫从威莫朵夫(Wilmersdorf)和哈伦湖爬来,自觉病态、怪异的人物,烙印着‘空幻’的家伙。”但瓦登引述《火炬》(*Fackel*)编者卡尔·克劳斯(Karl Klaus)的话,空幻并不是“自觉出色,而是恰如本分”。如果空幻只是自我认



哥特弗里德·本恩
(1886—1956), 1950
年代

识的另一种形式,那他们是什么呢?自然主义者退位,他们是新的前卫。现在表现主义者发话,先是在咖啡馆,后来在逐渐喧哗的西区舞台与街上。表现主义的十年开始了。瓦登的讽刺文章刊于他在前一年(1910年)开始出版的《风暴》(*Sturm*)中。杂志的名称来自那位重要的命名者:艾尔瑟·拉斯克-舒勒。“咖啡馆成了我们夜里的故乡,我们的绿洲,我们的流浪篷车,我们的帐篷。”她这样写着“空幻”。1912年,她离开瓦登,不久后,和哥特弗里德·本恩开始一段短暂却热烈的爱情。那位来自西普里格尼兹(*Westpriegnitz*)的牧师之子,才开始以他验尸房的诗篇赢得瞩目。她也给这位写诗的医生取了名字:吉泽黑尔(*Giselheer*),把这位年轻的病理学家描写成研究冰冷尸体、做着梦的科学家:“他下到医院的拱顶地窖,切开死者,永不餍足,积累着秘密:他说:‘死了就是死了’。尽管没有信仰,他还是虔诚热爱着祈祷的殿堂,梦想的祭坛,来自远方的眼睛。他是一位天主教异端,一位有着神祇头颅的基督,有着鹰钩鼻子和猎豹的心。”

本恩当时在夏洛腾堡西端(*Charlottenburge Westend*)一间医院工作,下班后来咖啡馆喝上一杯。在他一首较不为人知的诗“西城咖啡馆”中,读者见证了一个相当笨拙的男子想亲近女人,可能是本恩在邻桌偷听来的:“我想冲入你的怀里。/我想瘫在你身上。”不过坐在“空幻”中的不是前卫分子,不是争论只靠艺术来救赎世界的人士吗?本恩医生微笑着,喝完最后一口,该回去睡一会儿觉了,接着要上病理学的早班。

怪人

如果玻璃建筑在四处取代了砖石建筑的话,地球表面将会有巨大的改变。那就好像地球罩上了宝石与搪瓷珠宝,无法想像那种壮丽。

而我们将会在地球上到处拥有比天方夜谭中的花园更宝贵的东西。我们将在地球上有一座天堂,不用再眼巴巴地看着天堂。

保罗·舍尔巴特(Paul Scheerbart)的《玻璃建筑》(*Glasarchitektur*, 1914)憧憬早已实现,但他彻底错了。他那无谓的愿望的最近一个例子,便是“新克朗兹勒角”咖啡馆,一间冰冷明亮的巨大三角形建筑,正对着选帝侯大道,比在战后接替“空幻”咖啡屋的克朗兹勒咖啡屋(Café Kranzler)还要大得多。之前有着大窗户、遮篷和雕花花园椅的克朗兹勒咖啡屋,吻合了50年代的生活感受:万岁,我们还活着。这个平面建筑引人注目的是让人想起儿童旋转木马的圆形内室,展现了那种天真。在这个街角建筑改建之际,只有这里被保留下来:在我看来,像是个引言,并因此良心不安。

舍尔巴特是位空想家,带着发展恒动机器的计划进出“空幻”咖啡馆,但和自然主义者或表现主义者都没关系,只照着自己的目标在走。他认识他们,他们认识他,大家都穷,算是波西米亚式的艺术家,因而有了共同之处。舍尔巴特太怪异,没人会认真对待他。1915

年,由于忧心战争中人类惨遭屠杀,以让人印象深刻的方式自杀:绝食。他的生存意志消耗殆尽了。

另一位类似的怪人是彼得·希勒,罗维斯·柯林斯(Lovis Corinth)画过一张这位诗人的美丽肖像。希勒不只在咖啡馆写作,也在街铁上、公园长凳上及别人的桌子上,只要他的熟人及朋友邀请这位无家可归的人回家的话。他常常在外头过夜,在动物园的长凳上。这位“文学的吉普赛人”曾经赢得艾尔瑟·拉斯克-舒勒的爱与赞叹。她像圣人一样崇拜他,称他为圣彼得·希勒,把《坠落的天使》(*Der gefallene Engel*)一诗献给他:“如果我们曾经来到沉默的国度,/最美的天使会为我赐福/因为你的爱。”

这两位在世纪初应该是全城最怪异的情侣了:两个受到诅咒的人,两个童话孩子,两个来自阵亡者世界的人,奇怪这个世界并不只由美丽、善良与爱构成。接着她不得不表示,要脱离他的影子,走自己的路。在她的流浪汉死后几个月写成的《世界尽头》(*Weltende*)一诗,可能仍是给他的:

世界尽头

那是这个世界中的一个哭泣,

仿佛亲爱的上帝死了一般,

落下的沉重影子,

重如墓塚。

来,我们想躲得更好些……

生命仿佛躺在棺木之中

在所有人的心中

你, 我们想吻得更深……

渴望着那个世界,

那个我们不得不死去的世界。

对一位像彼得·希勒这样生命已是一件艺术作品的人, 没有更贴切的评价了。对此, 没有肯定的材料, 没有标准, 最重要的是, 没有理解。对这些人而言, 还是可以找出一个无可奈何的字眼: 我行我素者。

事物——的起义?

达达的一个优点相当明显: 每个人都可在其中理解到一些不同的东西, 或会理解到他能理解的东西。有些人理解达达主义, 揭露自己, 正如理查·胡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这位快乐信念的传递者。当他 1917 年行李中装着达达, 一路从苏黎世来到柏林时, 认为自己在传达一种新的国际“艺术发展方向”。达达在瑞士引起一些骚动, 但在跨越到被战争所毁的德国时, 达达变得激进, 富有侵略性: “到政治只差一步。”1918 年 2 月, 胡森贝克在新分离派大厅(选帝侯大道 238a)对听他有关“达达主义”演讲的听众呼吁, 但最后躲在事件背后, 或在主导战争的国家首都中装傻, 保持中立。

“把达达主义视为一种艺术的或哲学上易被定义的世界观，便完全错了，”因为身高而被称为“小达达”(Pipidada)的瓦尔特·梅林后来在《失落的图书馆》(*Die verlorene Bibliothek*, 1952)中澄清，“而真正的达达分子和其他人的不同之处，正好在于他根本没有任何世界观。”对他而言，所有存在的事物都是“达达”。关于达达是否可被纳入艺术的问题，梅林没有讨论，因为更重要的在于：艺术是否可被纳入达达中？在艺术与现实的达达之争中，这个问题总是名列前茅，而其他的则忙于制造感觉与意义。取消这种角色分配及突出达达的万能，成了所谓达达主义的启蒙功绩。我们从讽刺所有主义的角度上来理解，会更加容易。

“如果不是达达的话，吃下达达，便会死。”拉乌·豪斯曼(Raoul Hausmann)在他的回顾《达达生气、激动，并死在柏林》(*dada empört sich, regt sich und stirbt in berlin*, 1969)中这样写道。达达无法消化，至今未被纳入艺术史的框架中。众所周知，达达(这没有教养、无人管教的现代之子)没有留下重要作品。达达的一个意图便在质疑这点：格奥尔格·格罗兹双脚叉开站在罗维斯·柯林斯教授的画前，装模作样地撒尿。马里克出版社的创始人兼常务负责人魏兰德·赫兹费尔德(Wieland Herzfelde)出版了该运动最重要的刊物《达达、对手、失败，每个人是自己的足球》(*Der Dada, Der Gegner, Die Pleite, Jedermann sein eigener Fussball*)，武断地呈现出面对艺术时的挑战：“太阳、月亮和星辰一直存在——尽管我们不再膜拜它们。有永恒的艺术存在，不会因为艺术膜拜遭到推翻而死去。”达达主义者绝无意敲响艺术的丧钟。他们看不惯和市民艺术享乐结合的虚伪庄重

气氛,而其他地方正在清扫战场——“就像以往一样,在严肃的时刻,当高等祭司在祖国的祭坛上磨砺他们的隐喻。”

柏林达达真正的开始是在1918年4月12日晚上,还是在新分离派大厅,但结果却显得混乱。起先观众的情绪被宣读《达达宣言》(出自胡森贝克之手)带动着,尖锐地攻击着过去的前卫分子:“在沉思默想的借口下,表现主义者在文学与绘画上结合成一个世代,今天已在渴望获得文学史与艺术史上的评价,争取受人敬重的市民认可。”这种侮辱可想而知。显然,在这些自我标榜的革命分子的美德中,没有虔诚的体贴。“达达主义首度不在美学上面对生活,因而毁掉自己所有的道德、文化与精神世界的口号,只不过是弱者的大衣。”在这个肃清小组展开他们在这晚的工作前,宣言最后的句子表示,摧毁口号的意愿没有任何界线,更别提他们自己的公告:“给在文字上和图像上的达达主义,给这个世界的达达现象。反对这个宣言,便意味着是达达分子!”

接着艾尔瑟·哈德维格(Else Hadwiger)朗读了马里内提(Marinetti)的战争诗,理查·胡森贝克在一旁协助,拿着一根木枪对着观众射击,以小孩的小号吹出最后的风暴。“一名穿着军灰色制服的士兵羊癫疯般地在地上抽搐,观众喧哗。”拉乌·豪斯曼在《开始时是达达》(*Am Anfang war Dada*)回忆道(1972年死后出版)。格奥尔格·格罗兹朗读自己的诗篇:“小心!格罗兹来了,/欧洲最悲伤的人,/‘一种悲伤的现象’。”他的“给世界的歌”发出这样的声音:“成千的人死去,没见过海湾洋流。”当豪斯曼演说关于《艺术中的新材质》(*Das neue Material in der Kunst*)时,这位显然骄傲的起义发起人

“引起了这样一种运动,害怕展厅主管在我演讲之际关掉电灯,让我在黑暗中闭嘴。一个精彩的夜晚,一种达达式的成功。”

1917年,拉乌·豪斯曼和约翰内斯·巴德想一起成立一间基督公司,任何人只要付一笔钱,便可要求当基督。据赫兹费尔德表示,巴德这位失业建筑师拥有一张所谓的“打猎执照,可以不用为他的行为负法律义务”,在还没人看出这个运动会出现之前,他就已经是位达达分子。他在1906年自认是“媒介”,“基督教的救赎者基督透过这个媒介和现代人类辩论”,而他办了许多收费的讨论会,参加者可以问他三个问题,他会竭尽所知回答。“巴德先生……想要自由提供他所知最高贵的珠宝给他的客人:完全没有遮蔽、赤裸地受到接待,他也想免除亲自回访的义务。”在这短暂的柏林达达纪元,最惊悚的行动都来自巴德。在1918年11月的一个周日,他参加了柏林大教堂的早晨弥撒。当宫廷讲道者德里安德(Dryander)开始讲道时,巴德打断他,并喊道:“等一下!我问您,对您来说,耶稣基督是什么?对您来说,他是香肠……!”人们不让他说下去。巴德被匆匆叫来的警察逮捕,被控骚扰上帝。这个插曲就足以让他成为整个达达起义最轻松愉快的人物。他的同路人自然称他为最高达达。他接受了这个称谓,但并不满意。从他的公开身份来看,他一会是“人类主席”,一会是“地球总统”,或只是“约翰内斯·巴德大师”。在国民代表大会上,他散发传单:达达分子反对魏玛!“我高于国民代表大会,不是出于政党法,而是精神法。只要有位教宗,就有位基督。谁不想把我当成‘基督’来追随,当成‘最高达达’的朋友,我也欢迎。如果这样也不喜欢,那就像跟着一个涵盖整个宇宙的人类好了。”

拉乌·豪斯曼是“达达家”(Dadasoph)。他致力于在精神上清算德国文化市民的重要工作：“德国市侩生气了”(Der deutsche Spießbürger ärgert sich) 1919 年刊在柏林马里克出版社《达达》(Der Dada) 一书第二版中：“谁是对达达生气的德国市侩？那是德国诗人，德国人文分子，因为大家让他们完美的奶油三明治灵魂在阳光下焖着，他们勃然大怒，因为人们正中他们的脑髓——现在他们一无所有！……由于他们不能把我们搁在墙上，让我们感到隆重。”

战胜德国市侩似乎是个跨越世代但不会终结的工作。或许那个时代认为德国市侩不会被战胜，他们体现的是德国历史中的持续性：以幽灵的样貌，以一种人们只在道听途说中认识的幽灵。自从他们也把容忍给予自己，没人再能动他们了。1920 年时，这已经表现出来：在道德与善良风俗的名义(市侩市民的范畴)下，达达主义的捣蛋鬼被拉上法庭。在吕措乌弗(Lützowufer)的“大型国际达达展”上，有两件作品让帝国国防部特别不悦：《上帝和我们同在》，格奥尔格·格罗兹的讽刺漫画集，以及一件挂在天花板下晃着的军官塑像，戴着一副猪面具及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要完全理解这件艺术作品，必须每天和塞得满满的猴子练习，在天普霍夫操场全副武装地行军”，鲁道夫·施里希特(Rudolf Schlichter)的作品。

库特·图霍尔斯基为我们现场报道：“在吕措乌弗十三号，现在有个达达展览，不然我们不用担心。”那种“惊吓市民并在其他人处朝圣物吐口水”的文学举动，他只有一个字眼：痉挛。“从 9 点到 7 点，人们不停地处于取笑与讽刺的情绪中。3 马克 30 芬尼的入场券换一个达达主义。”图霍尔斯基注意到展场安静，“基本上再也没人感到愤

怒。达达——还能说什么。”相反地，格罗兹赞美道：“但有个把整个店弄得天翻地覆的人在场。……如果图画能够杀人的话，普鲁士军队铁定死了。”他的“少校及下士的鬼脸，宛如地狱般的真实魔鬼”。

在法庭上，他们试图把被告的攻击化小成为愚蠢的年轻人在争吵，这个辩护策略还真有效。格罗兹和他的出版者魏兰德·赫兹费尔德被判罚金，而那个“无伤大雅的玩笑”的士兵娃娃无罪释放。图霍尔斯基有些失望：“你们的辩护就这个样子？你们不是真这样想吧？”在这个悲伤的展览后，达达柏林告一段落。格奥尔格·格罗兹后来也脱离了他这种达达的放荡行径。

《事物的起义》(*Aufstand der Dinge*, 1973)这种说法来自艾尔哈特·凯斯特纳的书中，一本反对现代派失误的控诉文献，也是一本关于马克斯·恩施特(Max Ernst)的书，在这位超现实主义者和引起“达达骚动”的达达马克斯之间寻找相连之处：“我认为，那个字眼是：事物的起义。达达是一种让事物起义的尝试。”对凯斯特纳而言，新时代是“彻底清算世界”的时代。专断的理性(科学或市场)赋予每个物件一个固定的位置，借以计算它们。相反，在艺术的自由天地里，事物又被密封起来，因而在意想不到的脉络中，产生新的谜。

对柏林达达俱乐部的成员来说，还有另外一种动力：他们敲开空的坚果，让肥皂泡泡爆破。像教会、国家与军队这种机构，在1914至1918年的全欧灾难中，彻底损耗。他们的权威受到质疑，而且理由充分。关于新的民主体制，所知只有，靠着警察与军队，社会民主体制努力在民主中统治：以市民利益保护者的身份，反抗起义的工人与士兵。社会的旧支柱也是新的支柱。不过战争的残暴释放了一种无

政府的潜力,而军队与政治中被撤换掉的失败分子无法压制这种潜力,更别提拥有武力的神职人员。

嘲讽赢得了担得起嘲讽的人。其他人抓起武器,开始暗杀,炸毁屋舍。柏林达达同时彻底清理了艺术的赌桌。表达了价值的彻底堕落?但这是由谁展开的?

12 布莱特沙伊德广场

知识分子的游乐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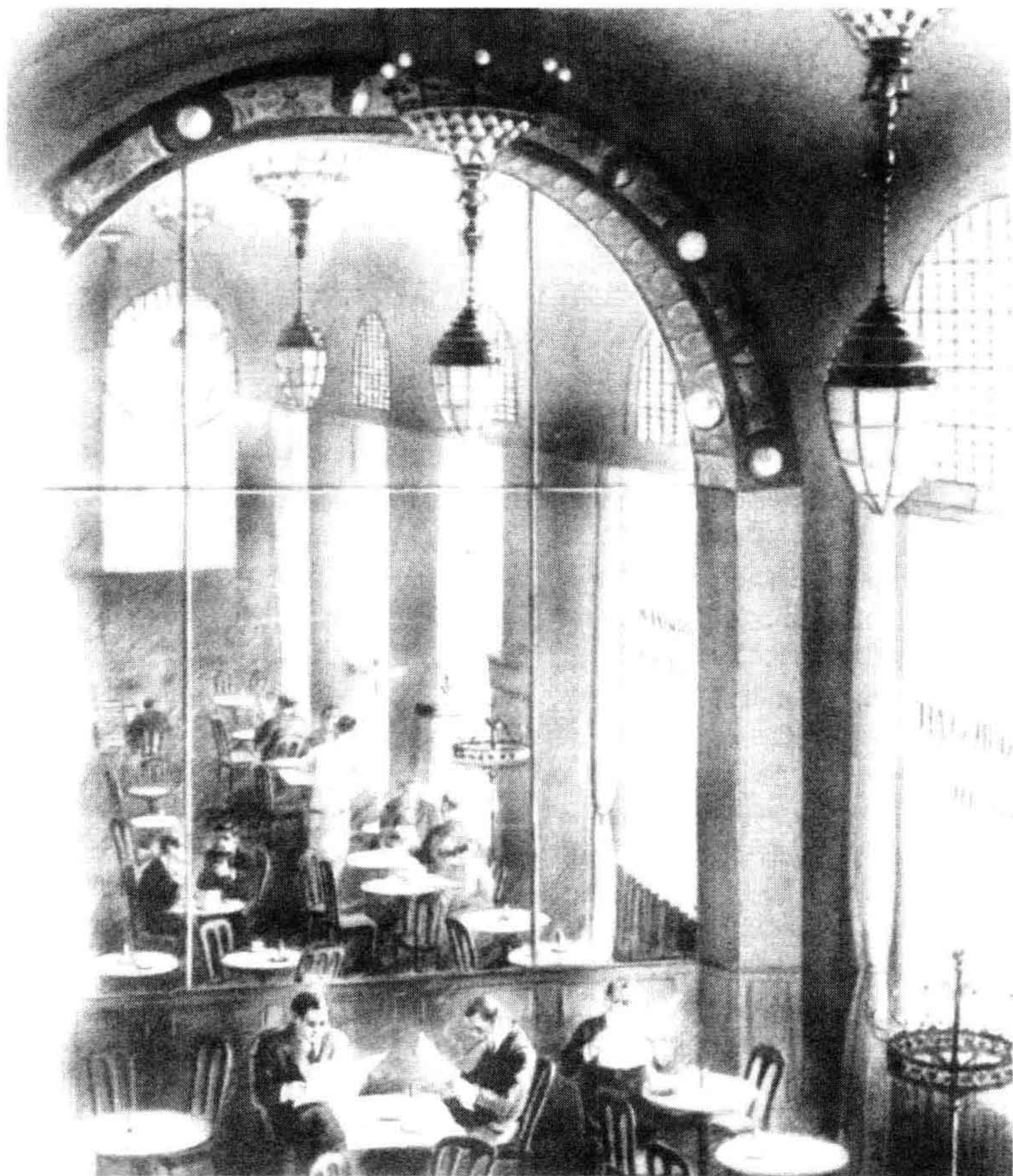
为什么再也没有文学咖啡馆了呢？那些波西米亚人都在哪里？知识分子吃喝的地方有何种功能，为什么今天的作家没有这些地方也可以活呢？——因为他们再也不拿笔写作，而是在家里的电脑前……因为在咖啡馆里再也见不到什么……因为他们害怕聚成团体……因为他们在中央供暖的住宅里不再受冻……因为他们早就全突变成为自己个人公司的负责人……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困顿，也就不需要任何帮助……因为他们对自己和邻人一样不感兴趣……因为大家所说所想的都一样，因此也就不值得一听？

毫无疑问，文学在今天只扮演着一个次要的角色。问题是什么，由谁来回答，是由学者、官员与记者决定的。作家中，缺了狼群之首

来带领。大家对文艺爱好者中的示警者已感到厌倦。乌托邦分子已经绝迹，现实主义者的一点理性主导着一切。围在这本或那本每月之书周围的各种热闹，并不能掩饰曾具有主导地位的严肃文学已被视为多余。过去的勇士们，像君特·格拉斯或马丁·瓦尔泽，在一些小战役中还一直勇猛无比，但他们的努力再也唤不起悸动。不管是瓦尔泽把一位著名评论家之死当成报复手段（《评论家之死》〔*Tod eines Kritikers*, 2002〕），还是君特·格拉斯记述威廉·古斯特洛夫号的沉没所引发的禁忌（《蟹行》〔*Im Krebsgang*, 2002〕）——这想撼动谁的自我认识，谁的存在？

年轻的作家呢？他们的主要媒介是时尚、生活方式、音乐、电影。在他们的书里，迷失方向的人说着他们的迷失。在过多的商品中麻木，他们说出心爱的字眼：随便怎样。这个随便怎样的世代从自己的困顿中生有一种美德：他们至少承认这点。当船长们还在规定航路时，这些文学水手早已不在乎了。他们对我们这个时代的迫切问题能贡献什么？写首关于失业恐惧的诗，一部有关全球化对最穷的穷人造成的结果的小说？那还不如读读在女性杂志 *Brigitte* 上讨论到的当季放肆(!)的两性小说。

当知识分子还成群结队时，他们在一个可在市区地图上清楚地画出圆圈的地方聚集。圆心是威廉皇帝纪念教堂，旁边就是罗曼咖啡馆，柏林 20 年代的文学消息交易所。西城咖啡屋已经关门。艺术家队伍继续迁移至几百米之外。在一个不断更新的时代，可以感觉到过去的老旧味道让人厌烦。埃里希·米萨姆(Erich Mühsam)虽然表示，认识了老西城咖啡馆的人，大概无法视罗曼咖啡馆“为自由人



罗曼咖啡馆, 1930年代的素描作品

士、因为抗议而离乡背井的人以及自愿离群索居者的聚集地点”，但仍看得到原有的无政府主义者。日报的雇员、剧场评论家、杂文作家与骗稿费的人、大作家及重要画家，观点都不同。出于职业的缘故，都必须到罗曼咖啡馆一坐。因为晚上报纸刊出的，隔天早上就会在桌边讨论。文学咖啡馆在这新西区的中心，在一定程度上职业化了。在让人瞬间经历了大城市现实的神经兮兮的自然主义者觉醒后，在对自己与世界绝望的表现主义者风暴后，在达达年轻人吵闹之后，一个文化景观慢慢建立起来，比跟着君主体制的最后抽搐一起抽搐的前一代，冷淡了许多。共和国在20年代初稍微平静下来。在街上露脸不再危险，新的咖啡馆、酒吧与餐厅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家逐渐说柏林是艺术家能一展所长的正确地点。因为战争匮乏而挨饿的数百万人在这儿等着有趣的娱乐，渴望着耸动与消遣。

被君特·比肯费尔德(Günther Birkenfeld)称为“天才等候室”的罗曼咖啡馆，可以见到文学中的大家与名人进出：贝尔托·布莱希特、艾尔瑟·拉斯克-舒勒、艾冈·艾文·基施(Egon Erwin Kisch)在自己的桌前，赫尔曼·克斯腾、克里斯多夫·伊雪伍德(Christopher Isherwood)、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亨利希·曼在固定的桌前，和斯蒂芬·茨威格(Stefan Zweig)、艾利希·凯斯特纳与本名为山多·弗里德里希·罗森费尔德(Sándor Friedrich Rosenfeld)的亚历山大·罗达·罗达(Alexander Roda Roda)坐在一起，后者由于在 *Simplicissimus* 杂志上刊登讽刺文章而丧失军官职务。还有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奥登(W. H. Auden)、艾略特(T. S. Eliot)、埃德加·华莱士(Edgar Wallace)、克拉邦德(Klabund)。

诗人及文学评论家汉斯·萨尔(Hans Sahl)回顾了(在“国家地理杂志特刊:大都会柏林”的文章中)他在“等候室”的时光:“我喜欢罗曼咖啡馆的宁静时刻,早上10点左右,当红发的侏儒理查把报纸搁在我桌上时,店里几乎空无一人,闻得到新鲜咖啡香和冷掉的烟味,或在晚上8点后,多数人都已去剧院或用餐时,下棋的人在楼厢里静静思考着棋局。这时我和沃尔夫冈·科朋(Wolfgang Keoppen)坐在一起,他和我一样为最进步……的副刊写文章,也就是《柏林交易所报》(*Berliner Börsen-Courier*),和他一起讨论两位剧场评论家赫伯特·耶林(Herbert Ihering)与阿尔弗雷德·克尔(Alfred Kerr)之间你死我活的争论。”萨尔记得那位他称为“罗曼咖啡馆灵魂”的人物:“莫里兹·泽勒(Moritz Seeler),一个戴眼镜的矮小男子,一直带着一只吓人的褐色小猎犬来咖啡馆,身为‘青年人舞台’的创始人,首演过像布莱希特、亚诺特·布隆纳(Arnolt Bronnen)与汉斯·亨尼·扬恩(Hans Henny Jahn)等作者的作品,写下了剧场的历史。”后来泽勒错失“逃走的机会,落入纳粹手中。有人认为他被遣往铅矿场,死在那里。其他人又认为见到他后来在选帝侯大道当运垃圾的工人,搬着沉重的垃圾桶”。

在那个咖啡馆当时那栋堡垒般建筑所在之处——如多数在奥古斯特-维多利亚广场(August-Victoriaplatz)与今天的布莱特沙伊德广场附近的罗曼风格建筑——有着奔驰商标的欧洲中央大楼曾经高耸在柏林的天空。一楼是难看无比的市内购物长廊,通往教堂的方向,还有一座又丑又怪的喷泉潺潺出声,象征着人们用不着再去记住的东西。夏天时,出外旅游的人坐在那里,那些南美来的音

乐家吹奏着他们的异国曲调。画家在街上为来此一游的观光客画像。像萨尔这样的时代见证人一定会吓得转身离开。而我们却没有机会变得多愁善感,我们只能如此。这个教堂废墟周围的交通枢纽在西柏林,就像亚历山大广场在东柏林人眼中一样,是一种广受欢迎的单调乏味。

当地面过热时

美国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在 30 年代中期还觉得在选帝侯大道上就像在欧洲最大的咖啡馆里一样。他来柏林亲自结识他的德国出版者恩斯特·罗沃特(Ernst Rowohlt)。罗沃特 1932 年出版了他的小说《天使,望故乡》(*Schau heimwärts, Engel!*),现在正准备出版这位美国人的第二本小说。罗沃特出版社的编辑恩斯特·冯·萨洛蒙(Ernst von Salomon)在《问卷》(*Der Fragebogen*, 1951)中描述了作家和出版家的会面:

我以为罗沃特和沃尔夫会立刻喜欢对方,但看来沃尔夫在试着吞食美国时,吞下太多无法消化的卵石——罗沃特的经营原则常被称为美式的,只不过美国出版家会有些结果,而罗沃特绝对不会。沃尔夫显得多疑,内心深处大概满怀一种乡巴佬农夫式的多疑,那是对绝对之物的多疑,他根本不喜欢自己所写的东西。隔了好久,这两位各自大陆的代表才相处起来,才确信现

在可以成为朋友——而我认为自己亲眼见到了这一刻，也就是在罗沃特试图欣赏沃尔夫的下流曲子不果后，若有所思地拿起杯子说：“生命很奇怪，而世界糟透了！”这是罗沃特当成自己生命原则的格言。

这个原则似乎在 1933 年当狡猾的罗沃特正好任命恩斯特·冯·萨洛蒙当编辑时，即已扮演了一定角色。他是出于精打细算，我们今天会说是实用主义。1922 年因为协同谋杀瓦尔特·拉特瑙(Walter Rathenau)被判五年徒刑的萨洛蒙，在政治右派中享有极高的声望，而不只是三本书的作者。1930 年，他的自传体小说《被唾



恩斯特·罗沃特(1887—1960),摄于 1951 年

弃的人》(*Die Geächteten*)出版,一种天体斗士的圣经,1932年《城市》(*Die Stadt*),隔年《小伙子们》(*Die Kadetten*)出版。但萨洛蒙的出版者却是恩斯特·罗沃特。从政治情况的改变,似乎可想而知,虽然不会过于迫切,新的掌权者在没有危机的前提下表达出合作意愿。萨洛蒙不是固执的右翼边锋,更不是纳粹党员,要靠他们工作生活。尤其罗沃特根本不害怕与他们接触。在共和国的结束阶段,他就在他的出版社内举办作家晚会,起先在帕绍大街(*Passauer Straße*),后来在简陋的艾斯雷本大街(*Eislebener Straße*)。他的晚会在文学界享有地位与名声,从极右到极左,略过人数不多的中间派人士,而他自己看到处处都是目瞪口呆的脸孔时,似乎总能自得其乐。直到1933年,在当时政治阵营的代表间,还能真正称兄道弟。正如那些杰出的出版家,罗沃特依然热情不断,不管是在哪个政治政权下。他自己在政治上并无任何派别:至少是在振奋人心的文学这一边。他把“美国人”引进德国,取得他们作品的版权: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厄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直到纳粹更加稳固之际,正如许多人所料,基于他们严厉的文化政策,出版也成了重大的问题。书籍必须停止流通,或根本不出版,非雅利安裔的作家在帝国文献档案馆中没有一席之地,不能再被出版,出版社也不能雇用犹太裔的工作人员。萨洛蒙在《问卷》中也提及出版社编辑室里一名资深的同事:

但弗朗茨·黑塞尔不能也不愿流亡国外。他在巴黎及柏林都待得很好,靠巴黎及柏林而活,就像一个人有两个肺叶一样,

这位老人固守在自己的世界,俭朴自足,喜欢塞纳河上灰蒙蒙的丝绸般的雾气及边界堡垒运河上落下的黄色栗树叶。他从柏林到巴黎,带着按捺不住的乡愁,从巴黎到柏林,也带着按捺不住的乡愁。”1939年,黑塞尔最后一次来到法国的大都会。“战争爆发时,他在那里。他的儿子在法军中服役”,却无法阻止“法国部长曼德尔(Mandel)在1940年5月10日下令将弗朗茨·黑塞尔送至集中营,不久后,他即在那里悲惨死去。

萨洛蒙在书中同情流亡者与受歧视者的命运,民族自尊心因而受伤。《问卷》并非自己良心的工作报告,亦非关于德国灾难起因的深入自问或研究报告,而是彻底嘲弄讥讽西方同盟国占领政权的政治天真。他们发展出这套众人皆知的问卷表格,好来轻松评估德国人。萨洛蒙在他的作品中一点一点回答这些认真的问题,而且尽可能巨细靡遗,可说是喋喋不休。他的策略很简单:因为占领者想多知道些,那他们就该得知一切,包括细微琐事。他的自传报导完美,轶事丰富,至今还可以察觉受访者,基本上应该是受审者的幸灾乐祸,他清楚地知道这跟他的脑袋无关,因为他早已服刑期满。

选帝侯大道上欧洲最大的咖啡屋是在“黄金的20年代”出现的,那是一个生活匆忙的年代,一个快速获利、同样也快速亏损的时代,一个极端穷困与奢华浪费的年代。那是新现实派的年代,史诗剧场及雇员小说(伊姆加德·科伊恩[Irmgard Keun]的《人造丝女孩》(*Das Kunstseidene Mädchen*))的年代,五光十色的歌舞剧及出色的运动竞赛的年代,但最主要的是1923年第一波侵袭年轻共和的通货

膨胀的年代。奥托·弗里德里希(Otto Friedrich)写了一本值得一读的关于第一共和的书《明天是世界末日》(*Morgen ist Weltuntergang*, 1972),关于这种疯狂的影响:“谁有份工作,要每天拿到钱,一般是在中午时分,带着一整袋现钞跑到最近的商店,买能弄到手的东西。”8月1日美元兑马克的汇率为1比100万,11月1日已达1300亿。弗里德里希说了老作家马克西米安·伯恩(Maximilian Bern)的故事,他把所有积蓄,超过10万马克从银行取出来,好买张地铁票。“他横跨柏林,来趟最后之旅,接着关在自己的住处饿死。”格奥尔格·格罗兹说道,人们在街上并不安全:大家躲在房子入口处及拱门下,“因为十分害怕,他们再也无法忍受待在屋里,人们爬上屋顶,开枪射人和鸽子。”

俄国流亡分子

当通货膨胀在1923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时,俄国人继续离开:前往布拉格或巴黎。革命的动荡把他们驱逐来这里,红军根据巴枯宁(Bakunin)的口号进行持续三年的血腥内战:“我们唯一认可的事实便是破坏,从脖子上的子弹到绞刑架。革命把所有方法神圣化。”对东边来的难民而言,柏林成了历史上最大的等候厅。

离开俄国的250万俄国人中,德国有56万难民,按其他的估算,则有70万。380万居民的柏林,在1919年已安顿了7万人,1923年则达30万。只有有能力负担,或必须负担逃亡的人,才能逃亡,并非

孑然一身的人，而是工厂厂主、商人、贵族（“大公”）、军官、科学家、高级官员、大地主、记者与艺术家，其中包括诗人鲍里斯·皮里尼亚克（Boris Pilnjak）、弗拉吉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伊里亚·爱伦堡（Ilja Ehrenburg）、马克西姆·高尔基（Maxim Gorcki）、塞尔奇·叶赛宁（Sergej Jessenin）、托尔斯泰（Alexej Tolstoi）、伯里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弗拉吉米尔·马雅可夫斯基（Wladimir Majakowski）、玛琳娜·茨维塔耶娃（Marina Zwetajewa）。流亡分子的聚落绝不封闭。当可怕的饥荒在红色帝国爆发之际，某些人视为列宁文学之手的马克西姆·高尔基，争取众人同情正在成形中的苏联，并给予物资支援。伊里亚·爱伦堡似乎也支持革命，尽管许多人认为他只是一位无耻的机会主义者，保持安全距离，观察着历史之轮往哪个方向转。马雅可夫斯基被尊为革命及新人类的歌手。当俄国的文学良心早在柏林开始安身立命时，其他人才来到这里：87家俄国出版社，3份日报及20间书店，更别提美食商店、酒吧、作家聚会地点及剧院。俄国文化商队宛如一个游牧部落，只在柏林搭设帐篷。

柏林人听任这一切发生。夏洛腾堡区一下子成了夏洛腾格勒，开往哈伦湖的公车成了“俄国人的交通工具”。几乎没有任何的接触。少数俄国人掌握着德国人，尤其对他们的东道主没什么兴趣。“德国人是白痴、吝啬鬼、半吊子、粗鲁无礼，”列夫·隆兹（Lew Lunz）在他的《病榻之旅》（*Reise auf meinem krankbett*）中写道：“每个俄裔柏林人都能证实这点，我十分吃惊。”

弗拉吉米尔·纳博科夫所谓的柏林小说也见证了这种倨傲的态

度。这座城市还出现在其中,但城里的德国居民却没有,却仍然被当成没有台词的配角演员点缀其中,那些描述并没那么谄媚。格林瓦尔德草地上的印象只限于“老男人的灰脚”、“大屁股”、“松弛的大腿”及“无望与满足于空洞的脸”。

然而,纳博科夫这位打网球的天才风雅人士,还在柏林忍受了14年之久。“现在看来,我们忽视他们,就像一位既自大、又十分愚蠢的征服者忽视那群没有形体脸孔的当地人一样。”

俄国象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的安德烈·别雷(Andrej Belyj),不得不面对完全不同的难题,在他的自传作品《在柏林多美好》(*Wie Schönes in Berlin ist*)中写道:“接着还有柏林人那种特有的透视哲学:当你知道你得往左时,就大胆往右走;所有清楚的地形观都和现实正好相反;一切都颠倒过来——从正常的理智到疯狂;而且死板到这种疯狂体系的机构自视为正常理智吹毛求疵的冷静,自视为让客人信赖的心安与一目了然。”

这种看来“完全无害的一目了然的心安”,至今没有任何改变。外来人士完全不知道哪条街往哪个方向去,就像中邪一样。在动物园火车站前:目光寻求帮助的人,不能理解他周围的其他行人真的有个目的。在纪念教堂:原本应该有用的市区地图,却起不了作用。在外围道路井然有序的混乱中,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根本帮不上忙。没有道路通向西方、通向东方等等。门牌号码更让人迷糊。一般国家的计算方法,右边偶数,左边奇数(或相反),突然不再适用。在柏林,一条街一侧从头到尾数字一直排列下来,接着从尾到头在另一侧继续往下数。

还有第二个现象让伟大的别雷伤脑筋：社会关系让人迷糊。他写道：“柏林是个有组织、按部就班实现的噩梦，呈现在正常健康的（市民的）人类理智的天真形式中。理智变得荒谬。没有任何荒谬可以吓到今天普通的德国人；在选帝侯大道上，我后来常自问：‘我得做什么事，才能让人吃惊？’我不得不承认——柏林人已没什么可以吃惊的事。……我愈想就愈明白：‘冷静’的柏林日常生活超越了所有的疯狂；按照柏林的对比方式，只需赋予‘冷静’的生活相反的意义，便可了解——这里弥漫着醺醉状态。”

别雷对这种荒谬的、往往不道德的骚动的愤怒，显示了他受不了这种市民的颓废，自己反而成了反市民的美德人士，他这位教授之子在这个罪恶渊薮中终于遇见一位俄国教授之女时，高兴无比。那是在伊里亚·爱伦堡住处所在的布拉格广场的“布拉格小馆”中。别雷踏进那家店，遇上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那位此后只要她允许就可随时见面的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在《相遇》中描写了这位受追捕所困、让她无比深情的诗人，令人感动。别雷的病立即表现在成为殉道者，并担起他民族所有苦难的想象中。当他1923年10月告别他的朋友，希望他们为他举杯，因为他将动身被钉上十字架。吃惊的朋友问：为谁？答案是：你们大家，各位大人！他回到莫斯科，为整个他献出鲜血的俄国文学受难。

陶恩钦：可卡因

1920年，年轻的卡尔·楚克迈尔(Carl Zuckmayer)从海德堡来

到首都。当他在冬天的安哈特火车站下车时，他才 24 岁，想成为诗人。他的行李中有出剧作《十字路》(Kreuzweg)，将在卫士市场大街首演。今天一般会把这种年纪的人视为年轻天才，但当时年轻且有天分却很正常，没错，的确可以期望获得机会，观众想要看年轻的戏剧。

楚克迈尔身无分文，最后一点钱买了车票。那他要如何生活？他到处打听，获得了一份工作，当了一阵子门房。他对有可能离开的男士轻声说，那里还有一家店：“服务亲切，价格实在。”那是工作的一部分，而他的老板立刻又指派其他的工作给这个一无所知的年轻人。24 岁，一无所知？我们很想相信，因为卡尔·楚克迈尔成了毒品贩子，卖可卡因，就在西城百货前面！他装作在卖雪茄和香烟。老板说他不用担心，小纸袋里装着混着食盐与阿司匹林的东西，不会有任何事。一个波兰的妓女警告他，警察监视着这个地区，但还是帮他吧海洛因交给别人，只不过要求分一杯羹。

“夜晚！陶恩钦！可卡因！这就是柏林！”人们到处都这样说着，而市民观众高兴狂笑——安德烈·别雷再一次抱怨。正好这个罪恶的地段是俄国柏林的中心。俄国人有没有吸毒，并没留下资料，但其他人都吸。装着义肢的老兵吸毒，是想觉得战无不胜，夜店的客人是想要更有魅力，而诗人是想成为全能的造物者。

哥特弗里德·本恩这位专家，马上就可写出好多诗——“喔，夜啊！我已吸食可卡因”——而且后来还安静地喝他的啤酒。他知道危险。脑袋里有东西的人，只要来一趟旅行就可以知道是什么样貌。没有海洛因，那就冻得够呛。

13 弗里德里希树林区

一座信仰与希望的碉堡

在东德第一条社会主义大街——卡尔·马克思大道，今天还住着建国初骄傲的活跃分子，是国家建设计划中的重要支柱。他们还记得奥托·格罗特沃 1952 年安下他们住宅区的基石。那时的标语是：住在宫殿中的工人。在此弄到住处的人，都是要有些表现的。住宅格局大方，对东德的情况来说，代表着浪费豪华。今天任何人都可住在这里，只要有耐心等到有人搬出去，但唯有万不得已时，老租户才会这样做。以前每个月租金 60 马克，今天大约贵了十倍，还是欧元。这个历史建筑大部分已整修过了。

老人们也抱怨除了交通一直繁忙外，这里没有太多变化，而咖啡馆今天开张，明天又关门。当他们说到过去店里什么都可以买到

时,眼睛都瞪得大大的,从他们唠叨的话中可以听出那在东德并不平常。他们说到继续以这种水准执行战后住宅建设方案的计划失败时,都觉得可惜。第二期计划(1956—1965年)的建筑脱离了既定的方向,介于亚历山大广场和施特劳斯贝格广场(Strausberger Platz)的大片高地,由于预算紧缩显得没有创意。但由于最先几年的野心,在施特劳斯贝格广场和法兰克福大门(Frankfurter Tor)间有一条巨大的马路,其“古典主义”和莫斯科的典范相比,毫不逊色:一长排粗笨的住宅碉堡,带有糕点师傅那种偏爱细节的风格,丰富的装饰、金色饰物、塔楼、凸出建物、长型阳台及大型的院子车道。这种宏伟的美学可以和在大动物园与施普雷河间的汉莎住宅区(Hansaviertel)的现代理性建筑方式相比,那是西柏林对未来内城居住体系争论的结果。从这两个宏大的企图中,果真可以看出一些东西:从汉莎住宅区的高楼建筑可以看出美国模式享乐的大众社会的个人主义,而这里则是新阶层社会的集体主义,官僚和党员享有特权。

这条大道曾经挂着斯大林的名字,直到1961年,直到这位独裁者被移出他在莫斯科的陵寝,放逐到克里姆林宫墙下为止。斯大林化的人,后来都得去斯大林化。这让人想到约翰内斯·贝歇尔(Johannes R. Becher),他这一生也有许多转折,他1937年的歌颂诗篇《跟随一个名字》(*Auf einen Namen*),就在大整肃的时代,当这位蹩脚诗人可能遭到追捕时,便歌颂诗中人物的完美权力:“大家会不断说着你。/你的名字也会铸在青铜,凿在石头上:/你的名字登入宇宙之中/就如星群的光芒与反射。”贝歇尔这位前表现主义者当时在莫

斯科负责编辑《国际文学：德国》，希望这些诗保住了他的脑袋！

从今天的距离读来，让人不得不想到列宁式的集体主义活动到底是什么的问题。1978年，日耳曼学学者列夫·科佩列夫(Lew Kopelew)关于一名党员见习期的报导《帮我造个偶像》，触及了问题的心理与宗教核心，指出在这种人类俗世解放的信仰体系与主张来世救赎的罗马天主教会的体系间，有一种难以否认的结构性雷同。政党成了教会，成了严格执行的信仰公社（“要是党没有严厉管教我，我会是什么?!”——约翰内斯·贝歇尔）；莫斯科的总书记同志成了教宗，拥有永不出错的权利；救赎的承诺与作为个人祭仪而再度复活的圣人崇拜；主张建立教条与正统；传教的热诚，配合着血腥打压异端与丑化不同信仰的人；开除党籍就像逐出教会一般；个体臣服在当时主流的教义下；永不放弃不相矛盾的世界观及无比坚持信仰原理的普遍性，等等。

在C段南栋七十五号的西必勒咖啡馆有当时的壁画，那时还被当成“牛奶大厅”及后来的“牛奶吧”，在那些被清洗的墙面上可以看出建设时所用的建材：被炸毁的柏林废墟中的不同砖块。一些传奇的废墟女子还活着，她们为了更多食粮配给在废墟中翻找，清理分类还能用的建材。卡尔·马克思大道促进协会把这间咖啡屋当成讯息与营业场所，当成这条曾经辉煌、未被神话消耗殆尽的大道的历史展示空间。居民，特别是商人，梦想着一个伟大的未来。这条住宅大街应该再度成为一条大道，一个吸引行人与漫游者的生活空间。

见证贫困

施特劳斯贝格广场已经属于弗里德里希树林区。这个城区之名源自那片广袤的绿地，北端的国民公园紧邻普伦茨劳山边界，公园最高点——“垃圾山”要归功于被炸毁的屋舍与被拆除的废墟留下的瓦砾。这座公园 19 世纪中便已规划出来。附近地区的工人可以在健康的环境中恢复一日的辛劳。公园最西端，一条小路在繁忙的交通要道旁打着盹。一位大小说家让它博得文学之名：“柏林，格奥尔根教堂大街（Georgenkirchstraße），第三栋后院，四道楼梯，1923 年 7 月，早晨 6 点，美金现在仍可兑换 41.4 万马克。”这是汉斯·法拉达（Hans Fallada）《狼群中的一匹狼》（*Wolf unter Wölfen*）第一章的描写。一年及千页之后，“地产抵押马克^①的奇迹”出现，通货膨胀平息：“现在又有货币流通，真正的金币，不用只靠马克计算，不，还可以用芬罗森（Groschen），不，还可以用芬尼——实在太棒了！……人们回想着——开始计算，突然间明白过来，没错！我本周赚了这些和这些，我可花这么多——你看，没错！”

法拉达这位躁狂抑郁的作家，要不是下笔如神，就是什么都不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小说。为了保障他要命的工作量，他不客气地和出版者恩斯特·罗沃特讨论，别碰他之前的书。法拉

^① 指 1923—1924 年德国发行的货币。

法拉达被纳粹的文艺爱好分子攻击。他想靠这本小说走出长期的抑郁。在创作过程中，他的父亲去世。此外，他不该和罗沃特协定交稿期限。这位出版家坚持要先看一眼这部正在创作的作品。他的压力巨大。法拉达一大早就开始写作，直到深夜才告一段落。有些晚上，他只睡两个小时，常常得吃安眠药。在初稿完成之前，他一周要写 123 页。1937 年 6 月，罗沃特来到卡尔维茨，读着读着——赞赏不已。原来的法拉达又回来了：一名火热的人，小人物的律师，熟知小人物的生活环境与困顿。前一年的无聊作品成了过去式，它的作者在长期干渴后，找回了原有的力量。他不顾所有抵抗和敌视，想出版这本书。

“这期间的德国，再没有一部比这更重要的作品了。《狼群中的一匹狼》讲述通货膨胀如何彻底改变了小人物的生活，让一些人变得更加满意、富裕、有权。”魏纳·利尔施(Werner Liersch)在传记《汉斯·法拉达：伟大的小生命》(*Hans Fallada. Seingroßes Kleines Leben*)中写道：我在这里引用他的描述。

这部小说 10 月出版，几周内第一版即销售一空。出版社未先征求同意，便印制第二版。纳粹媒体先在这部作品中到处找碴，表示天马行空的幻想一团混乱，必须针对这类文学作品“严加抨击”。但戈培尔惊为天人，在导演维特·哈兰(Veit Harlan)这位名人前称赞这部作品，意图争取法拉达加入德国电影。法拉达受托比斯(Tobis)电影公司委托，撰写坚强的古斯塔夫的故事，这名马车夫 1928 年出于绝望与抗议市府排挤他这一正派的职业，驾着自己的马车一路来到巴黎。他的小说脚本将会拍成电影，艾米尔·詹宁斯(Emil



汉斯·法拉达(1893—1947),摄于1936年

Jannings)主演。但这个项目(作品名称:《坚忍的男人》(*Ein Mann hätt aus*))失败。阿尔弗雷德·罗森贝格(Alfred Rosenberg)这位总理论家与神话学家身旁的派系成功插手干预。法拉达几乎成为纳粹写手。他甚至同意电影公司的修改想法,把情节延长至1933年,让主角的小儿子加入纳粹。1938年,《坚强的古斯塔夫》(*Der Eiserne Gustav*)出版,是至少删除符合体制那部分的版本。

几年前,汉斯·法拉达的小说《酒鬼》(*Der Trinker*)拍成电影,哈拉德·容克(Harald Juhnke)饰演他自己生活中的角色。作者和演员都有酗酒的经验:1944年8月,醉酒的法拉达拿着一把上膛的手枪在前妻面前胡乱挥舞着,两人坐在餐桌前,手枪走火,子弹击中桌脚。她夺下他的武器,叫医生来,但来的却是宪兵。这位有酒瘾的人被送

至施特雷利茨乡间疗养所，一座精神异常的罪犯拘留所。他和暴力罪犯关在一起，但法拉达继续写作，甚至因而有个房间，一个大家都可出入的通道房间，还得忍受其他犯人对他细小的字体的嘲弄。由于纸不多，他写完一页，转过纸页，利用行距间的狭小空间继续写。单单在9月，他十六天就写完整部小说：一位酗酒的商人威胁妻子，关到疗养所，等候判决……12月，法拉达出院。这部小说《酒鬼》1950年出版，在他死后三年。

在卡尔·马克思大道东端，法兰克福大道展开。往北去，有条平行的小街：里加街(Rigaer Straße)。那里，68号的建筑中，20年代初期上演着一出悲剧，在通货膨胀时代寒冬的穷困与饥饿中，并非罕事。泰奥多·普利维埃(Theodor Plievier)，来自威丁区的工人之子，水手，皇家海军士兵及1918年威廉哈芬(Wilhelmshaven)水手起义的一分子，靠出版左倾激进杂志艰难生活，不得不眼见自己2岁半的女儿维多利亚死于肺炎。那时缺了我们现在看来理所当然的东西。住处冰冷，父亲一无所有，弄不到食物，也没有必备的药物。疾病夺走这个完全衰竭的孩子，普利维埃把她葬在一座万人墓中，没钱为这孩子办场该有的葬礼。父亲写下小说《垂死的城市之夜》(*Nacht in einer sterbenden Stadt*)，为她补立了一座纪念碑。

享乐主义者,和平主义者

我们不断听到,由于年轻人的偏爱,弗里德里希树林区这时已经

胜过普伦茨劳山。应该没错：50%的居民介于 18 到 35 岁，大部分是新柏林人。在法兰克福大道南端酒吧林立处闲逛一下，就可浏览一番社会上层。不同于普伦茨劳，另一种文化在弗里德里希树林区没有任何的根，连在巴克斯哈根小区这里也一样。在今天这个娱乐区，1990 年前住着几乎是工人、手工匠及小雇员，一些没有艺术雄心的人。从餐饮行业来看，明显看出这里缺乏生活艺术。新的酒吧与咖啡馆明显看得出是在设计公司中完稿的，其中用了昂贵的装潢，其他地方则取法自然：一种风格、一个特色与一种认同，清楚地表达出一个城区与其居民的历史。

“柏林最美作家”与“狂热者公路”不久前还来到乌利施大街 (Wühlischstraße)“议会”酒馆有霉味的地窖，读着他们的手稿。上头的酒吧对柏林观光客而言，是正确的选择，只要他们需要一个以东方地带破烂玩意布置的背景，好自觉正是待在东边这个德国的迪斯尼乐园。但基本上只有 Conmux 够得上原味，在这个过去的荒地上扮演了十五年的先锋植物，已算是酒馆的老兵。室内装潢还清楚地显示着觉醒与即兴的语言。

统一后没几年，便难以在中心区，或普伦茨劳山找到栖身之处，这个地区也就吸引了第一批屋主前来。最著名的事件便是 2000 年警察大举出动在美因茨大街 (Mainzer Straße) 肃清非法活动。这个地区虽然有自己的英雄故事，却只是暂时的。最后被占走的屋子和他们的过渡住户，只会被容忍到原屋主或投资人来执行自己的权利为止。

要成为传奇并绽放出超越城界的有效光芒，柏林不只需要一些

被占或非法居住的屋子,还要有可观的所谓特色店面及能够欣赏的大都市住民。直到弗里德里希树林区的混合特质被发现,一个由下发起的自我文化形成后,大三角(十字山、普伦茨劳山及中心区;秀山区被淘汰掉)的圈子又多了一个新名字。我们应该相当期待,这个至今基本上只会抄袭的暴发户会有什么新玩意。

东边画廊(East Side Gallery),即沿着米伦大街(Mühlenstraße)被保存下来、画得五花八门的柏林围墙段,也属于一种二手的文化意象。当世界各地著名的与自封的艺术家前来涂画这个“世界最长的画布”时,这个建筑已经丧失其用途与惊人特质。人类似乎展望着一个没有界线与战争的世界——至少水泥上那些绘画作品是这样宣告着,一个拥抱、握手与兄弟之吻的现代爱、和平与快乐的世界,只有无情的现实会稍加反对。

在柏林围墙还分隔两边时,只有一个西边画廊,就像围墙本身一样延伸与绝望,涂满了透露出某种绞刑台幽默的标语,是西柏林人用来安慰自己的集体冒险。有人在某处画了一扇门:“谁穿过这里,可以拿到一百马克。”这在东边画廊提供给我们的东边那段涂鸦中,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这些画应该保留下来当成文献,当成一个满怀希望的年代的老旧讯息。

寒冷 震撼

小区阳光普照的日子,到处都“美丽”,在施普雷河或拉莫斯贝格

湖上划船只是其中一项,因为温暖让人感到满意。但在冬天,这座城市展现出它可怕的一面。载货驳船避在东港的艾尔森桥下,海鸥群在浮冰上沿着施普雷河而下,东十字月台上候车的旅客受冻着,华沙大街站指出这股严寒来自何方。在桥上,看着错综的铁轨延伸到波兰与俄国国际列车驶进的东火车站。

1927年,恩斯特·容格(Ernst Jünger)搬进离东港不远,位于施特拉劳大道(Stralauer Allee)36号的住处:“在新住处的第一个梦并不太愉快。我沿着一条满是灰尘的单调街道走着,穿过一片隆起的草地。突然间,一条铁灰与草蓝的漂亮毒蛇窜过我身边,尽管我想得抓住它,但还是任它消失在草丛中。这个过程一直重复,只不过蛇愈



恩斯特·容格(1895—1998),摄于1930年。

来愈黯淡、丑陋与透明；最后几条甚至死在路边，完全被尘土覆盖。不久后，我在一个小水坑找到一堆散落的钞票。我小心地一一拾起，清掉污秽，收了起来。”

在这本 1929 年以《冒险之心》(*Das Abenteuerliche*) 书名出版的谜样作品中，作者隔了几页确信，“所有我们在白天生活的丰富成果，会在夜里形成。”容格推论道，理解生命的多元形式“不是靠作品与意识，而是慈悲与黑暗”。不同于科学的解梦，容格并不在照亮（解释）夜晚，而是找出一种相对的方法：从梦与恍惚的图像库中进一步理解人类的存在，他认为那些相当接近现实。容格是位思想的冒险家：“我们要小心最大的危险，小心我们的生活变得一般。”他对自己和读者呼吁。对他来说，一般意味着熟悉、清楚明白及已经评价过的事物，简而言之，也就是所有市民所理解、赋予我们存在安稳与舒适的事物。但对容格来说，这些安稳却是不安的永恒泉源。他对柏林年代的观察与想法，在他心中助长着一种动摇根本的文明批判，让这位作者一辈子受到抨击，成为近代德国文学史上最具有争议的人物。

在他 102 岁的最后几年，许多崇拜者前来南德的维弗林根 (Wilflingen) 造访创造力不断的容格，其中包括作家布鲁斯·查特文 (Bruce Chatwin)、罗夫·霍赫胡特 (Rolf Hochhuth) 或海纳·穆勒 (Heiner Müller)，想一睹这个化石、老兵与永恒的煽动者。弗朗索瓦·密特朗 (François Mitterand) 和赫尔姆特·科尔 (Helmut Kohl) 视他为德法和解的象征，带着这位世界大战存活者之一的高贵老人来到魏尔当 (Verdun) 战场上，在阵亡者的墓前握手。容格孤身一人

面对错误假设的战役,驳斥有个没有危险的世界,而我们可以靠着我们的方法来创造的推论,结束于1998年1月。德国社会至今严重伤害了他作品中的寒冷震撼。

14 十字山

这里不是美国

那是一个警告,还是承诺?那不是遗憾,因为二十五年前起,反美主义就像一根红线贯穿了十字山的历史。当下的世界局势并未让线断掉。在克林顿时代,这条线愈来愈细,“活跃分子”在他的行政手段下,并未觉得受到过度刺激。但自从乔治·布什接任,并在2001年9月11日攻击事件后,敦促世界决定支持美国或反美时,活跃分子又慢慢活跃起来。他们知道自己如何决定。

然而,在弗朗格尔小区(Wrangelkiez)肮脏的街上并未察觉任何未来反抗的火热情绪。一切还是原来的样子。土耳其人主导着街头景象。他们没人在法肯斯坦大街(Falckensteinstraße)的小超市墙上喷上美国主权范围结束的讯息。只有德国人会有这里是美国的怪念

头。我们的自艾自怜深藏心中，深到我们自己根本感觉不到。

在十字山的最后面，仿佛一根断掉的兽角，插在中心区与施普雷河旁的特雷普托区之间。西柏林的死角，被都市发展长期忽略，是那些口袋里没有多少钱，且被住宅市场推出来的人的栖身之所与退守空间。直到今天，这里仍然让人觉得不甚长进，不像其他地方受到将首都美化成为大都会的大型计划的眷顾。但这并未让这里成为不受欢迎的地方。柏林有着出于面子因素而上演的首都生活，亦有在个别城区的没有野心的一般生活，不管是在破败或高级地区，还是德国市民的或多元文化的地区。

在今天仍然值得一读的书《德国，德国，一切都完了》(*Deutschland, Deutschland, alles ist vorbei*) (副标题：另一种生活，还是无政府？以柏林“活跃分子”为例的新青年反叛运动)，约瑟夫·舍尔(Joseph Scheer)和扬·艾斯佩特(Jan Espert)写道：“小区是柏林的城区说法(不可和市行政区混为一谈)。巴黎人的‘住区’(quartier)，就是柏林人的小区：一个大城市中一目了然的小岛。这里上演着生活的私人一面：在小店铺里，在每周市集上，在常去的酒馆内。小区因此也是敦亲睦邻的地方，从广义来说，还是故乡。柏林这个地区不能被当成故乡，但小区可以。典型的小区居民在此出生，在此上学长大。他认识每栋屋子，知道小区与小区中的故事，就像农夫依赖自己的农庄，他依赖这个大城市风貌中的小块镶嵌石头。他的小区给他安全感，帮他阻挡百万人口的大城。”在弗朗格尔小区，我们可以观察到典型的小区在土耳其裔柏林人大量迁入后的遭遇，或讲得更明白些，曾经遭遇过的变化，因为这个变化过程已经结束。2002年11月

《国家地理》杂志柏林特刊关于新科隆区席勒小区的话(“再也没有小区,也没有犹太社区”),这里也适用。只有少部分居民是在城区里出生、长大、上学的,大多数不知何时来这儿落户,因为便宜的租金,或许也因为在此可以保有贫穷的尊严,不用遮遮掩掩,而其他地方早就弥漫着自由的富裕社会所带来的那种无情的标准形式。由于许多德国家庭迁出,再也没有“典型小区”,只有一种萎缩、修剪过后的小区,而其他第二种加入进来:同样有良好的邻里关系,只不过是土耳其式的。两个团体并存,而非一起生活,大家在街上、菜贩处、楼梯间相遇,如此而已。如果一切顺利的话,这种双重小区或许会随着年轻的一代经历变化。

我们可以在小区街上活动,斯卡利泽(Skalitzer)两旁便富有活力,我们无法依靠文学来体会,但我们同样可以走南端穿过戈尔利茨公园(GörlitzerPark)的路,在温暖的日子中,可以见到德、土两边休闲社会的轻松面貌。在其东端,连结施普雷河和边界堡垒运河的水渠另一侧,一栋鬼屋正好位于特雷普托区、十字山区和新科伦区交会之处。这个阴森的出租屋仿佛一艘失去光泽的船身耸立在罗穆伦大街(Lohmühlenstraße)上,东柏林最后有人居住的前哨,船首伸进从前的敌国。两旁额外加墙围起来,要能从窗户观看边界部队运动,一定要有特别的特权才行。人们可以对西边的邻居挥手或假想着高飞过人类界线的乌鸦的情状。我自己这样想象,这栋屋子等着讲述它阴森故事的人。格尔利茨公园的人行道通往那里,经过仍让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建筑车辆地界,越过从前的边界地带。每次我走这一段路,就会有种奇怪的感觉,不知道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还是我脚下

的土地在告诉我某些事。小心,那感觉警告我,这里不太对劲。有时我冷静下来,有时我加快脚步。这个血腥边界的噩梦追着我,要是我知道原因,或许感觉会好些。

勒曼的这一边

关于《勒曼先生》(*Herrn Lehmann*)已有许多人谈过了,可以去读一下斯文·雷根纳(Sven Regener)，“犯罪要素”(Element of Crime)团体主唱的这本书。他们踏入他的区域。谁在这等着看耸人听闻的大事的话,会感到失望的。没什么像过去那样传奇,东南三十六区^①的大时代,真正的十字山,像斯文发现到了勒曼,已是几年前的事了。最迟到统一与围墙倒塌时,也都结束了。那些他和朋友大胆忽视柏林历史上这桩大事的酒馆,早已上了年纪,许多不得不关门,或转手,失掉了魅力。大众的兴趣是机会主义的,追逐着一个接一个耸人听闻的事件,直到精疲力竭,怀疑是不是老东西还有其价值。十字山的情况也是如此。在这期间,这里好不容易喘了十几年的气,又被说起,而中间这个时段,十字山属于十字山人。渴望新奇的拥护者白日瞎晃,或在夜里找着自己的中心区。由于十字山不单

^① SO 36,柏林邮递区号东南三十六区的历史名称,除了部分十字山地区,亦包括今日旧特雷普托区大部分。1968年的学生运动后,东南三十六区由于接近东西柏林边界的边缘位置,逐渐成为活跃分子的中心及后来占屋运动的舞台。

只是柏林的一个城区,而是一种生活态度,甚至是一种自白,也就难怪东北竞争地区的繁荣使这个过去夜晚活动的核心完全冷却了。

作为旁观者,作为好奇的访客,作为研究旅行者,该选择哪条路线呢?我们从白天开始:我会在“醉舟”用早午餐。咖啡浓烈香醇,看着海因里希广场(Heinrichplatz),真是享受,在小区的人差不多都会经过这里,其中有道地的当地人。下雨天时,就坐在墙上有兰波(Rimbaud)的诗前,不断赞叹这位所有现代诗人中最现代的一位,如何在他短促却天才洋溢的阶段中创作出作品。用完早午餐,可以走去玛丽安广场(Mariannenplatz),参观贝坦尼恩艺术家中心(Künstlerhaus Bethanien)的展览,那里一直以来是城里让人激动的艺术之家之一。以前,这是一间医院——冯塔纳在这儿担任药剂师,亲眼看见1848年的街道巷战——在1970年代初声名狼藉的彻底改造计划下,这栋砖瓦建筑原要被清除。冯塔纳死后一百二十年,玛丽安广场上又再出现街道巷战,这回打乱了完全不同机构的计划。市府建筑管理处和房地产集团结盟不该——时代改变了——开枪射击反抗群众:贝坦尼恩保留下来。在天使谷或在利吉恩河堤与洛施纳河堤间第一眼看来谜一般的凹地,可以舒舒服服休息。一条美丽无比的林荫小道令人着迷。所有这些谷地曾经有水流动。1926—1927年,从前的路易森城运河被填平。谁想继续下午散步,可沿着2.3公里长的运河从施普雷河(谢林桥)到边界堡垒运河。这段路上,沿着贝坦尼恩河堤,野花让人惊艳,因为公园管理处尚未照顾运河谷地这一段,或可欣赏通往瓦尔德玛大街(Waldemarstraße)线条美丽的运河桥。

《国际文学》(*Lettre International*)的办公室在艾尔克伦兹河堤上,那是个有雄心的文化计划,希望欧洲除了固定其成员国可负担新债务的比率,还能有其他作为。那份一年四期的大型刊物给收藏者提供了当代散文的实际纲要。国际知名作家根据特定题目汇编起来的文章,因为他们打破思想与感觉习惯的原创理解方式而博得好评。散文是一种艺术形式,在法国人中是相当普遍的观点,却或许透过德文版也逐渐渗入我们的语言领域来。无论如何,《国际文学》没有提供不明事实的德国学者其他论坛。没有自己思想与写作美学面向的人,不会受到欧洲讲究的《国际文学》团体的青睐。

在散步后,喜欢威士忌的人可在施普雷瓦尔德广场(Spreewaldplatz)的“麦当娜”继续游晃。正如行家保证的,这个选择很独特。想尊贵点,可在傍晚坐到德累斯顿大街(Dresdener Straße)的“掐人天使”的吧台,那是柏林的精致酒吧之一。此外,那里不时冒出让人无法过目即忘的脸庞。年轻的柏林人则欣赏“奥勒弗”老板的大胆,他在十字山中心的水泥迷宫中开了一家以没有装修为特色的时尚酒吧。像法兰克·“我想”·勒曼这种怀旧人士走过了普克勒大街(Pücklerstrasse)的市场大厅酒吧,会选择“维也纳之血”,因为东南三十六区里有头有脸的都曾在这里聚会。把你们的鼻子伸进这间酒馆(维也纳大街13号),闻得到英雄们的汗水味。我也会在美丽的保罗·林克河岸试试看,想改善中欧的奥斯瓦尔德·维纳(Oswald Wiener)曾在那儿开了一家传奇的艺术家与文人酒馆“流亡”。但那里除了少不了的“地中海菜”外——这是今天的店名,闻不出什么特别的味道。在对面没什么阳光的新科隆区的“锚的小室”,景象完全

不同,一直保持原貌:是所有瞧不起在 80 年代即已在边界堡垒运河岸定居的高傲风雅人士的人的聚会场所。他们的活动范围一直往南延伸,过了赫尔曼广场(Hermannplatz),餐饮业终于在平地上经营,而各有鬼胎的小酒鬼社团则去他们全是啤酒的绿洲,即传统的街角酒馆。谁想脚踏实地,那就去和他们作伴!

几个月前起,阿达贝特大街(Adalbertstraße)的十字山博物馆举办了勒曼小说中的场景展览,特别是去酒馆和小区中的咖啡馆,对他们来说,雷根纳这时已成了一位吧台的圣人。

金钱与贫困

十字山在 1980 与 1981 年见证了国家与反抗青年间最为激烈的战斗。那时涉及的并非一种有问题、自足的暴力事件,如 5 月 1 日还在奥兰宁广场(Oranienplatz)上爆发的那样,而是先涉及一种真正的诉求:拯救仍可居住但却被任其朽坏的旧有建筑。要了解城市规划者的现代十字山概念,可去科特布斯门(Kottbusser Tor),仔细看看那里的住宅。一片接着一片,一间房子接着一间房子,一条街接着一条街,老建筑得让位给令人赞叹的水泥塔楼。那可是数十亿元的利益。已经提过的所谓十字山中心(以前叫做新十字山中心)一夕成名,“柏林市为这栋折旧的破产建筑付出 6500 万的保证金。”在前面让我们更加了解柏林小区的约瑟夫·舍尔和扬·艾斯佩特在《德国,德国,一切都完了》引述 80 年代初在十字山中心后经营一间杂货店

的租户代表维纳·欧洛夫斯基(Werner Orłowski)的话：“正是第一栋原应成为象征的建筑，加速了朽坏与贫困的脚步。这个接着在1亿马克补助金下变成国宅建筑的投机物件，破坏了这里的街道，摧毁了这里的生计，人们因而生病，甚至死亡。”悲惨依附在建筑物上，如影随形。长期以来，高架铁路旁广场上毒贩聚在那里贩毒，在地铁站交易，乞丐和酒鬼遍布广场。租户抱怨走道或房门口被弃置的针管。

彻底整顿还包括被评定为值得保留的老建筑能有利润的昂贵翻修。对老租户、退休人士及其他“社会弱势”，租金变得过于昂贵，不得不离开小区，在城郊，在卫星城市落脚，那里聚着被弃置与无家可归的人。政府相关部门的官僚与住宅建设公司的经理为他们的行径导致的社会结果，留下一笔烂账。付不起的人，只得离开。市场的法则在运作。

1979年，市民自发团体东南三十六区的成员首度占领格尔利茨大街74号的房子，他们一直试着让住宅建设公司注意这个问题，却徒劳无功，尽管住房严重短缺，该公司依然任由该区三百栋住房空置。占领者整修房子，而房子成功整修后的客户如野火燎原般扩散到全城；其他的占屋行动紧随而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和几个月，情况变得严峻起来：警察不再是面对一小撮占屋者，而是一整群政治活跃分子，要求的不再只是滥用所有物与合理要求价格实惠的住房。质疑体系的情况展开了。“我们不鸟这个国家，我们争取自己的自由。”“占领者议会”的一份传单这样表示。人们想在十字山与丽山创造幸福的小岛，而这条路上最忠实的朋友便是无政府。在一栋一直有人住的房屋墙面上可以读到：“朋友，你们想一辈子付房租吗？”

这个问题并不是很新鲜。1969年，雅克·卡桑克(Yaak Karsunke)在他的诗“哈啰房客”(hallo mieter)中即已提出：“为什么/你一直付一直付一直付/为你永远得不到的东西/——房子永远不会属于你。”财政顾问大笑，那我们可以弥补一下：您自己买栋房子！无政府主义者从未明白金钱是什么。谁想多知道这些，去找班德·瓦格纳(Bernd Wagner)的书《箱子里的愤怒》(*Die Wut im Koffer*)，读他的“给普伦茨劳山麻雀的话”。

瓦格纳在1985年移居到西柏林前，是东柏林人地下文学杂志《日本天皇》(*Mikado*)的共同编辑。在他的文章中，他对统一后成群(!)出现在十字山，从旧鞋子上一下便认出来的穷东德亲戚，解释他们对决定一个人价值与外观的高级衣料应该知道的事。他分出三种不同获得金钱的方式：偷窃、乞讨与工作。瓦格纳并不吝惜自己的经验。他自己并不在什么普通的地方偷窃，而是在最恰当的地点：西城百货，但最后他可以从让人感到一种神秘魅力的欲望上解脱出来。“乞讨，”他解释道，“是获取金钱最纯粹的方式，”但那有其代价，也就是舍弃。舍弃住房、工作、家庭、税务及订报：“纯粹的生活，没有一点市民性格，没有一点不可转让的人权。纯粹的生物，我们之中的动物伸出脚掌，希望我们把钱搁上去的人，把脚掌变成手。”

换边

在十字山六十一区——居民至今仍以原有邮递区号的数字来标

示他们城区的两边——那个更美丽、更祥和、更富有与更快乐的十字山，看着东南三十六区里那些贫穷吵闹的脏小孩，总有一点不解，或许也有一点同情。当然，这个温和的小市民十字山是真正的十字山。另外那头从前有围墙，这里的人为宛如童话般美丽的维多利亚公园感到骄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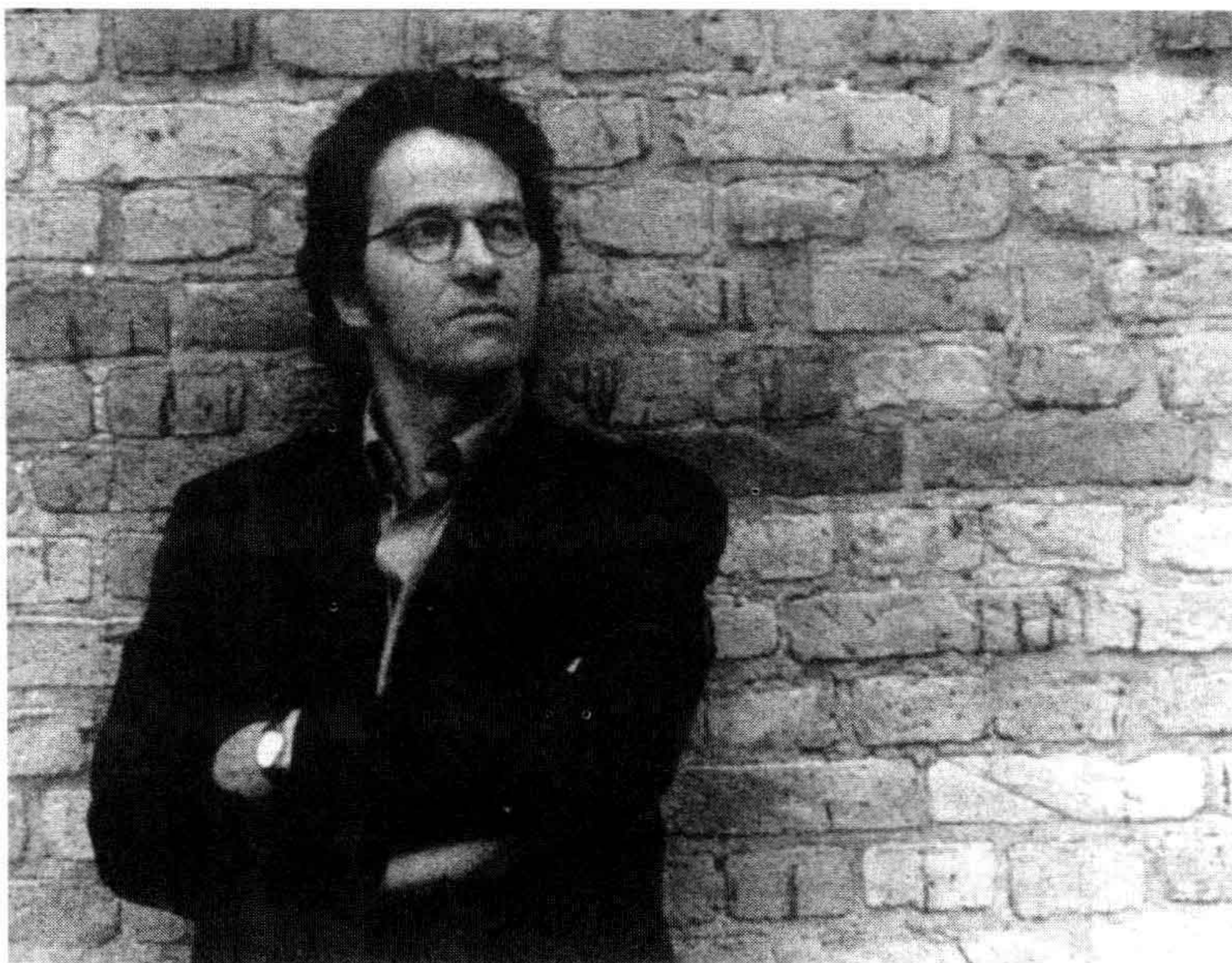
1981年3月25日那一天，最能清楚地说明看着那头的目光。市立医院的病人那天全挤到窗边，利用他们昂贵的包厢位置见证了边界堡垒运河另一边的法兰克河岸的围攻行动。警察和占屋者像势不两立的内战双方对峙着。国家动员500名警察封锁了周围大部分地区，另外350名在破晓时开始彻底搜查48号的房子，所谓法兰克堡的核心，因为隔壁的46号与50号才是最先被占领的。警察被人从窗户内丢掷石头，新闻媒体被包围者用钢弹射击。直到中午时刻，冲突才告结束。非法住户被逮捕；检察官指控他们犯下各种暴力不法行为，现在还加上一条“抵抗公权力”。官方行动并不包括清理，但在可能的罪犯一被移送离开后，工匠立刻开始翻修工作。除了一箱箱被搬进房里的石块外，官员们还发现敲打工具、涂鸦、弹弓及一颗土制炸弹，另外还有许多无线电对讲机。对病人而言，这件大事算是结束了，但对柏林并没有。事件并未落幕，法兰克河岸的失败没有告一段落，而是把反抗的火炬带入邻近的城区。于是2000名多数戴着面具的示威者从劳齐茨广场(Lausitzer Platz)朝十字山六十一区前进，在梅林河堤搭起路障，交通瘫痪，警察被丢石头，一名被击倒，橱窗被打破。这天与后来一晚，城里不得安宁。

由占屋者周遭先发起的暴力行径在隔年逐渐平息，但至今依然

深入城市的记忆与十字山的历史中。有些人把这标榜为反资本主义争取自由的英雄事件,并严重指控这是同时在德国复苏的反美主义,当时美国里根领导下的强权正想彻底武装东欧集团。

“那一天,在我想到再也没有任何意外的事情后,我的青年时期就过了。”这个觉醒的观点来自拉尔夫·罗特曼(Ralf Rothmann),只能接受纯然武断或一种历史意外事故的假象。这个起义并非晴天霹雳。只有当时那些无知人士,没注意到在拥挤的西柏林所积聚起来的社会炸药(青年人失业、前途无望、恐惧未来),才会说这是意外或一串不幸事件。罗特曼是位浪漫主义者,一名寻求意义的人,带着他在鲁尔区童年的碎片,借由说故事来拼凑出生命当时的图像:一个深渊与一种希望。他希望或许可从这个原料中了解后来成年的存在。在他最先的两本小说《斗牛》(*Stier*, 1991)与《森林之夜》(*Wäldernacht*, 1994)中,他把主角由柏林现今的住所遣回到青年期的地方:在那个地域,他们寻找失落的安稳与既存的依靠的企图失败了。但我们感兴趣的是这位作者所描述的柏林图像。“……街头战斗一如既往在翻腾着,边界堡垒运河另一侧的火熊熊燃烧着,而这一边只关心进出酒吧和餐厅,拿着酒杯或餐巾,看着警车的蓝光闪烁,火星乱飞。”

罗特曼在《斗牛》中原有的自我——凯·卡尔森(Kai Carlsen),和他一样是位熟练泥水工,当上了作家,住在吵得要命的后院,一个真正的“房屋地狱机器”,也从安全的地方看着不安全的十字山。平常他不太理会这个包围着他的城市,也不管历史开始滚动的巨轮,不像他回到自己青春期的神奇地方,再次见到朋友与过去的典范时的



拉尔夫·罗特曼(1953—)

震撼,那样让他感动。柏林只不过是这个后院与他疯狂的住户而已,他们无比容忍,就像要求一张自己的床那样。这时一名女友邀请他回去看她,来得正是时候。

柏林是个陷阱,不只对罗特曼,也不只对卡尔森来说。起先,这座首都像是一个希望,像是唯一彻底摆脱德国那种让人沮丧的土气的可能。往往要在多年后,这位自认被救的人才发现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签下一份永远忠诚的合约,再也没人可以帮他脱离。退路自然被封锁,有如战败一般,向平庸投降。要是其他的出路,情况还不会太糟。但对一位坦白一切的大城市市民来说,在我们国家去柏林根本不是问题。

《朋友，逃吧！》(*Flieh, mein Freund!*, 1998)是罗特曼第一部真正的“柏林小说”。但他又呈现给读者一个让人想逃走的城市。“你在这里不该多愁善感，不然你会迷失，”故事中敏感的主角罗立说。“一位敏感的柏林人，差不多就像涂果酱的咖喱香肠一样扯。”柏林人“爱大声又胆小”，笑的时候，“嘴角是向下”，只有在他们的丑陋变种中，才会感到快乐，一种幸灾乐祸式的快乐。而“柏林的后院是个语言厕所，从早到晚回响着德国人爱说的字眼，那在给外国人的语言课上听不到的，或许以为那是众所周知的。”罗立在这座城市真的难受，而柏林给他一个完美的屏幕，暴露出他身为儿子、学生与情人的失败。而在被他女友拖去参加的马尔海内克广场上的小区节庆，他是一无所获：

忧郁人士听的民谣。摆上麦片蛋糕，看来这个和平欢乐的场面，有着签名名单和震耳欲聋的多元文化乐队，折叠桌上摆满皮件装饰、旧书和治病的石头，老朋克和更老的嬉皮围在啤酒摊四周，刻意表示亲切的辖区官员和到处乱窜的野狗，在烤肉店臭味中老柏林人的醉吼声，哭闹的小孩，以及在菩提树下大街静静观看的昂首阔步的母亲，想着：这大概才是生活吧。这真让我受不了。

罗立的反感其来有自：他的父母就是这类嬉皮，母亲在一定程度上还一直是。老爸是间广告公司老板，十分恼怒儿子自作主张中断会考前的学业。最后他破产了，而罗立决定在他公司当个文案，但为

时已晚。因此那疯狂的母亲告知他：“有天我们会聪明到像孩子那样再度感恩。”

马尔海内克小区的动脉是贝格曼大街(Bergmannstraße),以酒馆、咖啡馆和旧货商店为主,可以和奥兰宁大街媲美。这里显得亲切,是入门者的十字山,进阶者的十字山,买得起健康食品店的东西,那里让“健康食品贵族”(罗特曼)感到安心,能买到正确的东西。值得从诺斯提兹大街(Nostitzstraße)上到夏米索广场(Chamissoplatz):那是天堂和平及一种几乎超越世俗的沉着的广场。那里可以体会到不同于吵闹与匆忙的另一个柏林。繁荣年代时期所建的出租屋舍行列无出其右,一排排往山上与山下延伸,非同时代的人无法踏入其完美的组成。

展望

约克大街(Yorckstraße)一角的梅林河堤大厦至今没有任何纪念牌。哥特弗里德·本恩应不会介意这点,他毕竟知道被人遗忘吻合人生苦短的法则,并不是缺陷。对受歧视者而言,没有比他重回文坛更令人讶异的事了,那让他在50年代几乎一夕之间跻身明星作家之列,成为德国新一代年轻诗人的偶像,诗中流露出无与伦比的本恩之声,不管他们现在叫做彼得·洪可夫(Peter Rühmkorf),还是汉斯·马格奴斯·恩岑斯贝格。他并不该被人遗忘,而他的格言:一位诗人只要后世善待他,留下一两首诗,至今也未实现。

“我住在贝勒联盟大街(Belle-Alliance Straße)12号时,仍是最美好的日子,晚上喝着啤酒,不时和您聊天,宛如昨日。”他写给出版家艾利希·莱斯,回顾1917年至1935年在这个住址东翼二楼开业的日子:哥特弗里德·本恩博士,皮肤与性病专业医生。

1955年,他参加柏林庆典周“东西之间的柏林”的讨论会。他的讲演稿因而值得注意,因为他几乎开门见山地指出这座城市现在破产与危机四伏的境况,急需好好思索柏林在德国的角色:

柏林是座堡垒;当其围墙倒塌,我们会被掩埋,但西方也会有所损失,如果对此忆起一些东西,那这个方向也是不错的。我想让大家注意一种文化的观点,和西德有关。要把我的想法以一句简明扼要的话来表达的话,我会说:如果柏林不存在,那西德在文化上也灭亡了。我是以一个在此住了50年,并在1918至1933年见到柏林发展成为一个精神中心的人来说的,这个中心可以和巴黎并驾齐驱——天才、作品、展览、首演,如同世界上少数几个城市。联邦体制在政治上或许有其必要,但在文化上却有其黑暗面。

如果要十分坦白的話:我们在那儿见到地方性的都会,有着大商店、剧院与电台的混合体竞争激烈、寻找根本不在的任务的学院——缺乏规则,这就是柏林。缺乏可被当成标准的东西,可以从中汲取动力,尤其是那种让人感到不自在的东西。……

我们都该亲切友好,而亲切友好的人也会得到回馈。但那些不只常常在传统上想继续延续并修复有使命的西方的人,也

想透过一个有创造力,或许有时也受到折磨且具攻击性的脑袋的冲击与刺激来继续延续,并赋予西方新的色彩的人,这些人怎么了?在他们面前,我们见到旧欧洲的偌大圈子结合起来喊着:“等一下,年轻人,别走极端!以西方之名:把你的忧虑倒进一小杯酒里。”这点柏林从未参与过,今天也不会加入。我们这群人想在那里活下来,就得记住这些事。

五十年后,乍看之下,情况似乎不同:柏林再也不是介于东西之间,而是位于中间——一个主权国家的首都及欧盟的文化大都会。柏林可以逐渐扮演好首都的角色,但文化大都会?熟悉柏林文化景观的人只要听到那个字眼:大都会……会大笑不已?不,他们说,绝不可能,并会像本恩许久之前那样,指出那段黄金岁月。他们乐于如此,仿佛这样便已盖棺论定。然而历史不懂盖棺论定,这点他们正好可在这座城市学到,他们低估了柏林未来价值所在的最重要因素:年轻人由全国各地大批涌入,甚至由欧洲大陆。年轻人察觉到了什么老一辈再也注意不到的东西?似乎有些东西悬而未决——也包括艺术性的东西。这座城市正在阵痛之中,几年以来就已如此,一座新城将从老城中诞生。

柏林曾经参与一切,也让一切加入。政治乖乖做着自己的功课,想着节约,而首都文化,基本上是300万人口城市的招牌和诱人材料,在扫兴的日子看来像是各地差劲品味的聚宝盆。这绝不会一直如此。柏林的新情况呈现出一种动力,经济难题正好在此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促成了艺术家与策展人源源不断的创意。补助金与生活

费只会带来依赖,一旦被删除,艺术便思索起其本有的自由——自主独立。

那已涉及精致的银制餐具,连城里的歌剧院——受到高额补助、市民艺术欣赏的防御城堡,至今神圣不可侵犯——也受到检验。这并非坏事。困顿时,柏林人也用战争时的餐具用膳,这座城市多变的历史证实了这点,每当情况危急,就会充分发挥其长处。多数艺术家,特别是作家,还往中心区挤,那个虚构的空间,承诺着归属、温暖与安稳——因为他们害怕被挤到边缘,甚至被挤出去。只有他们明白这种保证一点也没用,他们才会敢于积极创造,也就是本恩曾说过的。那时柏林才会涌现出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成为标准的动力。

柏林满载着历史与轶事，柏林的文学，一直是一座不安的城市的生活标记。

在柏林的文学中，一直可以觉察到与环境的搏斗及好战精神，那种挣扎、彷徨和空虚、迷茫的味道。那种奇特的总让人错乱的柏林氛围，依附在所有可见的事物上。

在这里，遇见穿梭在柏林出版社、酒馆、沙龙与咖啡馆，围墙、车站、大街与广场的文学人，邂逅德布林、本雅明、海涅、奥登、格拉斯、戈达尔、亨利希·曼、黑塞、霍夫曼、荣格、茨威格……

漫游是一种街道读物，在那里，人们的面孔、陈列品、橱窗、露台、咖啡馆、道路、汽车、树木，不断构成书中的文字、句子和书页。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ISBN 978-7-214-05533-0



9 787214 055330 >

定价：24.00 元